

兰溪文史资料

第五辑



90-47529-1

47530-1

47532-2

政协兰溪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八月

兰溪文史资料

第五辑

政协兰溪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八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兰溪市委员会文史资料
工作委员会名单

主 任 郭瑞升

副主任 杨学良 黄昇平

委 员 詹荣福 方念裕 蒋聿修

徐建生 俞瑞鸿

目 录

击毙日军中将师团长酒井直次——兰溪战役亲历记

……………韩正礼撰 窦天语整理 胡汝明夹注 (1)

回忆在兰溪的抗日战斗……………安守仁 (12)

长乐御敌记……………邱溪源 郑秋兔 (18)

日寇烧杀大阜张……………张庆珪 (20)

日寇在三港村的暴行……………王 模 (22)

畈口村之战……………范维德 潘锡瑜 (23)

五十年前东京见闻……………郑根泉 (26)

抗战期间青阳记事……………郑根泉 (30)

回忆日本投降前后三件事……………黄寿朋 (33)

兰溪收复经过……………邱溪源 郑秋兔 (39)

红军烈士林来均事略……………林庭松口述 王模整理 (42)

烈士翁友廉事略……………林庆贻 (45)

雇农加薪和佃农二五减租……………黄绍衡 (47)

古塘村农民协会的抗酒捐税斗争……………童文仙 (50)

我第一次被捕入狱记……………童文仙 (53)

兰北浦南一带地下革命斗争的回忆

……………陈宪章撰 徐迅整理 (56)

惩罚疯狗……………胡谷新 (62)

土匪郑锦屏就歼记……………汪祖荫 (73)

徐柏园在重庆一案之谜……………徐建生 (75)

畈口村的土布生产合作社·····	陆贵洪口述范维德整理	(78)
龙山堰追记·····	姜 韬	(80)
兰江水运今昔·····	胡汝明	(82)
我对兰溪盐业的回忆·····	陈孝三	(85)
回忆兰溪泰亨钱庄·····	姜树勋口述 姜韬整理	(88)
我与洋行、洋顾问交往的回忆·····	唐廷瑞	(94)
兰溪电汽公司梗概·····	刘起良	(98)
兰溪瓷业生产简史·····	陈念慈	(101)
修桥铺路·····	鲍文达	(106)
浙赣铁路的前身——杭兰铁路·····	施兰舫	(107)
米市架·····	施兰舫	(108)
兰溪医院始末·····	杨绍清	(109)
兰溪最早的师范学校·····	郑德森	(111)
兰溪历史上第一所完全中学——辅成中学 ·····	徐品生 凌成澜	(112)
建国前兰溪城区的三所私立小学·····	蔡启生	(117)
兰溪滩簧·····	沈瑞兰	(121)
兰溪戏曲之今昔·····	沈瑞兰	(124)
郁达夫写兰溪山水·····	郑秋兔	(126)
兰溪画家童之风·····	夏家丞撰 郭瑞升整理	(129)
兰江花舫勾勒·····	郑秋兔	(130)
操守清廉的童元亮将军·····	王开甲	(131)
倪谦吉事略·····	吴子受	(134)
西藏回忆·····	所那陀吉	(138)
回忆我父亲的几位同僚·····	胡武林	(146)
勘误表·····		(154)

击毙日军中将师团长酒井直次

——兰溪战役亲历记

韩正礼撰（国民革命军第63师188团少校营长）

窦天语整理

胡汝明夹注

一九四一年，抗日战争的第四个年头，太平洋战争已经发生。为了威胁日本本土，盟国空军选择在我国浙江衢州建筑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国际机场，以便就近轰炸日本本土和亚洲沿海的日军空军基地。我军令部估计，日军对此决不会等闲视之，必将集结兵力前来夺取。于是决定以一个军的兵力固守衢州（第25集团军驻衢州），另以七十九师守金华，六十三师守兰溪，扼守衢州机场的水陆两扇大门。后来，日军果然来攻，爆发了兰溪战役。这个战役规模并不算大，但它却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因为，我们在这一战中，打死了一个日军中将师团长酒井直次和将级幕僚四人，震惊了日本朝野，也使盟军对我刮目相看。这在八年抗战中，还是少有的战例。当时，我正在六十三师一八八团任第二营少校营长，亲身参加了这一战役。值此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之际，谨把记忆所及的有关情况整理出来，以为纪念。

阵地配备与工事构筑

一九四二年二月，六十三师经过对兰溪地形的侦察，决定在这里构筑一个钩形阵地。兰溪城防核心阵地由一八七团构筑和防守。从兰溪市折向东北，沿石廓山（石骨山）北延伸约二十华里，构成一个侧面阵地，由一八八团构筑和防守。一八九团及师直属部队驻兰溪东郊宝塔山（应是大云山）与金兰铁路之间，为师预备队并协助其他两团构筑工事。这种配备形势，在战术思想上是吸收了当时欧洲战场盟军对德作战的经验而制订的。打破了一线式或圆圈形守城市的老观念，优点是可使侧面阵地与核心阵地互为犄角，火力互相交叉，兵力互相支持，以分散敌人攻击重点。这一计划上报到第三战区长官部后，顾祝同亲率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和工兵监到这里作了实地勘察，认为很好，当场批准。

三月初，我们开始按计划紧张施工。在这一过程中，有几件事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的支援 兰溪东郊的北山山区盛产杨梅。有一种杨梅树的枝干上生有尖刺（应是枣树，其枝多尖刺。不是杨梅树），比荆棘还厉害。我军阵地前沿的障碍物仅靠铁丝网，数量太少，而把有刺的杨梅干埋在阵地前，就是障碍力很大的鹿砦。山区农民知道了这件事，都踊跃地把老树更新或整枝时的废枝干卖给我们，对构筑工事作了很大贡献。我营第五连连长底柱是湘贵边界亲晃县的侗族，祖传一种用毒草制毒签的技术。我们用这种毒签插在路上，覆以伪装，人踩了只要刺破皮肤就溃烂不已。兰溪农民又踊跃把他们砍伐

毛竹时剩下的枝梢支援我们做毒签，给了敌人不小的伤害。

二、步抢击落敌机 在我们构筑工事的过程中，时遭日寇飞机的轰炸。因为轰炸衢州、上饶等地敌机在返航杭州时，常把剩余的炸弹在兰溪找一目标投完（因为那时的轰炸机投掷不完的炸弹，不能带回机场降落，否则有爆炸的危险）。为此，我们特设了一处伪阵地工事，专门吸引它的炸弹。由于怕暴露真工事，即使有敌机来作威力搜索，也不开枪回击。因此敌机总是肆无忌惮地在我上空低飞，山上树梢常被机风吹动。四月初某日黄昏，一架中型侦察轰炸两用机正在低空搜寻目标。我一八七团某连机枪前哨恐其轰炸我阵地，举枪射击。击中了敌机油箱，顿时起火遁去。次日接永昌县（应是寿昌县。现已并入建德县，成为建德县的寿昌镇。）通报，知这架敌机逃到永昌后机身摔碎，机上四人摔死。为此上级奖赏关金币一万元，全师每人购胶鞋一双，又买几十头猪加菜。

三、拆宝塔 兰溪宝塔山上有座七级浮图（应是大云山。当年大云山巅有能仁塔一座，高七层）。在兰溪军政联席会议上，有人提出，日机轰炸兰溪总是利用这座宝塔作为瞄准的指示标，因此必须拆除。有人认为它是历史文物，应当保留。也有人说宝塔是镇水的，拆掉了兰江会有水灾。经一番争论，最后还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予以拆除了。凑巧，是年夏浙东多暴雨，钱塘江上游山洪爆发，沿江城市受了水灾。为此，当地百姓对我军很有意见。

兰溪战役的“催化剂”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八日晨，美国十二架B 25型轰炸机由

队长杜利特尔中校率领，在太平洋接近日本海的黄蜂号航空母舰上，秘密起飞去轰炸东京（根据美国多利特尔《奇袭东京四十周年》一文论述：美机B—25型轰炸机十六架轰炸东京）。日本空军发觉后，立即起飞战斗驱逐机近百架迎击，但高空已被美机占领，美机迅向东京市区投掷炸弹，接着迅速向我国沿海飞来。日机恐有后续美机再来，不敢穷追；美机则按与我预约的计划，从钱塘江口向衢州飞来。岂知好事多磨，当大批日机在东京起飞时，衢州机场却得到一个不准确的情报，说这批日机是来轰炸衢州机场的。加上美机从太平洋起飞的时间、地点通知有差错，因此，衢州机场立即熄灭灯火，全部关闭。美机从钱塘江口按地图座标向上游寻找衢州机场，又遇天雨，看不见机场和跑道，竟在杭、衢之间的上空转了一夜，最后因汽油耗尽，只好各自寻找地面降落，航空员弃机跳伞。这一来钱塘江两岸和天目山一带，处处坠有航空员（多利特尔迫降在天目山中时，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驻天目山，招待了他）。第三战区长官部发出紧急命令，通知各县悬赏寻找美军。事后，美军航空员对我们说，他们有的落在沦陷区，被群众护送回来；有的落在畲族山区，被误认为是日本人，捆起来送乡公所。这次虽然损失飞机十多架，幸而人员伤亡不大。这次美机轰炸东京，成了兰溪战役的催化剂。日军更加急不可待地要攻占衢州机场了（一九四一年四月三十日，日本下达大陆第622号令：“主要击溃浙江方面之敌，摧毁主要航空基地，粉碎敌人利用该地区轰炸帝国本土之企图”）。

作战始末

一、敌军开始向我进犯 五月初，日军从杭州集结兵力，分富阳、诸暨两路进攻桐庐和义乌。大批轰炸浙赣铁路各车站，义乌站被全部炸毁。这个地区的守军战斗力很弱，日军一击，义乌即告失守。此时有一列载有地雷千余发的火车，正遇日机猛炸金华车站，于是被迫疏散到金兰铁路(支线)上来，进退维谷。我们乘机向他们交涉，将这千余发地雷移交我师，使我营阵地上又增加了几百枚地雷。我营排连长中有几人是军校十五期工科毕业的，埋设地雷很内行。这批地雷是四号甲雷，引爆方法有四种，一是轻压即爆的，是炸散兵的；二是重压才爆炸的，是专炸车辆或马匹的；三是用绳索拉发的；四是电发的。我们把这四种引爆方法都用上了，加上此时老百姓都逃难他处，无须顾虑，因而山上、路上、树上、房屋里，处处都有地雷埋设(日军七十师团长内田的手记：“对付地雷，曾煞费苦心，金华、兰溪的阵地上，主要交通线上，埋设了无数地雷，以阻止我军行动，我军因此受到严重损失。”据兰溪域北郊枣树村八十四岁村民蒋樟清回忆：日军侵占兰溪后，为了安全，该村特请了灯棚笼村石工宝荣，挖出尚未爆炸的地雷十余枚)。

约在五月十五日，桐庐敌军沿富春江南上。师长赵锡田(黄埔二期)、副师长唐肃(黄埔三期)、团长邓光锋(军校六期)，到我阵地上来检查工事强度，我恐他们不知地雷暗号，即前往引路。在石廓山坐下休息时，副师长夸奖我们说：“这工事虽然不是钢筋水泥的，但不比当年南京郊区的

国防工事差多少。”师长说：“南京的工事可惜没有用上，敌人把主力避开坚强工事，绕道先攻芜湖，而唐生智指挥的缺点是对侧后方的威胁太敏感，才仓促撤退，造成那么大的损失！”这话使我若有所悟，便问道：“敌人倘若和在南京一样，不攻打我阵地，而从兰江西岸绕到后面攻兰溪，我们化费了这样多的人力物力岂不落空？”这一问，他们三人愣了半天，最后师长说：“兰溪东郊的好地形都被我们占有了，敌人来了无踏脚的台阶。人家是内行，他会眼睁睁吃这个亏吗？”遂即命令我快把岩头和石埠岭之间的前进阵地全部填平，让敌人来占领。又令邓团长速派第三营向桐庐挺进，与敌人保持战斗，边打边退，把敌人引到石廓山来。此时我体会到孙子兵法上说：“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便迅速带人去前进阵地毁坏工事，并用枪炮向估定的敌占点试射，将射击诸元的数据记录下来，以便夜间射击。我安排一个班留在岩头山上，叫他们和敌人打一下就退到石廓山主阵地来。

约五月十八日，枪炮声愈来愈近，估计敌人已到马涧（日军于五月二十四日侵占马涧。马涧在兰溪城东北四十华里处）。第三营营长涂犹龙（军校十期）在石渠市（即石渠乡的石渠村，旧军事地图上称石渠市，距马涧五华里，距兰溪城三十五华里）和敌人打了一天之后，全营退了回来。他笑着对我说：“我把敌人请来啦，以后看你们的了！”

二、阵地战开始 约五月十九日，日本侦察机沿我石廓山阵地用机枪扫射，接着轰炸机四处投弹。我们知道它是威力搜索，寻找我工事位置，便置之不理。接着，日军以步炮协同攻我大坞（即现路口乡朱山行政村的大坞自然村，离兰

溪城约十华里)第一营阵地,同时以岩头、石埠岭(此两处离兰溪城十华里)高地为据点,集结兵力准备进攻石廓山我营阵地。这样一来,日军是完全按照我们预定的作战计划进攻了,我心中不由暗喜。到廿日晚,日军麇集于岩头和石埠岭村庄里,杀猪宰牛,炊烟弥天,对近在咫尺的我营毫无顾忌,其骄傲可知。这是因为,第三战区游杂部队居多,敌人还是以扫荡的战法来对付我们的。入夜,我令迫击炮连将八门迫击炮推到阵地前沿,每门二百发炮弹,按预先测好的方向距离,连续向岩头、石埠岭发射。一时炮声大作,战马乱跑,我设在秘密点的拉发地雷同时拉爆,轻重机枪同时猛打。第二天清晨,敌人在飞机和炮兵的掩护下前来收尸,民间的席子、门板为之搜尽。后据逃出的民夫说,敌人死伤在四、五百人左右。这一捧打得日军停战两天,我们从遗尸身上才知这支敌军是酒井师团。

约廿三日,敌后续大军到达,猛攻我第一营大坞阵地。该营第一连连长陈锁才及机枪一连连长均负重伤。营长黎殿臣(军校十一期)告急,我们第三营便于是夜偷袭石渠市敌后方,这才使第一营阵地的战况缓和下来。两日后,敌再集结大批部队攻我营石廓山阵地,飞机丢烧夷弹烧我阵地前的鹿砦;轰炸机炸我轻重机枪掩体和掩蔽部;炮兵从上午七时打到中午。我阵地被打得尘土飞扬,敌步兵遂即向我阵地猛扑。其先锋从鹿砦缺口处跃入,幸我鹿砦有几层,当敌兵冲入第一道鹿砦后,我侧防重机枪即从秘密火点中向之侧射。敌兵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只好停滞在我火力点下来回蠕动,而敌机和炮兵因敌我距离太近,无法协助。直到黄昏后才利用黑夜撤了下去。

三、核心战 五月底，敌人感到在我石廓山侧面阵地上花的代价太高，划不来，于是便把攻击重点指向兰溪城一八七团核心阵地。此时兰溪核心阵地上烟尘四起，枪炮声、炸弹声震天动地，从早到晚敌机盘旋不停，其战斗之激烈在该师历次战斗中是少有的。激战了两天，担山中学（现在兰溪第一中学校址，当年为担三中学所在地。在大云山麓。）和宝塔山（应是大云山又名大寺山）被敌攻占。敌从山上居高临下，兰溪守军伤亡过半（日防卫厅战史研究室《昭和十七、十八年中国派遣军》记述：“在兰溪附近，63师抵抗甚为顽强。”）核心阵地岌岌可危！约五月卅一日，我师预备队一八九团（团长陶绍唐，黄埔四期与林彪同班同学）夜袭担山中学之敌，得手后猛攻宝塔山，与日寇肉博了一天一夜，卒将该阵地夺回。此时我团第三营逆袭石廓山当面之敌，我阵地上也以炮火支援宝塔山，夜间派迫击炮潜行敌炮兵阵地附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速打速回。此时敌人感到我侧面阵地对他打击太大，便改变决心，又把攻击重点回头对着我营石廓山阵地。

六月二日拂晓，敌机数架在我营阵地上投弹后，敌炮兵向我阵地轰击，他们的观测气球升到我阵地上空来指挥炮兵射击，所以打得很准。我看到这是个大威胁，便立即集中机枪火力向气球猛射，打瞎了敌炮的眼睛。不一会，敌兵又派来小型战斗机两架，与炮兵协同指示目标，使我工事被击毁不少，我的掩蔽部也被炮弹击中，盖土埋到胸膛。接着他们又施放毒气，幸而当天有风，莽莽山原，几十发催泪弹起不了什么作用。中午，飞机和炮弹愈炸愈激烈，炮兵开始延伸射程，向我阵地纵深射击。敌步兵手摇太阳旗，脱去身上军

装，分几路向我拼命扑来。地雷、竹签、鹿砦、铁丝网等完全置之不顾，真象疯了一样。但我士兵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跃出掩体投手榴弹，与敌人拼刺刀。战斗中，五连连长底柱阵亡，六连连长陆钦治负重伤，机枪二连连长吴楚才失踪，全营伤亡三分之一以上。第二天，敌我已处于犬牙交错的状态，双方伤亡都是很大而失去作战能力，所以彼此只小打了一天。

四、击毙敌将官五人，我七十九师在金华作战，其战况之烈和兰溪相似。但他们官兵的毅力和阵地的弹性不如我师，所以在六月一日即退出金华（据旧政权档案资料，日军侵占金华系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敌酒井师团长当时是兼代军团长职务，进攻金华的日军归他指挥。金华已攻下两天，而自己的师团却攻不下兰溪，威信攸关，使他格外恼火，遂亲自来兰溪督战。六月三日，敌机比过去多一倍，向兰溪狂轰滥炸，许多敌兵扛着木梯越我前沿堑壕，猛扑不止。但一八七团官兵仍死守阵地不退。我在石廓山上闻得杀声大作，而机枪声却逐渐稀疏，知敌我已进入白刃战，兰溪城已处危急状态，而在此时，又发现金华方向有敌军沿金兰铁路向兰溪急进。我一八九团遂迅将主力抽去守铁路，一面严密注视敌军动向。

当是时，敌中将师团长酒井直次偕将级幕僚四人和一些随从，正在石廓山下有一个华表的地方（即沿石骨山东去二百公尺的郑姓祖墓，墓前有石柱）指挥作战。（日防卫厅战史研究室编《昭和十七、十八年中国派遣军》：“五月二十八日上午，酒井直次中将一行乘马前进，顺序为：间濑参谋、古谷次郎参谋、酒井师团长、专属副官、川久保参谋长、吉村

参谋。十时四十分在兰溪城北方1500米处。”兰溪城的北方一千五百米处，即现通往坛树脚村机耕路与兰浦公路之三岔口处）日军在继续向兰城靠近中，我营在昨夜曾派一个班潜伏在义冢地内（即邑厉坛坟丘，现市农药厂所在地），酒井一行恰被他们发现了，以为是来搜索他们的日军，与其被他们发现，倒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他们立即用轻机枪和步枪向之猛烈扫射，当场有的日军中弹身亡，其余日军仓皇四散，刚巧进入我地雷区，一时炸声四起，四连刘连长集中机枪向之猛打，过了一会，我在山上看见直升飞机几度在华表处降落，不知其详，事后方知这次被我伏击而亡的有日寇中将师团长酒井直次和其幕僚官员四人，直升飞机是运送这些将官尸体回杭州的（六月一日，日军部和南京师团留守处石川少将来兰，赶到现场处理善后，叹呼：“现任师团长的阵亡，自陆军创立以来，还是首次”）。

五、退出兰溪，六月四日（五月二十四日，日军侵占马涧，五月二十八日，日军侵占兰溪。兰溪战役的敌我双方就在五月二十四日至五月二十八日的五天中交战），接到长官部命令，大意是：衢州防务已布置就绪，该师任务业已完成，望迅速撤出兰溪脱离敌人。是夜，我们埋完战友的尸体，将带不动的山炮和器材埋藏起来，在一八九团的掩护下，退到金兰铁路西南山区整补。不旬日，我师担任截断金兰一带敌人后方补给线，我营以北山为根据地，进出于马涧、石渠市、洲上埠、岩头一带，截断富春江敌人的水上运输线（日防卫厅战史研究室《昭和十七、十八年中国派遣军》记有：“富春江水上兵线站（乙兵线站）由于遭到敌人破坏，于六月已着手废除”）。以后战事进入衢州会战阶

段，本文从略。

杭州的追悼会

敌酒井师团长等五个将官被我击毙后，日寇在杭州西湖某山庄开“兰溪战役阵亡将士追悼会”，我地下工作人员将会场的重要文件图片等偷摄回来。只见那祭台下挂着五张照片，中间一张是中将师团长酒井直次，左右各两张是和酒井同时被击毙的四个将级幕僚。在其余的照片中，有一张注明是酒井等骑着战马上前线的镜头，还一张是被击毙的地点，看得出是在石廓山下一个有华表的义冢地旁。此外，有份材料说明，酒井在死前两天，曾有一帧奏折给天皇，其中详述了我国士兵不怕死的顽强性，也提到我们用有毒竹签对付他是“中国古代的毒器使他的士兵足不登履”。最后请求天皇不要轻视中国的“国魂”，谨慎行使对华的战争步骤等等。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以上文件和我们战场上缴获的文件印成专辑，在重庆散发给各部院、各部队广泛宣传。国民党中央则以之在盟军中，作为取得美援的外交资本，而战死在兰溪的无名英雄，却早已被忘记。撰写至此，不禁为他们默默哀悼。

写于1987年4月江苏江宁汤山镇

回忆在兰溪的抗日战斗

安守仁（国民革命军第63师187团第一营营长）

一九四一年秋天，我们的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三师，由浙江衢县进驻兰溪县城郊的牌岭、瓦灶、下陈赵一带，并沿富春江的建德、桐庐、富阳布防，面对新登之敌。随着形势的转变，战区司令部牒报频传。日寇在杭州集结大量兵力，西线沿江西南昌同时也在集中兵力，似有东西两面进犯之势，以打通浙赣铁路仅有的东段通车线（江西邓家埠至浙江的诸暨县）。约在二月份，苏联顾问来我师阵地视察工事构筑、兵力部署等，将我师由兰江西线推进到市区东北部郊区，司令部驻扎东门外东嶽庙中。师直属单位驻东门外的铁路两侧。187团原驻女埠、殿山一带，春节后移防兰江以东地区。当时我任187团第一营副营长，营部驻中徐村，第一连驻外中徐，第二连驻下中徐，第三连驻田铺（现兰溪棉纺厂所在地），重机枪连驻毛竹园村大庙里。那时毛竹园村有许多小型手工业厂，如毛巾、牙刷、布匹、袜子等。1942年整个春天里，我们的部队大半时间化在兰城东北山区地带构筑工事。

当时部队战斗的序列是：六十三师（师长赵锡田）驻守兰溪，，七十九师（师长段林茂）驻守金华，这两个师均属四十九军指挥，军长王铁汉，军部驻金华北山，归第十集团军指挥，总司令王敬久。

我们187团的阵地以毛竹园村为中心，在北门外与东门外一带布置防务，阻击由富春江上溯和浦江方面陆路来攻之敌，保卫兰城。力争在城外作战，不与敌作巷战准备。我第一营第二营防御阵地在北门火车站向北到茶坞以西黄土岭以南一带。阵地前沿有铁刺网，更前沿埋地雷，轻重机枪构成交叉火力网。

1942年的春天，富饶美丽的兰溪城市，工业、农业、商业，还是象春天一样的繁茂。由于上海、杭州早已沦陷，许多爱国商人，转来内地经营，一时倒也热闹非常。可是民族的敌人，那能让你安居乐业？空中“强盗”天天飞来侦察，有时低空扫射，有时狂轰滥炸，这本来是敌人大举进攻前的惯例。兰城的居民，早晨提着饭盒、干粮去乡、村躲避，到了晚上，城里灯火辉煌，又是繁荣的夜市。约在三月下旬，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五架敌机时高时低，向我阵地侦察扫射，我军战士们早已义愤填膺，可是没有命令，不得开枪，避免暴露目标，这时我在东门铁路侧，见到师长也站在那边树林里，我上前报告要求同意全营火力一齐对空射击，使敌机发现不出什么地方是目标，经师长同意。阵地上战士同时开火，眼见一架敌机中弹，浓烟滚滚，向西北方向坠落下去了，后来经查明，坠落在建德东门外河边。四架敌机顿时高高飞起，在高空盘旋了一会，似图侦察被击落的同伙葬身何处，然后逃窜。战士们高兴地欢呼：“空中强盗，还敢猖狂吗？”有的说：“我们还得好好准备，迎击明天更大的轰炸吧！”这也是敌人的惯技，每当它遭到一次失败，必然会来一次更大的轰炸。以为这样，便可以征服中国人民了，其实敌人想错了，相反，更加激起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从那次击

落敌机以后，一直到兰溪战斗开始之前，这一段时间里，日寇的空中飞贼，再也不敢低空飞行了。

在麦子快割的时候，农历四月上旬，战备更加紧张，上级有了命令，市区人口，限期疏散到距城二十里以外的山村，人们已知道战火即将来临。兰溪人民和全国各地人民一样，有很高的爱国热情，工业停产后，把机器拆除埋藏起来，商业停市后把物资疏散到四处山村。并把木材无代价地支援部队，用于构筑工事。商会还向阵地战士赠送慰问品。我记得，我们进入阵地与敌人接火后还吃着兰溪工商界慰问的皮蛋和腌鸭蛋。

大概四月二十几号吧？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来到了兰溪城召集了我师排长以上军官训话，顾说：兰溪城墙在北伐战争中，第一个拆除。兰溪是全国四个自治实验县之一（其余三个是广东中山县，江苏江宁县，山东曲阜县）是富饶美丽的城市。这次你们担任保卫兰溪的任务，很光荣。”王敬久也讲了话，大意是要求军官经常到下面连队去走走，与战士谈谈话，与战士联络感情，战时好指挥等话。总之，他们皆以抗日爱国等语，勸勉将士，激励士气。

在四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奉命由营地进入阵地战壕。我营的指挥部设在外中徐村至毛竹园村的小土岭树林中，掩蔽部里积水很深，当时是雨季，各散兵坑交通壕里，都有积水，指战员们的脚大都整天浸在水中。这时的兰溪城，万籁俱寂，已是座空城，就连山坡小路上也见不到一个行人。乡村人家鸡犬之声也没有了。阴郁沉闷的空气笼罩着兰溪大地，阵地上使人不寒而栗，但战士们都安闲自得，有说有

笑，个个有视死如归的决心。这时师政治部文工团、歌咏队，也来到阵地第一线，向战士们致敬、慰问，有嘹亮的歌声、有短话剧，一时阵地上又活跃起来。五月下旬的一天，保卫兰溪的枪声打响了，敌人已侵入到我阵地前沿也就是我们住过的那些村庄——田铺（即现兰溪棉纺厂所在地）、中徐、外中徐一带。敌人的先头部队之前，是警犬作侦察，一经发现我方阵地，警犬立即回转。我正在第一线战壕里。发现对面村外有一个敌人爬在树上，拿着望远镜向我阵地窥察，我向战士手中拿过步枪，枪机一扣，敌人从树上应声坠下。在我营指挥所不远的一座小高地上，有师配备的两门山炮，我营炮兵排长拿着望远镜站在高地上向敌方侦察，不幸遭到敌人的射击而牺牲。当天傍晚没有战斗，只有零星稀疏的冷枪声，是敌人的侦察性射击，我军则一枪不发，以待歼敌之机。第二天拂晓，敌人发起进攻，以炮兵火力集中摧毁我阵地工事，继则轻重机枪弹如雨下掩护步兵前进，待敌人距我二百公尺进入我火力网内，我们的轻重火器一齐开火，敌人一排排地倒下去。一次、两次敌人发起冲锋，均埋葬在我们的火海里。一天的激烈战斗过去了，为了防止敌人利用夜晚的黑暗，向我阵地前沿接近，我与营长顾月符商讨计划，由他去指挥第三连一个排从阵地右翼出击佯攻，留我在指挥所（当时营指挥所有电话），可是从此与营长就失去联系，师部即任命我为营长。继续指挥战斗。第二天、第三天，日寇派飞机助战，也不过是狂轰滥炸而已，阵地上有些损伤，但无妨大体，每次敌机滥炸后，师长总亲自用电话向我询问阵地情况。在激战的第三天傍晚，阵地前沿交通壕里，第一连前哨兵俘获两名化装便衣的敌人侦探，我们从俘虏和敌

人阵地战报中，了解到一些敌情。敌称：“当面之敌顽强，进攻难于得逞”。第四天下午，敌人施放摧泪性毒气，公然违反国际公法。我本人因此受毒，以致后来右目失明。傍晚时分，我阵地右翼189团黄土岭阵地被敌人突破。我营左侧受攻，有被敌包围之势，夜幕下垂之后，阵地上敌人的红绿信号弹，已在我阵地左侧高高升起，一会又在杨柳岗西北方面的山头上升起绿色的信号弹。我们知道黄土岭阵地已失守，我不得不率领全营转移。由第三连掩护，向毛竹园核心阵地退却。却不料，拂晓前，敌人已到毛竹园前沿与我军遭遇，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战，我身中敌人两刀，尔后右膀又中两弹。由于我战士的英勇战斗，加上敌寡我众，所以敌尸遍野，敌人败退。我个人则在战士救护下，送到离城五华里的茶坞我师卫生队，以后转进白坑以北大山区。所幸我系上肢受伤，还能行走，伤后随司令部在北山浦江地区与敌人作运动战。

在兰溪郊区阵地上，我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消耗了敌人的主力。188团在兰（溪）、浦（江）路上，布置地雷，日寇师团长久井直次郎，骑着高头大马，触雷炸死，结果敌尸运去杭州火化，骨灰空运送回日本。（这事后来从敌方报导中知道的）。敌人侵占了兰溪城，我师187团、188团转移北山地区，189团渡过兰江转移到建德沿江山区。有时还突击到老阵地，抢运埋藏在那里的重兵器（当时配备在我营的两门山炮，就是在撤退前埋下去的）。有时在富春江两岸，伏击往来杭州、兰溪之间的敌人小汽艇，它是从杭州装运白糖到前线补给日军，又从金华兰溪掠夺我民间大量火腿运回杭州。我伤后住在浦江以南约二十多里的山村里，当时缺医少药，谈不上什么治疗，但天天可以吃到俘获日寇的白糖和

火腿。

在北山地带我师与敌人周旋了一个月，这时敌人已攻占了衢县、江山。我们奉命突围。有一天，根据司令部命令，战士、伤员与所有勤杂人员，白天整天休息睡觉，夜晚我们要通过敌人在浙赣铁路沿线的封锁线，转移到武义永康山区。晚上十点钟出发，担架抬着我，由浦江经上溪、鞋塘、孝顺，一夜顺利越过铁路，到达武义与永康之间的山村住下。以后完全走山中小路，经缙云、松阳抵龙泉，才乘汽车到达福建浦城，部队开往江西黎川整训，我们伤病员留在浦城兵站医院。因天气炎热，一路上又未及时医疗，我的伤口发炎，在浦城动了手术。不久转院到浙江龙泉八都镇上第十四兵站医院。我住在镇东约五里远的一山村祠堂中，这还是我们军官住的地方，比较优待些，可是医疗设备仍简陋得很。一个姓陶的外科主任医师向我说明伤势恶化的情况，表示不截肢难以治愈，我只好同意。所以我在兰溪受伤的一只膀子就这样埋在龙泉八都那个地方。为祖国为民族，成千上万的中华英雄儿女献出了生命，而我是一个幸存者，今天能够看到祖国的富强，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我是多么高兴啊！特别是我曾保卫她而流过血的兰溪市，更使我永远想念着她。特拈一首诗以记之：

当年戎马风华茂，今日斑斑已白头；
毛竹园前战火激，兰江水上血痕浮。
难忘初恋杨柳岗，犹记中洲绿水流；
四十年前寻旧梦，无边感慨思悠悠。

我爱人是兰溪人，在杨柳岗第一次见面，所以末有“难忘初恋杨柳岗”之句。

长 乐 御 敌 记

邱溪源 郑秋兔

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中旬，日军进犯浙赣，兰溪危在旦夕，县政府由城迁往双牌办公。当时县警察局和各分所奉命合编为县警察总队，下分中队，驻马公滩飞机场。同月二十五日县府令飭警察总队担任前哨拱卫，以第一、第二中队负责长乐与诸葛地区左右防务。这时，日军长官部奋勇队第二支队已从建德县下涯埠马目村偷渡过河抄山路窜入本县甘溪地区，二十七日（县城沦陷前一日）日寇已越兰（溪）、寿（昌）公路至下泉金村（今属诸葛镇万田行政村）附近，一面向长乐村包围，一面向诸葛进扑。其时，警察总队长周守璜率领直属队赶赴长乐迎敌，并命令第二中队坚守诸葛一带，以拦阻日军围歼双牌，第一中队则掩护县府撤离。中午十一时二十分，长乐附近枪声四起，弹如飞蝗，日寇遭受县警察总队伏击，虽几次集中火力向警察

~~~~~

1955年肃反后，经过坎坷三十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荣幸地被增选为淮阴县政协常委。现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

1987年5月4日写于江苏淮阴民革

总队左右两翼猛攻，但全体警察奋不顾身，沉着应战。双方激战约三十分钟，由于日寇大队援兵已到，众寡悬殊，县警察总队方才后撤。

长乐一战，保护了当时县政府的安全转移，并击毙日寇七名。县警察总队警士唐阿鑫、包守廉、周建春、赵能学、张洪松、麻樟根、严增权、骆荣生、胡荣水、江澄清、徐宝辉等十一人壮烈牺牲。翌年2月27日经浙江民政厅批准褒恤，于5月27日在诸葛镇举行了追悼长乐抗日阵亡长警大会。事前已将牺牲长警遗骨从长乐、里叶、回回塘、荷叶塘等处，迁葬在长乐与诸葛之间的土丘上，省主席黄绍雄亲题坟前碑文。县警察总队六名官佐曾获三级奖章，五十一名长警获奖金奖赏。抗日胜利后，1948年5月27日又曾在县城召开四周年纪念大会。1986年兰溪市市志编纂中，把这次战斗牺牲的十一名警士列入市抗日阵亡将士姓名录。

# 日寇烧杀大埠张

张庆珪

大阜张村是兰溪西乡一个有二百余家农户的大村落。距城十五华里。

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侵占兰城的日寇出城抢粮，驻扎于离城十五华里的上黄村。翌日凌晨，袭击离上黄村二华里的大阜张，抓去民夫九十六人，押回上黄村。由于抵估我人民抗日决心，竟令四名民夫用担架抬着日寇曹长由两名日军警卫先行离村，其余日军押解民夫九十二人稍后出发。途中，突然受到我抗日游击队阻击，一时枪声四起，流弹呼啸。稍后出发者，强押民夫于杜塔塘弯里，除数名日军看守外，全部上小山头开枪射击；先行出发的，两名警卫闻枪声即向大路口方向跑去，边跑边射击。躺在担架上的曹长向民夫挥手示意后退，这时民夫张庆根、张连伪乘机在后退中却拐弯进入黄棚园山凹，出其不意，迅速甩落担架，与敌人搏斗，打死了曹长。

下午，回上黄村之日军，寻找失踪之曹长，四处搜索。在三字桥村打死村民徐溪伪，打伤徐祥伪；在下高村打死柴奶仪；搜索大阜张则打伤张满松、张卸呆。

日军找不到曹长下落，遂一面继续搜索，一面到各村抢粮，由民夫运送至与兰城隔江相望之溪西村。

大阜张村被抓去的九十二名民夫，连日在敌人刺刀下挑运粮食。白天，头上是火似的太阳，肚子里又饥又渴；晚上则关闭在房子里，闷热、蚊咬，无法安睡，因此，身体受到摧残，五十多岁的张阿麻，七月三日晕倒在挑运途中的排岭岗，被日军用枪托打死，张杰英则于七月七日也在挑运途中被打死于埋蛇岭；舒华华因背米的白铁箱倒出了一些，被打成重伤，于逃回家后的第三天死亡；逃回家后死亡的还有张六善。

七月六日，日军窜至大阜张抓去村民四十多名。在上黄村拷问，声言三日内必须交出曹长。拷问中，重伤村民倪金凤（数日后死亡）。

七月十日拂晓，日军包围大阜张，挨户捕去村民二百多人，关押于本村张根寿家。其中，青年张连松、郭卸奶被怀疑为游击队员，在屋后空地上拷问，经折磨，已奄奄一息，最后，用麻绳捆绑，沉入房屋边的大水塘（两日后尸体浮出水面）。当日下午二时许，日军放火烧村，躲避在村内的村民向村外逃跑，受到日军机枪扫射，村民当即死二十五人，重伤七人。整个村庄被浓烟烈火所笼罩，成为火海。枪声、墙垣倒塌声、房屋梁柱爆烈声、村民哭叫声、惨不忍闻睹。日寇于下午四时离村。

日寇疯狂烧杀大阜张，欠下兰溪人民一笔大血债。七月十日这一天，共计被打死村民二十七人，受重伤数日后死亡的七人；烧毁房屋三百四十二间；烧死生猪二百六十多只、抢去耕牛十四头、鸡鸭数千只。

1987年3月于大阜张

# 日寇在三港村的暴行

王 模

一九四二年农历六月二十二日，侵占兰城之日寇三、四十人，分乘三艘汽艇，沿衢江驶往游埠镇“扫荡”。途经中洲乡三港村，被国民党六十三师散兵数人和驻游埠裘家村的地方游击队在江边阻击，击毙日寇一人后，立即转移。日寇汽艇靠岸，就象疯狗一般扑向附近的三港村、两石五、西张、金家、酈村等。挨家搜索，见人就杀，见物就抢，各村百姓闻风往外逃避，有一个绰号叫张毛志根的躲在稻田里，被日寇发现，用刺刀戳进胸部而死亡，村民陈樟清、张宽裕在村口被鬼子开枪射击，陈樟清即中弹死亡，张宽裕则弹穿肩锁骨，受重伤（现已七十多岁，尚健在）。日寇在这些村大肆糟塌后，即在民房上泼浇汽油，点火焚烧，顷刻之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躲避在外的村民，不敢回村救火，只得含泪看着房屋被焚毁。烧了半天多，三港、两石五、西张、金家、酈村成为一片焦土。共计杀死村民十四人，烧死小孩一人、奸污妇女五人，烧毁房屋一百四十四间。

以上资料系中洲乡干部姜元元所召开的座谈会上，三港村张树德、陈凤珠等所提供。

一九八七年五月三日写于兰溪

# 皈口村之战

范维德 潘锡瑜

皈口村是兰溪市登胜乡境内的一个大村。村西北和东北靠着山坡地，其中离何尖岗村较近的坡地最高，建有一座庙称白鹤经堂，是这一带的制高点。此处东可直下厚仁，西可俯瞰永昌，南可了望兰溪城，北可控制莲塘岗、东姚以及延伸到整个瑞溪乡内、外的平原。而且又处于厚仁至永昌通道之中，形势险要。民国31年（1942）夏，日军侵占兰溪城，县政府撤至汪山村（今建德属），这里成了前沿阵地，在此驻扎了军队，修筑了工事。日军也知此处是兰西地区的战略地位，几次来这一带“扫荡”。民国32年农历三月初七日，105师驻白鹤经堂的一个加强排，遭日军偷袭，全排覆没。

遭此败绩后，国民党另遣26师的一个连重建白鹤经堂前哨。该连连长姓陶，他除在经堂里驻扎连部、部署兵力外，在西南角包村岗上也驻一个排，构筑工事，安放鹿砦，与连部成犄角之势。当时，驻厚仁尚有一个连，连长蒲初民与陶连同属一个营，营部驻上山下村，团部（番号76）则驻于水亭。

一九四三年农历五月初十凌晨，日军企图故技重演，纠集兰城官兵约500人，配有几十匹驮着迫击炮的马队，经葶荠塘角、骅骝黄、胡店悄悄摸近白鹤经堂。行将拂晓，何尖

岗村两个农民肩扛扁担起早去后陆村，途过经堂坡下，日军误以为驻军之哨兵，立即开枪将他们打死。枪声一响，惊动了有着戒备的陶连，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包村岗驻军的几挺机枪也对准日军侧翼猛打，另几处哨位也开始射击，发挥了居高临下和主动有备的优势，组成一片火力网。日军遭此猛击，顿时一大群倒下去，只好胡乱地还击一阵，连迫击炮也来不及卸下使用，旋即仓皇撤进畈口村，妄图以村庄为掩护负隅顽抗。

日军进庄后，先集中于陆松鹤家的两幢对合层屋内及门口。然后部署占据村内外通道和部分民房。陆家被占为临时指挥所。由于日军闯入时天刚亮，村里群众来不及转移，极少走脱，只好在村中东逃西躲，当场被枪杀两人。

在此同时，76团迅速调遣附近驻军包围畈口村，团指挥部也从水亭移至白鹤经堂。驻厚仁的蒲连进入后陆村，登胜、胡店、祝塘、莲塘岗等村均到了参战部队，枪声四起，并有炮弹落入畈口村中。后该团侦察到村民全围困在内，又只好将炮弹打到村外，双方对峙战斗十分激烈。

到了下午2时许，日军弹药将尽，对外射击渐稀。他们开始掩埋尸体，把士兵尸体统统埋在北塘壩下土沟里，被击毙的中队长单独埋在北塘壩上堆起土坟。同时，在村里抓夫，畈口村共被抓住18人（邵竹华年仅18虚岁也被抓去），还有沿途从登胜、胡店等村抓来的都关在陆家屋里。下午8时许，日军命抓来的人抬起担架走在前面（担架约有30副左右，躺的全是重伤号）。轻伤的与押解的约百余人跟在后面，出北塘塍从清胜堂村后水田中逸去。第二批撤逃的日军抓了陆松鹤、凌如堂两人带路，到溪西后两人被放回来。

邵竹华被迫抬着担架，因年轻力弱，天黑路滑，跌了一交，被打了个耳光，大概怕跌坏伤员，另叫别人接抬，命他跟着走。行至汪高岭日军下令休息时，洪大塘头的驻军机枪打响了，邵竹华、姚如胎与陆金聚乘机逃脱，躺在稻田中，待日军走后出来，遥看畈口村火光烛天。第二天他回到村中，方知是日军最后逃离放的火。起火后，76团也先后进村。据云：村边陆堂妹家的一座箬棚是76团点的，作为台围的信号。战后第三天，76团的士兵前来挖走了埋在北塘塍日军军官的尸体。

畈口村之战给侵兰日军以严重的打击，毙伤日军无数，缴获武器，物资等战利品甚多，并使之不敢轻易下乡“扫荡”。而畈口村人民却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民房被烧毁23间（箬棚及轻度毁坏不计），陆友春家墙上的弹痕至今犹历历在目；被抓走的24人（包括邻村7人，逃回不计）无一生还，据闻进城后即被日军在东郊活埋。

（根据畈口村69岁的陆贵洪、62岁的邵竹华口述整理）

1987年2月7日于厚仁

# 五十年前东京见闻

郑根泉

一九三七年，我在日本三重、滋贺县等地考察蚕种制造业。

三十年代，日本在蚕业生产上，为了改变蚕的改良种供不应求的状况，把专场制造改变为分场制作制，获得成功。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产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有提高。当时，我国所需改良种，一部分要从日本进口，例如浙江省需用四十万张（散卵），其中二分之一须从日本进口。为了解决供销矛盾，发展我国蚕业生产，我在日本进行了考察，写了一篇专论：《日本分场制度》。一九三七年七月刊登在江苏省镇江女子蚕业学校校刊《镇蚕》上。

回忆当年与日本友人和睦相处，互相尊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不论是大学教授、企业家，或技术人员，对中国的学者、留日学生，都给予关怀、照顾。一九三七年春蚕饲育制种期间，浙江大学蚕桑系主任葛敬中教授把我介绍给经营蚕种的日本企业家福田长夫先生。福田先生家住滋贺县长滨町，毕业于京都蚕专，对蚕业生产很有研究。经他的安排，我对三重县、滋贺县的养蚕、制种的整个过程作了考察，并且在他的指导下，某些重要的生产环节，进行了实习。在实习中，技术人员热心传授知识，传授技术，很受感

动。

先后有四个多月居住在福田先生家里。他的父母、夫人和两个妹妹（福田章子和福田文子）都很热情地接待我，照料我的生活。蚕期实习结束后，他们又帮助我学习日语。离别时，全家到车站送行，摄影留念。

东京，我居住在近郊淀桥区高田马场附近的一条巷内一所日人住宅楼上，我整天集中精力复习日语和其他功课。除了假日去看望在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的浙江大学农学院同学外，很少和外界接触，甚至对福田先生也疏于通信。经过访日的浙江省蚕桑统制会秘书夏道湘先生的推荐，得到帝大农学部渡边博士和田中义麿博士的帮助，同意进入由田中义麿博士主持的农学部研究室进修。

我努力学习，加紧进修，一心想在农学方面为祖国作出贡献。但是，后来我的理想，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所粉碎。

“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朝野进一步掀起反华宣传。《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报纸每天都在头版头条报导日军在我国保定地区的战况，宣扬日军的所谓胜利。把我国军民的抗日正义行动诬蔑为“侵略日军阵地”、“支那暴戾”，而“要加以严厉惩罚”等等。煽动日本人民反华，仇恨中国。虽然如此，我的房东老大娘还是常来问长问短、替我忧虑。问我：“你的家在中国什么地方？离开华北战场有多远？”“你还是赶快回国去吧！待和平以后，欢迎你再来日本。”

日本陆军部动员入伍扩大侵华军队。任命香月为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并飞赴华北战场。东京市区差不多每天到处都有

出征军人欢送大会。凡一个单位（例如一间工厂），有应征军人限期入伍者，即在自己单位的屋顶平台上举行欢送仪式。平台四周插满彩色旗帜，并不断地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口号。

日军侵占我国一座城市或一处战略据点，各种报纸都发行“号外”，一般在下午一至三时之间，无偿分送。报工（都是成年男子）腰间系挂几颗铜铃，在大街小巷飞跑挨户分送，跑得越快，铃声越响，以引起市民的注意。我在房间里学习，一到下午，就无法平静。每听到这种铃声，就好似有人用铁针刺进我的心脏，再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

到了晚上，东京闹市区各条街道或巷口，都有三、五成群的妇女，胸前背后斜背着写有团体名称的白布，摆上一张小茶几（写字用），拦住往来行人在“护身符”上签字。这是日本妇女团体发动的护身符签名运动。护身符是作为慰劳品送给侵华部队的每个军人的。出征军人则把它放在自己的胸口，借助神灵保佑，避免战死。一到晚上我很少上街。有一回，因事偶尔上街一趟，即被这些妇女拦住叫我签名。显然这是因为他们把我当作日本人了。我虽满肚怒火，却不敢流露，只得借故溜走。我堂堂炎黄子孙，怎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符上签名！

随着反华的深入，受蒙蔽的日本人民更加歧视中国人，出租汽车司机、商店店员欺侮中国人的事常有发生。有一次，我因为身体不舒服，胃口不好，就到淀桥区一家日人开的饭馆去进晚餐。因为送来的“亲子盖饺饭”，质量很差，与玻璃柜内存放的样品完全不同，就去询问，服务员不但不给解释，反而是“支那猪猡！支那猪猡”地一顿臭骂。

自从郭沫若先生逃出警视厅的监视而回国参加抗战的消息传出以后，中国留学生引起极大波动，纷纷放弃学习，设法回家。我于八月初，整理行装，作了回国准备。

我们一行四人去横滨购买船票。从东京到横滨可以坐出租汽车，出租汽车是有的，但司机一问，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就不肯出租了，我们只得去挤公共电车。那时，中日之间，有日本的邮轮“长琦丸”和“上海丸”分别从横滨和上海对开。我们考虑再三，决定放弃乘坐“长琦丸”，改乘美国邮船。八月九日，行李经过日本警察的仔细搜查后，我和浙大同学胡瑜（女，研究蚕桑，现侨居美国）、章恢志（攻园艺）、顾辛汉（研究农业社会学）以及中央大学农学院蚕桑系毕业的曹吴伯夫妇等一行六人离日返国。从横滨启碇经神户将近上海时，遇十二级飓风，漂流两天，于八月十二日凌晨抵达上海。这正是“八·一三”的头一天。

写于一九八七年二月兰江之畔

# 抗战期间青阳记事

郑根泉

一九三八年秋，我应聘去安庆任安徽省棉蚕改良场蚕种部主任。因日寇侵华日紧，安徽省府决定，省级事业机关撤销，人员遣散。省棉蚕改良场也在裁撤之列，我即被遣散、徘徊于安庆街头。适遇友人朱毅生刚谋得青阳县县长一职，即将赴任而缺助手，意外相遇，被邀同往。

一九三七年一月初的一个夜晚，我们于八时左右渡江在大渡口上车，夜半到达青阳县政府。当时青阳城内广西部队驻扎，百姓大多逃难，商号也已停业。原任县长董彬谦已逃往乡下避难。当晚由科长接待。次日下午董才返县府，虽感突然免职但情绪无大波动，因时值兵荒马乱日寇即将压境之际卸此重任反觉轻松。朱接事后，每天忙于应付兵差，我的任务是保管县印与一封密电码，万一日军进陷青阳，按规定县长不许离境，朱嘱我如有不测将大印与密电本上交省府。

一个月以后，两广部队调往武汉，接防的是四川刘湘部队，番号是23集团军，总司令是唐式遵。当时日军陷芜湖后，在繁昌南陵一线构筑工事，暂停前进。因此作为繁陵后方的青阳县又恢复了热闹，商店开门营业，县政府开始正式办公，朱的班底也从汉口来到青阳，我将工作交出，成

为一个挂名的幕僚，至七月才回到杭州任事。在青阳几个月中有些事值得一记：

一是兵差没办好，县长险遭军法从事。一九三八年三月间，因奉省府和专署电令限期破坏青阳境内的公路设施，发动民工经一昼夜只完成路面破坏，但第二天早晨某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来到县府，在县长办公室大发雷霆，指责朱县长是汉奸要处以贻误军机之罪，因当时其部队过境而路面被破坏，经将上峰电令呈阅后才略缓和，命令：“待军车开过后再彻底破坏。”朱只好讨了上官的手令又派民工将路面修填，幸而桥梁涵洞未破坏，否则定遭杀身之祸。

二是抓汉奸。青阳地处前线，常遭日机扫射与轰炸，小汉奸活动猖獗，有在水井投毒的；有在日机空袭时用白布和小镜子指示投弹目标的；还有刺探军情的、因此青阳县政府组织了锄奸队，捕获许多小汉奸。还曾奉省政府密电逮捕九华山祇园寺方丈。县政府只是执行上级命令指其是大汉奸，由于驻防部队司令唐式遵信佛，祇园寺僧众向唐求援，唐即出面命令释放。县政府连夜将方丈押送过长江到六安交差，以早已解省向唐解释，从此驻军对县政府一直不满。

三、是光杆游击司令。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战区前敌总指挥薛岳派了少将副官处长赵凌霄来青阳组织“石太涇青贵”地区游击司令部，赵为司令，还带来一名副司令（上校衔，姓名已忘）和几名勤务兵。司令部设在青阳县政府附近民房楼上，真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我被聘任为司令部秘书，每天晚上等司令过足鸦片瘾后才开口交代拟稿，拟好后念他听过即可交勤务兵送电报局拍发。这个地区游击司令部是在日寇进占前作好准备，把五个县的县长委为县游击司令，把各

县的警备队和警察编成游击队伍。发电报内容：第一道是任命县游击司令，第二道是令各县上报枪支、弹药、被服装备……等。一个月后，受上峰电召，赵司令摘下招牌去屯溪，光杆司令从此下台。

四、是新四军过境。青阳县的大通镇是通向皖北的大渡口，新四军一支队在陈毅同志率领下，曾从泾县经青阳的大渡口北上抗日。事先接到新四军军部的通知，青阳县也作了送迎准备，如茶水、柴草、主副食以及民夫等，指定由地方组织“青阳县抗日后援会”和“青阳县战地服务团”派员前往迎送。但新四军一支队过青阳时未进城，绕道径向大通镇前进，不接受地方上给他们准备的粮食柴草副食品，更不要一名民夫运输。县政府接到一区王区长的口头报告时，新四军一支队的指战员早已到达大通，准备过江北上。这与国民党的军队过境迥然不同，青阳各界人士对此无不赞扬和敬佩。

# 回忆日本投降前后三件事

黄寿朋

（国民党陆军大学少将翻译官  
兼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译员）

## 一、特急任务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接待从室紧急电话：“今天下午六时，去九龙坡机场，乘专机去赣州。”一会儿，又接军需署署长陈良（大陆解放后曾任台北市市长）电话：“奉何老总（即何应钦）命令，立即去军政部接受特急任务”。

什么特急任务呢？如堕五里雾中，疑虑莫测。

我到了军政部，何说：“此行你去赣州，担任押运军费一千五百万元关金券的任务，该项押运，你负全责。”接着，飞行员方某某，押运助理陈某某前来报到。何命令他们听从我的指挥，如有差错，军法从事。说毕，立即用小汽车把我们送到九龙坡军用机场。时场内警卫森严，斜阳残照，寒风凛凛。包装好的关金券，如同两件大号棉纱一般，送入机舱。到了六时，专机隆隆发动，我们进舱后，盘旋一周，腾空而起，暮色苍茫中告别重庆山城，向东南飞去。

俯瞰山川原野、房屋树林，均一片模糊，唯有大城镇的

灯火，象天空中的繁星，一闪而过。飞机在暮霭中穿过群星飘荡的云层。突然听到飞行员的声音：“报告！前方衡阳上空，是我们必经航线，发现敌人高射炮信号弹，须速应变。”话音刚落，专机抵达敌人火力阵地上空。信号弹如流星般飞向我机周围，炮声隆隆，机枪声哒哒。飞行员说：

“怎么办？”我看了一下表，七时零五分。这时，敌人的高射炮已组成密集的火网，包围住我们的机身。我当机立断，大声说：“升高至三千公尺。”随着机身的迅速升高，我感到头晕眼花，呼吸迫促，心跳加快。时敌弹虽未稍减，却只能落到我机之下了，不能命中。但高空飞行，负荷过大。飞行员用尽全身之力，满头大汗，终于飞离敌高射炮阵地上空，脱离险境。我说：“中速夜航，注意敌机截击。”这时我们虽然感到精疲力尽，却因脱离险境而精神振奋。夜色茫茫中，通过无线电联系，当晚九时二十分，安全降落于湖南攸江机场。受到了热情款待。

次日上午六时，天色还昏暗，专机绕场盘旋升起，向赣州进发。一会儿，东方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专机冲破晨曦的寂静，越过沃野山川，经过一小时三十五分钟，顺利到达江西赣州。

飞机徐徐着陆。只见一簇簇人群，在机场出口处蠕动。当我走出机舱口，一时鞭炮声、欢呼声，响彻机场。前来迎接的首先是专员蒋经国的代表何秘书，然后是中央社战地记者彭河清（是我在中央政校的同学），两人带着十分诧异而又非常喜悦的表情，各握住我的一只手，紧紧不放，簇拥着向前走去。

彭河清拿出一份同盟社（日本通讯社）衡阳十二月二十

八日的电讯给我看。上面分明写着：“中国军用机一架，于今日下午六时，由黄寿朋等三人押运军费二大捆，从重庆九龙坡机场飞赴赣州，经衡阳上空，被我皇军高射炮击中，机毁人亡，残骸堕落在离衡阳东南三十公里之小山坡上，狼藉满地。”我看了后，觉得日本的消息为何如此灵通？真是怪事；又觉得日本已经不行了，只得用造谣来过日子。这时，中央银行赣州分行金行长及当地金融界人士，一齐拥上前来，高声嚷道：“财神，财神！恭喜鸿运。”一片欢笑声和对日寇的咒骂声。我们乘小轿车进入专员公署。

中午，蒋经国专员设宴庆贺。席间，频频举杯。蒋对我说：“这次同盟社为他自己拙劣的高射炮表功，说我们机毁人亡。害得我们为你受了一场虚惊。”晚间，赣州金融界设宴庆喜。翌日，第三战区司令部和东南驻军发来贺电和慰问电。

## 二、来到浙西

重庆为了配合盟军登陆，加强浙江战斗力，在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的所在地——昌化汤家湾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浙西区团。经张治中将军推荐，我出任区团的主任兼盟军登陆联络官。张在一次谈话中，对我说：“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是你在中央政校的指导员，你们人事上能互相协调；你过去干过翻译多年，能与外国人打交道，所以委你干这个工作。你年轻力壮，应该有所作为。”但我深感缺乏地方工作的经验；加之人、地生疏，迟迟不敢奉命。正在踌躇不前之际，消息灵通的童友三（浙江省政府驻渝办事处工

作)前来联系,约我到他办事处聚首交谈。我们两人都是浙江兰溪人,所以我们首先叙了同乡友谊,然后由他详析浙西形势,并说愿意为我提供方便。我因之受到鼓励,有了信心,遂决定赴任。

一九四五年一月中旬,我抵达汤家湾。谁知,浙西区团于一九四四年十月间已由林光宇组成,并任主任。听到中央派我前来浙西,他只得拂袖离去。所以我是萧规曹随。当地还有一个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浙西办事处,是罗露天的办事处主任。省府浙西行署、省党部浙西办事处、三青团浙西区团,三鼎立。但是真正有抗日力量的只有天目山的新四军。

浙西区团成立开始,适逢日寇在浙西两次流窜。我们做了些什么事呢?可以说没有什么建树。何况只有七个多月的寿命。因为日寇投降,便推进杭州。记忆深刻的,有两件事:

五月间,驻扎在昌化、于潜的国民党二十军陶柳、陶光部队,平日挂抗日招牌,实则鱼肉乡民,民怨沸腾。经过我实地调查对证,确实与百姓为敌,以电报要求撤离未成,就亲自去上饶三战区,告诉司令长官顾祝同,请他从速处理,结果,该部队撤离昌化、于潜。百姓拍手称快。

一九四五年四月下旬,浙西行署贺主任来电:“海宁乡村降一美军飞行员,即请前往联系。”行署外事科长赵福基同行。原来,这位美国飞行员(Mr. Smid),是陈纳德飞虎队队员,由于飞机故障,被迫降落,我们与之交谈,设法提供修理机件,并设宴招待。他深为感佩,送给我们卡宾枪一支,子弹五十发。

由于太平洋战局的发展，美军不必在浙江登陆。因此，我这个联络官就没有做多少联络工作。

### 三、接 收 杭 州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正在兴高采烈，忽接浙江省政府发的急电：

“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和区团主任黄寿朋，于八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到达钱塘江大桥西兴江边，代表省府参加杭州日军受降仪式，并推进杭州，暂代接管杭州部署事宜”。

我们组成十人受降团，指派了先遣和随从人员，立即出发。于八月十五日下午赶到桐庐。翌日，乘汽艇经富春江抵钱塘江边的西兴。

八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我们一行十人威武地向江边受降日军（宪兵队）驻地前进。向东望去，我国国旗迎风招展，我们行进至日军二十公尺处，听见日军队长向士兵喊出行礼的命令，于是日军士兵恭敬地向我们施以注目礼。接着队长又命令：放下枪！日军九十余人无可奈何地放下了枪支弹药，剥下了军服，听候处置。

曾经在我国神圣的国土上横行霸道、杀人放火的日本侵略军，终于解除了武装。被押送至战俘集中营。我们分别点清服装、武器后受降仪式完毕。即乘敞篷小轿车通过钱塘江大桥，向杭州市区进发。

出了钱江大桥，进入南星桥，通过环城路，经过城站，我们到达三元坊的盐业大楼——接收杭州临时办公处。站在街道两旁的人群，看见我们如见亲人，欢声雷动，但也不

断听到悲哭声。断垣残壁以及街头巷尾堆积如山的垃圾，髒乱不堪，到处留下日寇蹂躏的痕迹。

当天晚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宣布“约法三章”。不得害国殃民，不准搞“三条”（金条、封条、字条）；整顿市容，清除垃圾，刷清标语，取缔淫秽歌曲、靡靡之音，娱乐场所加以管理；随后即开展锄奸，汉奸该抓的抓，该办的办，以平民愤。动员一切力量，军民齐动手，七天后，垃圾搬运一空，标语粉刷尽净，亡国之音也减少了，大小汉奸捕了一批。

因为我们是前进指挥所，职权与期限都有限制。待浙江省政府的人马一到，我们立即全部移交。

对于那些要我用“封条”为他们占据房屋的，我没有“应命”，很长时间，受到他们的鄙视，我却心里坦然。

（一九八七年四月于浙江兰溪）

# 兰溪收复经过

邱溪源      郑秋兔

日军进犯浙赣时，兰溪县城被日军酒井师团（简称70师团）窜据。金兰铁路沿线之板桥、洞源乡，以及城郊之岩山、溪西、雅滩等乡村相继沦陷。当时兰溪县政府由马达辗转至双牌、寿昌、淳安等处，最后在华南乡汪山村办公。日军盘据县城后，在城内四周筑垒固守，并组织了傀儡政权，对沦陷区的人民进行血腥统治。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美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八月，苏联宣布加入此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兰溪县政府于是年八月十二日在汪山召集所属各机关、团队负责人及驻军长官紧急会议，商讨收复县城的准备事宜：

1. 由马达、雅滩、莲花、赤溪、溪西、殿山等乡向富户提借存粮（大米）2000担，集中候运。

2. 令各田粮办事处催收大户赋谷，起碾大米，集中候提。

3. 动员洞源、板桥、岩山、女埠、厚仁等乡代办柴爿1000担，集中候用。

4. 调查各机关搬迁回城所需民夫计划，依照各乡壮丁数按比例分派民夫，随时调集运输。

5. 拆除各条电话线，专线架设由汪山至厚仁、溪西的

电话线路。同时调整递步哨（即邮递哨）

6. 政军警统一指挥，分工行动，向城区推进。

在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的前夕，即八月十四日，兰溪县政府办事人员与军警进驻厚仁乡后陆村。当日突击第三队副司令戴镇球奉命带领部队赶赴畈口村扎营，配合县政府行动。

八月二十三日，县自卫大队从女埠渡江进驻黄泥岭、石渠、马涧一带。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吴山民部也集结在金华曹宅一带准备经浦江县白沙进入兰北。是日县政府人员及军警则南渡衢江至雅滩乡路塘村，同驻军预备三师八团（团长丁葆真）会合，以备随军行动。同时又派便衣人员进城对日军进行监视，并组织与督导民夫抢修兰溪—龙游与兰溪—金华的公路。

八月二十八日，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电令：“金、兰敌将退，派员入城维持秩序，以安民心”。县政府即派民政科长姜瑞璋等人入城。是时，日军守备部队队长福岛，因未接到撤离命令，仍派兵在城郊据点固守。

八月三十日晚，县政府得悉日军将于三十一日拂晓全部退却。因此于三十一日晨五时，县政府、县党部、参议会、地方法院、法院检察处等有关人员及警察局员警，会同驻军三师八团官兵由路塘村一直向县城挺进。从马公嘴过渡由南门入城；另一路从游埠乘船以水路抵西门上岸入城。人民夹道欢迎，鸣放炮竹不绝。入城后，由日军福岛中队以战败国身份向驻军预备三师八团二营营长罗勋投降。被日军蹂躏三年又三个月另三天的兰城至此遂告收复。当时，兰溪县政府布告安民，县导报发出号外，迅速传送到各乡村。城区各

镇曾实施交通管制，并举行户口突击检查。

八月三十一日，兰城收复时，城内留有日军福岛中队及由徐立刚维持汪伪政权残局的兰溪各界联合办事处。日军与汪伪政权所设机关早已分崩离析。各种案卷、册籍、财产、物资也已一无所存。此时之兰城，由于长期遭受日军摧残，瓦砾遍地，满目疮痍，惨不胜睹。经过举行大扫除，清理垃圾，刷洗日伪留下的文告、标语，以整洁市容。离城避难的群众，也连日陆续回城，商店纷纷复业，市容才逐步恢复。

（本文根据档案资料整理）

# 红军烈士林来均事略

林庭松口述 王模整理

先父林来均，原名来照。一八八二年十月十日出生于青田县西都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随叔父林金明逃荒至汤溪县郑家村（现属兰溪市下王乡）安家。靠租佃土地、开荒扩种度日。先父幼年聪明过人，虚心好学，有了小学文化以后，跟随青田籍中医胡医师学医。学会了一些中医秘方，免费治疗无名中毒以及其他一些小毛病，被誉为土郎中。

一九三〇年冬，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一师攻打黄岩县乌岩镇战斗失利，军、师主要领导人员相继牺牲。幸存者郑秣隐蔽于自己的家乡青田县罗溪村。偶遇回原籍青田探亲的兰溪孟湖乡村民林云照。谈论中，知道兰溪、汤溪交界处居住着一批青田籍贫苦移民，利于开展革命工作。郑秣遂秘密来到兰、汤一带，从青田籍移民中发展红军。先父林来均就在此时和其他十余名同乡较早地被吸收入伍，并成为红二师的骨干力量。他们利用各种形式，发动、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活动。红二师迅速得到发展。以包郎殿、郑家村、山塘沿村为中心的十三个乡七十六个村先后吸收六百多名战士，扩大了革命武装。接着提出了打土豪，实行“二五”减租的口号，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纷纷建立农民协会，进行抗租反

霸斗争。林来均跟随师长郑秣活动于龙游、兰溪、汤溪、寿昌一带，不顾疲劳，不畏艰险，为扩大红二师、为建立革命根据地作出贡献。

后来，青帮团伙江天吉参加了红二师后，由其师傅兰溪青帮小头目朱金奎（即朱讨饭）的引荐，充当了浙江省保安处密探，成为可耻的叛徒。由于红二师未能及时了解这一严重情况，以致红二师的领导成员和战士，陆续被捕。汤溪县政府贴出布告，红二师成员必须在规定期限内自首登记，交出武器、弹药、编制符号。抗拒者，就地枪决。并在游埠搭园殿（现游埠区校所在地）设立自首登记站。在敌人的威胁、诱骗下，红二师部分人员向敌人投降自首并参加了自新教海班的所谓“学习”。

先父林来均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中，革命意志坚定，不动摇、不退却，抗拒履行“自新手续”。改名换姓，离别妻子儿女，远奔他乡。先后流动于兰溪的官塘、洲上、香溪以及建德、淳安等地。或进砖瓦厂做工，或上山砍柴以度日。

汤溪县政府捉不到林来均，遂贴出“捕获林来均者，赏大洋五百元”的布告，经常来我家搜查，我大哥林汝根被折磨得卧病在床。

一天夜里，先父来家看望汝根，不料，被汤溪县警察局任职的同村郑某告密，这天深夜，百余人突然包围郑家村。先父来不及逃离村子而被捕。关押于汤溪县政府。敌人软硬兼施，先后用了“老虎凳”、拔指甲、酒精灌鼻等重刑。但先父宁死不屈，对红军的组织人事机密坚决不吐露一字。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被敌人枪杀于汤溪西门外，时年

五十二虚岁。经当地亲朋好友收殓，埋葬于郑家村小山坡上。

解放后，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四日浙江省人民政府第八专员公署追认林来均同志为革命烈士，发给烈士证书。并在郑家村所在的寺基乡举行了追悼大会，由乡长郑月松致悼词。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换发给革命烈士证书。

# 烈士翁友廉事略

八十三岁老人 林庆貽

翁友廉又名介平，化名张谦。女性，系杭州翁家村人。性豪爽，胸怀革命壮志。抗日胜利后来兰溪市内电话公司任话务班领班。她善于团结同事，经常于业余时间与大家共同阅读进步书刊，搞文娱活动，从而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国民党反动阴谋。她与金华英士大学学生张健（原名朱锦明，现在兰三中任教）交往频繁，还向张谈自己的斗争经历及今后奋斗目标。

一九四八年，她和暂居兰溪的宗文中学毕业同学张冲（原名张秀卿，现系北京城建工程公司离休干部）及电话公司的女同事在兰溪开展多种团结青年的进步活动，如演出话剧“雷雨”，为河南流亡来兰的中学生举行“义演”，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她还到流亡学生中去举行秘密的谈话会和个别谈心，指出国民党欺骗的伎俩。力劝他们绕道湖北，回到已解放的家乡去，不少学生觉醒后悄悄离兰踏上归途。

一九四九年三月，因革命需要，经张健介绍，翁友廉带张冲、张萍（原名李月波）一起去金萧支队游击区搞妇运工作。

时过不久，金萧支队又派江平（现在长广煤矿工作）王康（王中鑫，现在金华一中工作）与何水等潜入兰溪进行城

市统战工作。他们的立足点就是翁友廉有过影响的电话公司。电话公司的林淑媛、高庆英、程蓝华、董樟安等不仅掩护江平等，还主动配合工作，为解放兰溪作出努力。

一九四九年四月，因电话公司的信件在审查中被扣，因此特务赵××带领爪牙于半夜将电话公司包围搜查，幸事先已将进步书刊与有关信件等全部转移，未被抄获，只将林淑媛逮捕，押解义乌专署审讯。审讯中林淑媛坚贞不屈，后经多方营救才获保释。

与此同时，翁友廉与战友转战于萧山、浦江、金华、义乌等地的农村，于四月十三日夜间，在一次行军中，她不幸壮烈牺牲，时年25岁。

解放后，张健、张冲、沈民威（翁的未婚夫，现系甘肃煤炭基建公司干部）和她生前战友程蓝华、林淑媛、高庆英及亲友们齐集杭州为她举行了追悼会。

翁友廉在兰溪工作期间，其革命行动，团结友爱精神无论同事过或接触过的人有口皆碑。回忆当年，我亦是思想上受惠者。她与我女淑媛共事，志趣相投，情同姐妹，常来我家，谈吐虽不多，但我颇受其影响。当我女被逮事件突然发生时，我临危不惧，未乱方寸，不惜化掉历年积蓄，千方百计营救，使我女获保释，也保卫了地下党的安全。解放前后，在伟大的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我能真诚地跟共产党走，为党的事业贡献绵力，均来自翁友廉影响所产生的力量。时至暮年，我挂一漏百地写了翁友廉的事略，以寄托我的哀思而慰烈士在天之灵。

# 雇农加薪和佃农二五减租

八十七岁老人 黄绍衡

一九二七年秋，中共浙江省委派姜挺为浙西特派员兼兰溪临时县委书记。他一到任就在下黄殿召开临时县委书记会议。会议决议之一是加强农民运动。从此，兰溪的雇农加薪和佃农找租运动就展开了。

## 雇 农 加 薪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兰溪县农民协会在城区药皇庙召开各区代表大会。会后，县农协常委徐玉衡就到诸葛区翁家村马塘殿召开了西乡各区雇农大会，参加的有永昌、水亭、游埠、柱阳、诸葛等区的雇农。会议决定雇农加薪30%。附带决议：裁缝、篾匠每天工资二角二分增至二角五分；木匠、泥水由二角五分增至三角；石匠由三角增至三角五分。会议责成各区农民协会督促实行。紧接着各区都开了雇农雇东会进行谈判。

南乡的从善区闻风，首先开雇农雇东协会，特邀请徐玉衡、国民党县党部指导员徐士彬（共产党员），城南派出所所长胡风标参加。雇东是以包焕庚为首的30来人，雇农代表有严顺有、叶卸苟等约200人，还有区农协代表邱福祥、陈子清、郑根土等。会上双方展开激烈争论，最后达成协议，

雇农加薪40%，超过马塘殿决议。

西乡各区通过协议，均按马塘殿决议执行。游埠区还采取农协干部带头到雇东家督促执行。

但是地主豪绅们言行不一致，且暗中图谋推翻协议，有的还解雇雇农积极分子，因而引起雇农大罢工，从善区的罢工持续二十余天。才获得胜利。

一个多月以后，从善区的包焕庚、诸葛区的朱文奶，永昌区的徐大马奶又拒绝雇农加薪。他们联名向县政府控告，说农民受共产党利用聚众捣乱，并收买地痞流氓探听共产党的消息。一九二八年一月七日，地主朱文奶探得姜挺到翁家。当即向驻永昌省防军告密，当夜姜就被捕。次日，兰溪县长余铭铨，省防军第一团团团长蒋僎联合发出布告：“……自今以后，在本县范围内，停止一切民众运动，凡农民协会，工会及一切其他民众团体，不得公开集会。如违严惩不贷。”自此，农协活动转入地下，雇农雇东协议也就无形取消了。

三月间，中共中央巡视员卓兰芳发动一次雇农加薪斗争。当时正值春耕大忙季节，卓兰芳亲自起草罢工宣言，全区400余名雇农行动起来一致罢工，并组织纠察队防止破坏。各雇东怕误了农时，只好恢复30%的加薪。

同年七月，从善区也进行了一次雇农罢工，要求恢复加薪协议，中共兰溪县委（此时县委已正式成立）为此发布了《为南乡罢工告全体同志书》，但未达到预期的结果。

## 佃农二五减租

兰溪佃农二五减租运动也是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开始的。国民党政府原有二五减租之规定，但不实行。当时兰溪各佃农已交了组，故这次运动特称二五找租。临时县委和县农协以从善区为找租试点，该区又选定从下余村大地主吴品有家开始。作法是由农会干部率领佃农挑起箩筐叫吴品有按二五减租标准退回多交的租谷。起初吴气势汹汹地拒绝，引起公愤，要将吴捆绑游行示众，这一来，吴就软下了，只好按规定找还各户多交的租。风声传到全区，其他地主也就不敢违抗了。县农协常委会以此典型通报各区，各区找租运动也就开展了。

西乡找租斗争，选定水亭区先开始。县委派陆确中，李南南（原武义地下党负责人）到该区协助。首先在祠堂脚村召开找租大会，参加者有300余人，由童文仙作报告，群情激昂。会后即由童文仙、童友三等领着佃农30余人到大地主童凤森家，他不敢抗拒，推却说：“等其他家做了，我一定照办。”大家深知童是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家不动，会使找租带来困难。大家通力催逼，使他无可奈何地找了租。继又到溪童村地主童锡林家，他知童凤森已找，也只好照办。

水亭区找租很快地普及各村。在此影响下，大地主李企培还自动退还各佃户多收的租。全区找回租谷10余万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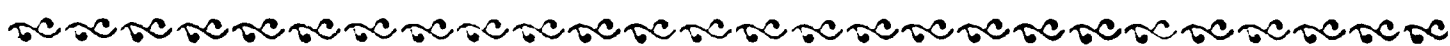
为扩大二五找租的影响，柱阳区还举行示威游行，以连塘岗村为主，联合邻村一起行动。参加者达1400人左右。他们一路高呼口号，张贴标语，还助以乐队，声势浩大。尔

# 古塘村农民协会的抗酒捐税斗争

八十四岁老人 童文仙

国民党统治时期，兰溪县税捐局对家酿酒要收税，这是收税员发财的捷径。李辛甫在水亭区古塘村一带，当了十多年的收税员，就挣得一份很大的家私。一九三七年十月，古塘村成立农民协会，会场中有一张废除苛捐杂税的标语，会员们就提出问题：“家酿酒税是不是苛捐杂税？”讨论结果，认为这正是苛捐杂税。于是就纷纷反映收税员李辛甫在古塘村的敲诈勒索行为。

十月二十八日，发现李辛甫已经到水亭镇酒店里了，可能明天要到古塘村来敲诈。村农民协会立刻开会研究，决定明天联系黄村坞、上方等村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武装，到路上迎击。经古塘村党支部批准，并指派徐焕文为队长，于第二天（十月二十九日）下午，集合农民二十余人，各执锄头扁



后，永昌、游埠等区也起来示威。

当时，从善、水亭、游埠、诸葛、永昌、柱阳、甘溪等区基本上实现了二五减租。但平渡、殿山、溪西等地，却没有进行。

写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担，一齐出发。路经午塘边村，到达鸡宝岭村时，适逢李辛甫乘轿而来。农民马上迎上去，把李辛甫从轿里拖出来，农民黄卸根用锄头向他头上打去。李头上鲜血直流，与两个轿夫抱头鼠窜逃往午塘边村。农民从轿中搜出一只鸦片箱，内有一枝鸦片枪、一包鸦片烟，即刻交水亭区派出所。

第二天上午就有浙江省防军一个排，由张排长率领，开到午塘边村，在徐用扬家驻扎。古塘村农民协会闻警，立刻集合队伍，防守村口，严加戒备。省防军只得搞阴谋，以徐用扬名义，伪称邀请徐寿椿、徐耀祖二人，前来谈判。张排长看见二徐来到就高叫：“快拿绳子来！”士兵们马上把徐寿椿等捆绑起来，在徐家宿了一夜，次日即押送到兰溪县政府监狱内关押。事情发生的当天，中共古塘村支部就写信派徐焕文至诸葛向兰溪县委汇报（此时兰溪县委已由胡塘村迁移到诸葛姜挺家中暂住）；一面又写信向全县各区农民协会报告详细情况，并要求给予大力支援。根据兰溪县委消息，新任国民党兰溪指导员徐士彬，龙游人，系中共地下党员。因此，又立刻去信，要求设法营救出狱。

徐士彬刚到兰溪，但已了解兰溪县长余铭铨这隻老狐狸，一会向左派捧捧，一会又向右派拉拉，十分狡猾。他看了古塘村支部的来信，心中乐滋滋的，认为兰溪的农民运动，搞得不错；一面又认为余铭铨左右摇摆的政治态度，若不给以当头一棍，恐难达到营救二徐的目的。第二天即到县政府问县长余铭铨：“前日为何逮捕古塘村农民徐寿椿、徐耀祖？岂非破坏全县农民运动吗？”问得余铭铨瞠目结舌，良久不能回答。只得笑着说：“指导员，你不必着急，这件事我原不接头，待查清楚了再作处理。”到第三天，徐寿椿、

徐耀祖二人无罪释放。古塘村农民协会获得这个消息，即刻派出二人，到兰溪去迎接。他们走到水阁殿，就碰到徐寿椿等二人，大家都很高兴。就沿途在水阁殿、汪高岭、永昌等地向群众宣传抗税斗争的过程。原来自从古塘村农民协会开展抗税斗争，徐寿椿、徐耀祖遭省防军逮捕以来，各村农民抱着沉重的心情，担心抗酒税农民会不会受政府的严重处罚；农民协会会不会被政府宣布解散？今天亲眼看到两人无罪释放，因此听众个个眉开眼笑，高喊：“农民协会真有权力！”不几日，消息全县传开，大大鼓舞农民们参加农会的活动，把兰溪县农民革命运动推向又一个高潮。

（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于兰溪孟湖）

# 我第一次被捕入狱记

八十四岁老人 童文仙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中共兰溪县委领导永昌  
区后陆村农民暴动。到第三天，敌人派省防军一排到后陆村  
作现场调查。结果认为暴动者只杀人不抢劫财物，肯定是共  
产党所为。共产党到底在何处呢？他们经过一周的调 查 研  
究，认为共产党是在水亭区祠堂脚村。第一，去年十月，该  
村农民协会成立时，曾结队到井头童村童凤生家破仓找租。  
第二，该村崇文小学今年正月开学后，连日演出话剧，宣传  
共产党革命道理。第三，今年春耕季节，又由该校出面，发  
动水亭全区雇农罢工。第四，有该村附近绅士童凤生、徐  
椿、李企培等十余人联名控告崇文小学是共产党机关。于是  
五月十二日凌晨一时，敌人派遣省防军、警察一百余人、县  
长、警察所长、连长等官员亲自出马指挥，由兰溪县城出  
发，向永昌经双塘下村，直扑祠堂脚村。早晨六时，包围祠  
堂脚村。一百多个武装，搜查了崇文小学以及全村各家百  
姓，一无所得。闹腾至下午二时左右，逮捕了童文仙、童友  
三等十余人随部队开向水亭，至水亭区校（关帝庙）歇息，  
并吃了晚饭后把我们押解到兰溪，当到达兰溪县监狱时已经  
九点多钟了。狱卒们出来把我们分发到十多个笼子里去关押。  
我在狱中想起严汝清前几天给我的一封紧急信说：“最近敌

人决定对我们采取打击行动，你们必须警惕，除县委机关重要文件，装入小皮箱派可靠人员秘密送城内北门外日新商店，校内外一切有关证据一律销毁，以免落入敌手。”我接得此信后，召集校内党支部商议应变办法，派儿童团站岗放哨，一面销毁有关证据，一连忙了几天。想今天虽然被逮捕了许多人，料他们已得不到什么东西了，心里反而坦然起来，呼呼入睡。

到了五月十九日下午七时左右，忽然来了二十来个省防军，狱卒打开牢门，叫我们十六个人出来，省防军立即用绳子把我们紧紧地捆绑起来。难友们脸色灰白，女教员毕允馨年轻胆小，哭了起来。我看了心中着实难过，靠近童友仁问他为什么这样，他答：“要把我们解到南门溪滩枪毙了。”我说：“不会不会，放心好了。他们拿不到一点证据，那里就好枪毙呢！只要我们坚决不承认，包管没有大问题。你赶快向他们传达，放心，不要哭。”这样一来，大家稍为安静一点。过一会，两个兵押我们一个，整队从大街向东门出发。大街上人山人海，他们低声呼叫：“这些就是共产党员！”过了一会，就到了孔庙，这是省防军第一团团部（即现在的兰溪第二中学校址。）我们进了团部，在院子里休息，仍由两个省防军看管着，不准互相谈话。忽听里面传叫：“童文仙进来！”我被押进审判厅上站立，我看到大菜桌后五个审判官一排地坐着，中间一个是省政府第四科长何炳达，左右两边是县长、警察所长等官员，两边还有两行警察站着，法庭好象戏台上六部大审的样子。首先由何炳达问过姓名、年龄之后，第一句就问：“你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的？”我答：“我没有参加共产党。”过了一会他又问：

“那么你为什么去参加后陆暴动呢？”我听了就大叫起来说：“啊呀，我并没有参加后陆暴动，长官你为什么这样说呢？”他笑起来了，更加和气地说：“童文仙，你不要怕，我们是来挽救你们的，只要老实说，我们决不难为你，也许今天就把你释放出去，好不好？”我回答：“你的好意我感谢，只是我实在没有这些事。”停一会，何炳达又和气地问“那么，你农民协会总参加了的。”我回答：“参加了的，我参加的农民协会是国民党领导的，长官不信你马上可以到县农民协会去调查。”我这话没有说完，何炳达就放下笑脸，右手向桌上一拍，喊道：“混蛋！下去！”

第二个受审的是童友三，何炳达虽也十分认真的审问，但童友三也并未承认自己参加过共产党。依次是毕允馨、童友仁等，都说：“不知道。”待十六个人都审完，已是十多钟了。总结这次审判，敌人的成绩等于零。何炳达等法官只好收场结束。

第二天，何炳达和他的喽喽虞洽廷等亲自把我和童友三、毕允馨、童友仁、施源、李南南六人，押解到杭州陆军监狱关押，案子由浙江省特种刑事法庭处理。

这是我第一次被捕入狱。

写于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井头童

# 兰北浦南一带地下革命斗争的回忆

陈宪章撰文 徐迅整理

我是兰溪市下陈乡白鸠村人（白鸠村过去属建德大洋区管辖），曾参加兰北浦南一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革命斗争。今年已经七十四岁。为了使下一代了解我党地下革命斗争情况，留下一些史料，现作一些回忆。

## 白鸠村一带的地下革命斗争

三十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村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我村也有了八名共产党员。一九三〇年四月，上级派了一位共产党员名叫童祖凯到建德大洋区开展革命工作，发展革命队伍。不幸，在同年农历五月十二日被捕，不久就在梅城杀害，头颅悬挂城墙上。在村中的八名党员中，也有周福余、滕成法、邵老四、周岩水四名党员于第二年被国民党枪杀。在这白色恐怖下，使白鸠村的地下革命斗争处于低潮。一九四三年四月，鲍志俊同志从监狱中逃出来后，与上级派来的党代表陈祥凤同志一起到白鸠村组织革命活动。当时决定白鸠村的地下革命组织，由鲍志俊任大队长，徐可进任秘书，蒋理法任情报组长，蔡云松任副组长，祝建春任情报员，我任经济保管员，徐时书任粮食保

管员，鲍江江任情报站站长，蒋根姣任分队长，童家祥任情报站副站长，童家土任情报联络员。共有人员30余名。

白鸠村地下革命组织恢复活动时，正处于日寇侵兰时期，一些地痞流氓趁机组织了匪部，抢劫民财、强奸民女，无恶不作，并与我们为敌。

一九四三年五月，我们又在大厦口村的黄忠山家里建立了秘密联络点。当时所属的干部有：鲍志俊、徐可进、陆寿松、蔡云松、蒋理法、童家祥、童家土、鲍江江和我等人。部队定名为“听信队”。由徐可进雕刻公章一枚。那时武器极少。只有驳壳枪一支，白落令手枪一支，步枪一支，加拿大手枪一支。

一九四三年六月，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水阁村的蒋报教（即蒋山）寄信来我部队联系，愿同共产党合作。党组织委派蒋理法、蔡云松两名同志前去协助蒋报教工作，并委派蒋坞村教师叶和生，介绍杜子文打入叶开禄部队进行革命活动。

同年七月，几支匪部为了争地盘，相互残杀，相互吞并，谋杀了扬长春，又到水阁放火烧民房。十月，由蒋报教联合了叶开禄，攻打翁康基匪部，由于吃了败仗，蒋报教自动解散了部队。

一九四四年农历正月十八日，我部队在水阁乡同树岗与吴山民部队正式合并；编为第八大队（即钱南别动支队第八大队），人员达一百多名。当天晚上，在伊岭背（王村对面），就与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打了一仗。消灭了一些敌人，活抓士兵6名，缴来短枪6支。

## 增设联络点后的斗争情况

我们的主要活动点，最早是白鸠村，后增加了公须村、山门村、前峰山等点。合并为八大队后，根据革命发展的需要，一九四三年三月，又增设了一些联络点，并指定了每个点的负责人。石渠村：胡立达。丁埠头村：陈金海。东叶村、下蒋村：童家祥、叶协炉、方樟根、陈云龙等。里胡村：唐麻子。白鸠村玉首峰山一带：方樟根。溪滩徐村：徐可进、徐时如等。浦江倪大村：倪宪堂。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日，在水阁村，鲍志俊、陈一文、吴山民三个部队合并为一个部队。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我们在下陈村联络点活动时，突然遭到了丁谷匪徒的偷袭。在战斗中，我部队中队长陆寿松当场牺牲。为了减少损失，我们边打边撤。丁谷匪徒在下陈村进行了全面扫荡，并枪劫了150多户农民的财产。丁谷匪徒在下陈扫荡后又赶到白鸠村，将参加革命的蒋理法和我两人抓去。并抢走了我俩家中的粮食75担、毛猪4头、鸡30多只、棉被8条，并封了门户，不准出入。同时，村上许多农户家的财产也遭到抢劫；还严刑拷打了无辜百姓；抓去一批农民做他们的挑夫，把抢劫的财物送至匪穴马涧横坑村。

第二天，我部队驻在下陈乡葡萄山，计三十余人。因蒋根姣、岳其秋、徐时书三人革命意志不坚定，暗中投靠了敌人。就在这天早上，由他们带了二十余人，带了二十余支枪，跑到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那边去了。这一来，我们无

法在此立足，后由鲍志俊带同蔡云松、祝建春、蒋理法、鲍江江、徐可进和我共七人，与金华总办事处合并。合并后，领导派我们到浦江一带活动，成立了第二区队。参加人员有：鲍志俊、我、倪文荣、蒋理法、蔡云松、祝建明、徐长春、鲍江江等人。此后，在浦江县，我们扩展了农村活动点，如：上徐村、蒋塘村、塘店村、下球村等地。不久，接到上级指示，叫我们围剿邢卸兴匪部。

一九四四年十月，我们在柘社乡桥头村与邢展开了大战。当场歼灭了匪徒多名，活抓了53名（其中秘书一名，大队副一名），缴获步枪53支，机枪2挺，手枪2支。同月，上级又命令我们消灭流窜在兰溪灵塘村的土匪。当我部队到达该地，土匪已闻风逃遁。我们紧追不舍，一直追到石渠村才追到部分，并消灭了这些土匪。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浦江蒋塘村，我们组织成立了突击队。人员有12名。负责人：陈雨笠、杜子文、我、徐志青、祝建春、倪文荣、陈云龙、蒋立琴。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五年，我们在浦江下球，上徐等村时，有何宅村保长慰劳我部队便衣55套。一九四五年三月，由外地送来枪支若干。同年6月，由石渠村的徐志青带来步枪5支。

当时在各活动点蹲点的同志有：鲍志俊、我、蒋理法、蔡云松、祝建春、鲍江江、倪文荣、何阿木、蒋志林、徐可进、徐桂振等十余人。

一九四五年三月，我部队成立了“浦南办事处”。成立时在横溪镇开过有民兵、农民及各村保长等近千人的大会。那时“办事处”工作的干部人员已达七十余名。参加

“办事处”工作的干部有蒋理法、我、徐可进、叶方征、鲍志俊、陈一文等六人。就在此期间，我填了入党表格。

## 本人1945年后的一些情况

一九四五年农历八月十八日，我们去义乌洪山村与国民党部队展开了一场战斗。结束后接到上级北上的命令。同时指定我与吴培元等人留下陈做地下工作，并发给我们每人15担稻谷，作为埋伏费。

在我留下工作中，环境很恶劣，斗争很艰苦。国民党对洞庙一带进行大规模的清剿，使我们无法开展地下工作，只得在金华大风门山隐住了三个月。头一个月因地形不熟悉，找不到熟人，有些日子只靠采野生作物度日。后来才找到五户人家，是下陈村移居的，才得到饭吃。后因怕国民党知道，我们又转移到林岩后一个大洞里住了一个多月。没粮食，只好偷蕃薯度日。后又转移到大厦院村邹开云家住了四个月；之后，到下陈乡我姨娘家暂时躲避。

一九四七年，革命同志张启桂（金华白杜村人），向上级领到生活费1万元（相当人民币100元），来叫我与伙夫奶奶共三人去建德血岭村找杜志文同志。不料，联络点早被国民党破坏了，杜志文不知去向。我三人又到徽江乌主市村的宿店里住下寻找。住了五天，也不到杜志文的音讯。这时因伙夫奶奶生活费未带足，又生起病来。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张启桂叫我去白鸠村拿生活费。途中，让国民党发现，政府立即派人搜遍整个白鸠村，此时我躲在下蒋村。他们又来下蒋村搜查。我躲在陶莲英家的水缸里，终于被捕，受尽

了拷问，我始终没叛变，不吐实，故此判了四年有期徒刑。

在我快要被释放的那些日子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吴同兴多次盘问我：“是否陈流的学生？究竟参加过哪些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人家蒋理法已经如实招供了，你为什么还不承认？”我一直坚持说：“没参加过任何活动。”几次以后，就不来盘问了。

一九四九年正月十九日，在国共谈判的时候，我被提前释放。梅城镇镇长黄如兴亲自来接我出狱。

在我坐牢的时候，新的八大队队长胡文以八大队的名义每月寄给我白洋4元，有时也给我10元，供我生活。

出狱后，我到里湖村参加胡文领导的八大队工作。当时的区长是骆棋、江和，队长施卸寅，我兼任横溪、白沙的事务长。直到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我经县委书记王有沙等领导同意，才回家安居。

1987年6月15日于兰城整理

# 惩罚疯狗

胡新谷

## (一)

一九四四年十月，虽是初冬天气，但是坐在兰溪东叶村一间房子里的方正，只穿着裹着夹袄的一件长衫，并不觉得怎样的寒冷，相反，感到很燥热。刚才，他从八大队的临时驻扎地——金华丁村赶回来，接受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他的心情可以说既是高兴，又是担忧。

高兴的是，八大队下决心要狠狠惩罚一下邢小显这条疯狗，为民除害。担忧的是邢匪诡诈多端，行踪莫测，只恐失去战机。让他闻风而遁。

邢小显原系金华一个流氓赌棍，青红帮的小头目。日寇的铁蹄踏进婺州之后，他拉拢一些社会上的残渣余孽，拼凑起了一帮人马。他不是抗日，而是认贼作父，投靠驻金华城的日寇，在敌人卵翼下，专干祸国殃民的勾当。后来，虽明与日寇脱离了关系。但藕断丝连，仍暗中互相勾结，伺机与我共产党领导的八大队搞摩擦。他不定踪，到处狂窜。魔爪所到，如疯狗所及，百姓深受其害。不少积极从事抗日的村干部被他挖心剖腹；不少良家妇女被他奸污；不少农户被他劫掠。人们一提起邢小显无不咬牙切齿，眼中喷火。八大队早思惩罚一下这只疯狗，但因很难捕捉住他的行踪，因此，一

直未遂愿。这一次，由于群众的帮助，邢匪一窜入兰溪北乡的柏社一带，八大队就得到了消息。当下决定：抓住战机，予以痛击。作为地下党的领导，方正能不高兴吗？

邢匪目不识丁，心中惟知“杀人”二字。但有时也溜滑得象泥鳅，行动诡谲异常，消息封锁严密，一双血红的眼睛，经常闪射着怀疑的光柱，很难对付。如今要深入他的腹地，侦察兵力分布，火力配备，岗哨位置，匪窝驻处，无异虎穴取子。方正虽多次接受了党的任务，并多能出色的完成，但象这样艰巨的任务，他还是怀着忧虑的。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双手时而反背，时而交迭，两道剑眉上下跳动，他作了各种设想，但没有一种觉得满意。

谁知，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东叶支书叶金洧，党员杨振桥走了进来。他的目光与两位神采焕发的青年相遇时，忽觉一亮，铁锤般的拳头猛地在八仙桌上一击，高喊：“有了，有了！”两位青年惊疑的目光凝视着老方。当方正放低声音说了如此这般以后，才知就理，脸露喜色，点着头出去了。

方正送到门口，稍站了一会，回到桌边，正想在椅子上坐下，忽见一个人跨进门来。

“叶水松，”方正迎上去喊了一声。

来者应声后立即说：“秋长（方正的别名），保长叫我把征收来的柴米送到邢部去。你说送不送？”

“送，送！”方正略微思索了一下，坚决地说道。

“送？”叶水松是位年轻的党员，脑袋较为单纯，考虑问题简单化，他一听方正说要给邢匪送柴米，立即发急了：

“给疯狗送去烧的，吃的，不是叫他更有气力咬人？”

“不！”方正走到叶水松跟前，拍了拍小伙子结实的肩膀，轻轻地说了一番话，然后加重语气说道：“欲取姑予嘛！”

“明白了。”叶水松拍起了手掌，晃着脑袋出去了。

喔喔啼……村里响起了鸡叫声。一股冷风尖叫着突进了窗棂，把桌上的一豆灯光吹熄了，屋子里一片黑暗。这时，方正才感觉到眼皮在打架，身子软绵绵的。他不把灯盏拨亮，只是跌跌撞撞地摸到了里屋的床上，倒身便睡。

一觉醒来，已经日高三杆，阳光透过壁缝，投到了床上。他连说“误事了，误事了！”一骨碌从床上跳了下来，就要开门出去。

“做啥？”妻子叶雪华端着香喷喷，热腾腾的米粥上来了：“有事也待吃了去做呀。”

“噢，噢。”一时，方正说话显得语无伦次了：“吃粥？对了，对了，金洧，不，振桥，”

“没有。怎么了，颠三倒四的？”说着，叶雪华在床边的小方桌上摆下了早餐，劝说了几句，就到前边去了。

方正也自知失态，好的是妻子很理解他，他用拳头捶了一下脑袋，匆匆洗了脸，就坐在床边吃了起来。

刚吃罢早餐，方正从后门看到了一个人：圆圆的脸蛋，高扬的眉毛，穿着新衣裤。

“金洧，你回来了？”未待来者跨进门槛，方正就嚷着迎了上去：“丈母娘客气吧？带了啥好吃的？”

“有一点，”叶金洧笑着，从一块毛巾里抖出了两个面包，随手扔给方正：“尝一尝。”

方正张口接过，当时把一个塞进嘴里，另一个刚赏给了

过来泡茶的妻子。“怎么样，有收获吧？”他边咀嚼边问。

“有，可不太大。”叶金洧边呷着茶，边叙说道——

“今天一大早，我扮作串亲的人，到柏社去，谁知，刚到外月坞，听到了一声‘站住！’我抬头一看，原来村口一根樟树下，站着两个哨兵，他们正举着枪，对着我呢！站住就站住，怕什么。哨兵来搜查了，当然捞不到啥。他们问我干啥。我晃了晃毛巾里的白糖，大声说：‘丈母娘生病，去看看的！有一个哨兵信了我的话，让开了道，但另一个哨兵还缠着东搜西摸。待我从内衣口袋里拿出二十个铜板，每人敬了十个，才准许过去，原来是五尺菩萨，要烧香，混蛋！走过外月坞，我没往柏社，而是抄东北方向走，到了溪滩徐村又遇上了哨兵，我同样走了过去。过了溪滩徐村，我没转向柏社，而是绕到它的后面山头村去了。山头村也有敌人，我没敢久呆，又在柏社其他方向转了一遭，再没有发现敌人，就折到柏社丈母家，吃了早饭回来了。”

“这么说，邢匪在柏社东北，东南，西北三处都布置了兵力，可是你知道各处的人数，火力吗？”方正问道。

“不知道。因为敌人的哨兵没让我进村。”

“邢匪在啥地方？”

“据我丈母说，他在柏社桥头。她早上洗菜时，在桥头一扇楼窗里看见过他。”

“噢，噢。”方正站了起来：“你的任务完成得还好。先回去休息吧，等会可能还有任务。”

“好的。”叶金洧走了出去。

“外月坞，溪滩徐，山头村都有敌人，但究竟有多少？叶金洧不能进村，杨振桥又能进村吗？”方正背着双手，又

在房里踱起步来，心情显得沉重起来。

“鸡毛、羊毛、鸡肫皮兑糖哟！”方正正在沉思，忽见后门外弄堂里来了个这样的客人：肩挑担子，手拨郎鼓，头戴撮撮帽，外衣敞开着，脚穿一双皮革鞋，走八字步，慢而有节奏，口中念念有词。

“杨振桥，这家伙，装得倒挺象！”方正迎了出去，笑着说：“进来吧，客人！我家刚宰了一羊，有的是羊毛！”

杨振桥笑着进了房，卸下担子。

方正倒了一杯茶，待他喝了几口，缓了一上气，然后问道：“今天生意好吗？”

“马马虎虎。”杨振桥把撮撮帽除下，边喝着茶，边叙说了此行经过。

他一大早，挑着货郎担去侦察，到了外月坞，也受到了盘查。起先，哨兵无论如何不让他进村，后来，当振桥给每个递了一块银元般大的冻糖，又塞了几块光洋，吹了一通什么什么的大话，才进了村，他看到一些匪兵在村中一个场坪里操练，约一个中队光景，他不露声色地数了一下人数，又暗暗地察看了村中的地形、地物，就转道溪滩徐，山头村去了。进溪滩徐、山头村还可以使用老计，但当他要进柏社桥头时，老计失灵了，任凭他巧舌如簧，哨兵总不买他的帐，大队部就在前头不远，但只能望不能进。

“这么说，月坞，溪滩徐，山头村各有一个中队，邢匪想以此作外围，固守柏社？好了，你任务完成得还出色。至于大队部的情况，叶水松会提供的。”

方正刚打发杨振桥走后不久，叶水松就进来了。不用说，他借送柴米之便。轻而易举地进了邢匪大队部，摸清了

内情。

疯狗的情况有了个谱，方正当上在一张竹床下写好，遣人给八大队送去了。末了，他倚着后窗，仰望着挂在中天的丽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 （二）

里月坞，三面环山，树木覆盖。往西南，一条沿山小道通向外月坞，两村相距只一、二里。东北面对长岗脚，西北依临水碓山，站在该村一个小山岗的屋楼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外月坞敌人中队部的情况。为了更好地掌握敌情，有效地惩罚疯狗，方正等地下党员，不顾生命安危，毅然决然把联络点移到了里月坞。

这一天的夜幕又挂了下来了。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天象一只倒盖的锅，漆黑漆黑。小山岗的屋楼上，除了偶尔有西北风撞击窗门时发出的响声外。很少有其他声音。

夜，越来越沉，忽然，村里传来了喔喔喔的鸡叫声。

糟了，天快亮了，可能今晚……方正的心中如灌了铅，显得异常沉重。楼上呆不住了，他下了楼，来到了屋子外面。大家一齐把目光射向长岗脚的方向，脚尖踮了起来。

“难道……”方正想派个人去察看一下情况，忽见前面有一个人影闪来，他立即拔出驳壳枪，警觉地迎上前去，“谁？”

“我，”熟悉的声音。

“叶如起！”方正高兴地呼唤起来。

来者正是叶如起。他原是东叶支部里的党员，如今是八大队的战士。

“部队呢？”方正紧握着对方的手，急不可耐地问。

“早来了，在长岗脚。”叶如起气喘吁吁地说。

“怎么？为啥不到这里来？”

“联络的没碰到。”

“啊？！”方正跺起了脚：“你快回去，把部队带到这里高塘上碰头！”叶如起飞一般转了回去。

高塘是里月坞前面的一口池塘，这塘依山而建，容量虽不大，塘塍却很高又宽又长，可站好几百人。

说快真快，方正等刚踏上塘塍不久，李一群带着八大队健儿如风一样赶到了。

“你们来了！”方正迎上去，紧紧握着李一群的双手。

“让你们久等了！”李大队长话中含有歉意。

“不！”方正忽然看到李一群后面有两张熟悉的面孔——正是派往长岗脚联络的人，不禁火星直冒：“你们……”

李大队长立即劝阻：“不能全怪他们，我们临时执行了点任务，来迟了；他们等得吃力了，打了一下盹，以后注意就是了。”他看了一下怀表：“哟，快五点了，往哪走？”

“水碓山！”方正简要介绍了一下：“这山在柏社，溪滩徐，外月坞当中，在山顶摆上重机枪，可扼住大桥，绝敌退路，战斗打响后，便于向各路敌人出击。”

“好！”李一群赞同了方正的意见，发出了命令：“离天亮只有一个小时光景，必须尽快占领水碓山，天亮前打响战斗。出发！”

方正等在前面引路，队伍立即向水碓山进发。

水碓山离里月坞有三里之地，一路上，岗峦重迭，荆棘丛生，兼天未甚明，十分难走，幸亏这条路是方正与叶金洵

等在白天探好的，否则，又将延误不少时间。

八大队健儿素知兵贵神速，虽然连夜奔波，已经精疲力尽，但当大家想到一上水碓山就可狠狠惩罚疯狗，为民除害，大家还是情绪高昂，行进速度极快。不一会，就登上了水碓山顶上。李大队长站在一块巨石上，略微观察了一下地形，心中暗暗赞叹方正有眼力，选择了这样一块好制高点。这时，天已将亮，时间容不得他多考虑，兵力火力布置好后，他挥了一下驳壳枪，清着嗓子，高喊了一声“打！”

机枪、步枪一齐怒吼，指挥员战士一起呐喊，山在呼，岗在啸，僻静的山镇卷起了风暴！

### （三）

柏社是浦（江）南兰（溪）北的一座重镇，它南越太阳岭，可入金华，东翻五麓岭，可进浦江，北过伊岭背，可掠严州深山老林，西接兰溪，大有转辕余地，历来为兵家所垂目。

前几天，邢匪窜进了该镇，占据了镇中大桥东头的一些房子，作为临时巢窝。为防不测，他在各处要道——山头，溪滩徐，外月坞各扎了一个中队，企图以此作为窝巢的屏障。惟一没有布置兵力的地方——桥头西首，他在房里架了好几挺机枪，居高扼守。邢小显以为，这样子可稳坐钓鱼台，万无一失。

谁知，他刚与如花似玉的姘头无忧无虑地玩耍了三个整天，第四天的凌晨，枪声打破了他的美梦。

“报……报告，水碓，水碓山上出现了许多八大队！”哨兵跌跌撞撞地上楼报丧来了。

“胡说！只有一个八大队，哪有许多八大队，他们从天

上来吗？”邢小显正拥着姘头调笑，对哨兵的报告似信非信。

“枪，枪声，你听！”哨兵发急了。

枪声嘶哩哗啦的在屋顶喧嚷，被击破的瓦片坠落在楼板上发出向邢匪的警告声，其中有一片砸落床头，差点报废了邢小显的一只红眼。

“啊！这些王八真的来算计老子了！”他从床上弹跳起来，顾不得姘头的缠扰，披着衣服，提着驳壳枪，冲上了楼房。

“蠢猪，起来，都起来！刀架在脖子上了还不知道！给老子冲！”他血红着眼睛，在楼上边打边骂，弄醒了那帮喽罗。

邢小显杀人成性，喽罗们多是怕他。他的淫威一发，喽罗们被吓得屁滚尿流，慌忙从床上爬起来，有的歪戴着帽子，有的松散着皮带，有的只穿一只鞋，有的来不及拿枪，象捅破了窝的马蜂一样，乱哄哄地冲出了房外。

“蒋队附。你带方志华中队从正面进攻，老子带着其他人绕到后面夹击！”邢小显站在屋前的一块石头上，发出了号令。

“这……”一个块头很大，但生就一副哭丧脸的大队附蒋建中，见正面进攻危险，想违令不干，但当他碰到邢小显那双仿佛要吃人的血眼时，不敢再吱唔了。

“方志华中队跟我上”蒋建中装模作样在前面跑了一阵，发了几枪空枪，待中队长方志华——一个头脑简单的莽夫，分队长王小宝——一个只想在打仗中发洋财的小疯狗跟上来时，他立即放慢脚步，躲到了后面，堂而皇之地变成了

“殿后将军”。

邢小显见有一个中队的喽罗替他卖命，狞笑一声，拖着余部，往大桥窜去。他企图冲过大桥，沿着对面溪侧，绕到水碓山上后面，会合外月坞中队，夹击八大队。

哒哒哒……水碓山上的重机抢欢快地叫了起来，子弹不偏不倚，都在桥面上开了花，弹花织成了一道缜密的火网，使邢匪望而生畏，退避不迭。

“上溪，转道山头，与山头中队会合！”邢小显的血眼睛睁得铜板一般大，驳壳枪不停地乱射，抢先跳上了梅溪，往山头方向奔去。

由于天空多日未下过雨，梅溪的水很浅，只有齐脚板深。这可造化了邢小显及一批喽罗，得以苟延残喘。

时，天已大亮，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把整个战地照得通明透亮。

李大队长见邢小显已经逃跑，觉得若再不迅速出击，就失了战机。

“冲啊！”他带领一队人马象猛虎一样扑上了水碓山，其他人马由各中队长率领着，向溪碓徐，外月坞两个方向一齐砸了下去。由于兵力有限，再加上山头离水碓山较远，因此八大队没有鞭指。

蒋建中领教过八大队的厉害，这次，见李一群一马当先，八大队健儿气势勇猛，犹如无数滑车滚滚而下，早已吓破了胆；又听得我方喊：“你们的头儿早已逃命了，还替谁卖命！”他们完全丧失了斗志，不由自主地跪倒在路边，一些喽罗见副头目上跪，也争相效尤。

方志华、王小宝等匪徒，自持有几斧子，竟不听我方的

劝告，抢占田塍进行顽抗，结果被一阵密集的子弹，送上了西天。

其他匪徒见方志华、王小宝等倒在烂泥田里，不敢再顽抗，纷纷举起了双手。

李一群叫一个班的战士处理外面的俘虏，他带着余部冲进了邢小显的大队部，打开了邢匪私设的牢房，放出了被关押的革命干部与群众，搜出了来不及逃走的匪徒。

不久，攻克了溪滩徐、外月坞的八大队健儿先后前来奏凯。

这场战斗，虽因延误了点的时间，未能取得预期的战果，但战绩也不小。打死打伤敌人不算。光俘虏的就有大队附蒋建中以下五十八人，并且缴获了一挺机抢，十七支短抢，三十多支步抢，无数发子弹，及一枚匪大队印章。两麻袋钞票，两匹战马，数十床棉被等。

虽未擒获邢小显这只疯狗，但打击了他的嚣张气焰，使他从此一蹶不振，不敢轻易碰撞八大队的铁榔头。

一九八七年五月写于兰溪市石埠初中

# 土匪郑锦屏就歼记

汪祖荫

郑锦屏系兰溪市和平乡后郑村人，生于1926年。解放前不务正业，是个游手好闲之赌徒，曾学过拳术。

1949年兰溪解放后，原国民党203师师长金轼，纠集残部，勾结土匪头子丁谷等，在浦江、兰溪、严州边界骚扰，破坏地方政权，杀害干部群众。郑锦屏当时即是丁谷匪部的一个小头目。他无恶不作，多次残杀农会干部及无辜群众。金、兰、汤匪特暴动时带头攻打区乡政府。在解放军平乱时，也曾将他俘获，因未查清身份，教育后予以释放。

接着剿匪开始，在匪部土崩瓦解之际，郑锦屏仍执迷不悟，流窜于严兰边界，并在石子岗又杀害一名农会干部。

1950年4月，为捉拿郑锦屏，解放军一个排于深夜包围了后郑村，并于早晨开始搜捕。郑锦屏扮作农民，头戴箬帽，身穿蓑衣，赤着脚，企图伺机潜逃。他走到郑殿银家门口，刚好被进村搜索的一位解放军发现，立即下令：“站住！”郑锦屏指着郑殿银家说：“这是我家里。”想溜入郑殿银家。解放军见他是拐脚的（这是郑锦屏的特征之一），更严厉地下令：“不许动！”但因未能完全肯定这是郑锦屏未便开枪。郑锦屏乘解放军稍一犹豫，立即冲上前，妄图夺取冲锋枪。他虽有拳术，但解放军英勇拼搏，头部被击，血

流不止，双手仍紧紧握住枪支不放。这时，村口小山坡上担任警戒的解放军发现，立即鸣枪赶来，郑锦屏才逃入小巷，转而钻入自家楼上的稻草堆底，未被抓住。

尔后，群众觉悟不断提高，地方政权日益巩固，犹如布下天罗地网，郑锦屏只能龟缩在后郑村附近，时而于深夜潜入家中。他扬言：“谁去报告就杀尽全家。”农会干部及群众将情况秘密向区乡政府报告，并强烈要求除害。

1950年农历十一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女埠区分委（在楼塘村）命江志芳率区中队一个班径至郑锦屏家搜捕扑空。干部群众情绪很高，纷纷提供线索，农会主任主动带路去郑锦屏经常出没之处——马鞍山进行搜捕。

马鞍山离后郑村四里许，处于严兰交界。山上有一座古庙，庙后墙垣倒坍，挂上稻草帘以遮风雨，后面即是森林。郑锦屏夜间常潜入该庙，在后进神龛上住宿。庙中有一斋公，并养有一条狗，下山只有一条通道。夜间有人进山，狗一吠，郑锦屏便逃入森林。

区中队在农会主任带领下，轻轻摸上山头，狗竟一声未叫，这时月亮刚上山，银光四泻。战士们在古庙三面散开，班长带两名战士封锁庙后，并由农会主任去叫斋公开门。郑锦屏闻声即从被窝中钻出，掰开稻草帘想溜，三支枪口一齐对着他，齐声高喊：“不许动！”郑锦屏公然拒捕，迅即返身逃进庙中，从天井跃上屋背，但他刚跑了几步，四面枪声齐发，弹中胸部，就倒在屋背上。这样，一个敢于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土匪被歼灭了。消息传来，当地人民无不额手称庆。

1987年4月20日于厚仁中学

# 徐柏园在重庆一案之谜

徐建生

“七·七”事变，抗战开始。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管理总处，简称“四联总处”。主要是对战时金融工作，如资金之流动、贷放等进行统一管理。监督各银行贯彻执行有关战时金融管理之法规，集中审批一定数额以上资金之调用等。由蒋介石兼理事会主席，日常事务设秘书长一人（相当于付部长级）负责主持。其背景则是：当时孔祥熙任中央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两要职，掌管国家的财政、金融两大命脉。长期以来，孔氏家族利权独占，旁人不得染指。故四联总处的设立，亦是旁分孔氏权力，有意对孔掣肘的一举。

一九三九年，徐柏园以全国抗日总动员委员会财力组组长（时该会政治组组长为周恩来，郭沫若为宣传组付组长）接替徐堪任四联总处第二任秘书长。时徐柏园自美国留学归国不久，锐气尚盛，且风云直上，较少顾盼，上任后即一意进取建业。徐柏园早年毕业于商科大学，留美专攻财政金融，得硕士学位。此职正好发挥其所长。故一方面对战时金融管理的条例、法规不断加以严密完善（省编浙江在台人物志记其参加战时金融法规的拟订，即此两任期间事。）；另一方面，在工作上严肃法纪，不徇私情，力图有所建树。这

祥，对孔氏家族视国家银行如私人银行，长期任意套、挪国家资金，进行投机倒把、贩运走私活动，无疑是一大障碍。客观上，徐的上任成了孔氏家族大发国难财道路上的一块拦路石。这就逼使孔祥熙非对徐采取行动不可。

初，孔祥熙意徐入仕不久，尚无特出的派系关系，虽有学识才干，但官场阅历不深，不过是一血气方刚的初生牛犊，以自己老奸手段笼络应不在话下。只要徐能被利诱而投靠，全部问题即迎刃而解。故先是孔以兄辈自居，直称徐为柏园弟，便宴，赞誉，封官许愿，说徐是接替他的最佳人选，特示宠爱倚重。但徐柏园早以旧派官僚目孔祥熙，对孔无好感，只因孔是老资格，不得不表面上表示尊重，进行礼节上的应酬。而一谈公事，则不卑不亢，不为所动。孔无奈只好又让其大名鼎鼎的女儿——孔二小姐出面。孔二小姐不断进出徐柏园家，竭力拉拢私人关系，或至四联总处办公处纠缠，要求公事上的方便。几次后，徐柏园只好避而不见或拒见。当时的这位孔二小姐，飞扬跋扈。自恃皇亲国戚，无人敢得罪，在重庆是为妇孺皆知的。徐可能是触怒她的第一人。嗣后孔祥熙知徐柏园不能被其所络，决定设计除之。

不久，孔以中央银行总裁身份提名徐柏园兼任中央银行业务局长。中央银行局长一职，表面上地位并不高，但直接掌管国家金库和货币，是总裁以下第一红职。多少人垂涎企求，历来非总裁极亲信者不得任。孔此举本是“请君入瓮”计。任命宣布，官界以为奇，徐柏园也未觉察到会有其它原委而欣然赴任。几个月后，孔亲自率领中央各委员按例前来核查金库。按帐册核对后，发现黄金少去若干两，数字且不小。大家相顾失色。金库被盗，主管者是责无旁贷的。主管

者牵连在内，重则是死罪；即未牵连在内，也难逃失职罪。孔祥熙这一招极为狠毒，是徐柏园一下子招架不了的。实际上，明知是孔做的手脚，但按其当时的遮天权势，也是很难查清的。孔祥熙也正因此而自恃无恐。当时，孔祥熙装腔作势查问后，即令徐柏园停职检查待罪。一方面迅去蒋介石报告；一方面由亲信向新闻界透露，利用民众对贪污盗窃的嫉恨心理，成为耸人听闻之大案，欲置徐柏园于死地。徐柏园虽醒悟到是自己疏忽中计，却是有口难辩。只好将内中原委告诉几位友好相知者。蒋介石得悉后大怒，准备立即将徐下狱法办。幸经于右任，俞飞鹏（两人与徐柏园长兄徐濬谔同为黄埔军校及北伐同事，较为友好），陈布雷，朱家骅（与徐柏园相知颇深）等及时为之缓颊，劝蒋暂让徐停职在家（暗中由中统派人监视。）全部真相查清后再惩办为妥。继之，即由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司法院组织联合调查组进行彻底调查。前后经八个多月多次反复调查，终于真相大白。全系孔祥熙一手策划，令其爪牙所为以诬害徐柏园。在此期间，孔祥熙大发国难财的罪行，在各进步、中间的报刊上，不断揭发。孔家成了千夫所指、人人喊打的祸国殃民的大蠹虫。一年多后，监察、司法两院即合并孔祥熙之其它劣迹对孔提出弹劾案。孔祥熙自知声誉扫地，民怨难逃，蒋介石也难庇护，只好辞去财政部及中央银行两要职，席卷所蓄，携妻女飞美国作寓公（大量积蓄早已存在美国）。孔从此一去不复返，再无颜在国民政府中任职。

水落石出后，徐柏园恢复了名誉，声望反而增高，回四联总处任原职至抗战胜利。

1987年5月写于兰溪市游埠

# 畈口村的土布生产合作社

陆贵洪口述 范维德整理

民国22年9月的一个晚上，约9时左右，兰溪实验县县长胡次威带随从一人，突然来到畈口村。当时接待他的是姚乃义、姚马乃、陆友弟、姚启润等七、八位村民。胡次威说，他从厚仁来，到永昌去，路经村子附近，见家家灯火，机杼之声不绝，觉得这村里人勤劳的精神令人感动，所以进村来看一看。说明来意后，他就与大家无拘无束地座谈：先询问了该村的基本情况，如户数、人口、田亩山坡的出产等等，然后重点了解村上生产土布的历史与现状，最后提出组织土布生产合作社的设想，叫姚乃义等与村人商量后到县政府回话。

畈口村当时属厚仁乡，全村有140余户，均以织土布为副业，故每户至少有1架布机，多者有5、6架。生产方式是各户自购皮棉，或购籽棉加工成皮棉，用土纺车摇成纱，经漂浆后上机织成土布，（布机多的人家也有雇工的。）然后自行销售。产量少的就靠肩挑走乡叫卖，生产规模较大的就向厚仁、永昌、游埠、罗埠、龙游、衢州、桐庐、新登等地店家批售。销售是大家最担心也是化时间、精力最大的一环。因此，胡县长的设想，很快被全乡人接受，并在短期内成为现实。

土布生产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大致是这样：

一、组成办事机构主持社务。名称已回忆不起，陆贵洪当时仅15岁，但村里人都称姚乃义为主任，姚马乃、陆友弟等6人为委员。

二、组织入社。全村各户，不论布机多少，人口多寡，劳力强弱，只要有布机而且自愿参加合作社的，交股金银元2元后即为社会员。

三、产销统一经营。合作社的资金除股金外，由胡次威批准向兰溪交通银行贷款。凡社员均可享受贷给原料的待遇。皮棉需要多少，全部到合作社去领，合作社则统一购进皮棉发放。社员生产出来的土布，交由合作社统一销售。因此，在溪西开设了门市部，作为销售土布与对外联系洽谈业务之场所。

四、计酬方式采取多给一定比例的原料。社员向合作社领皮棉1包（72市斤），一般可织土布13匹左右，但规定只需交11匹。如纺纱，则每领1.25斤皮棉交纱1斤。多余的原料即为劳动报酬。当时土布的规格是每匹38市尺，阔1.7市尺，重4市斤，售价为1.8元左右。每架布机每天可织一匹至一匹半，织户的收入因此有所提高。

这个合作社从成立起，一直持续到民国31年。该年春，主任姚乃义在衢州推销布匹时，不幸死于日机轰炸，随后兰城沦陷，溪西一带均为日军侵占，老百姓生无宁日，合作社也就解体了。

1987年2月6日于仁厚

# 龙山堰追记

姜 韬

龙山堰，亦名楼山官堰，是建国前兰西最大的水利设施之一，源长40余里，灌溉厚伦桥（毛姓）、厚伦胡（姓胡）、姜坞底（姜姓）三个村的土地1500余亩。这座大坝和直达姜坞底上石坪的渠道为明初厚伦胡始祖胡南园负责兴建，距今600余年。

据《厚伦胡宗谱》载：始祖胡钿，字华玉，号南园。生于元至正丁酉（1357）年正月十五日，死于明宣德戊申（1428）年八月二十四日，终年72岁。明永乐甲辰（1424）年诏赠迪功郎。其妻姜氏是姜坞底村人，生四子，长子和幼子是知县，二子是通判，三子管家。由于胡南园家庭有财有势，经永乐朝廷批准，工部派员勘察设计，然后动工兴建此堰，故亦称“官堰”。

因姜坞底村是胡南园的岳家。厚伦桥村位于胡姜两村上首，造堰曾按受益土地出过劳力、资金，故此堰历来属三村受益。由于厚伦胡土地较多，约占受益总田亩二分之一，所以放水时间也占一半，毛姜二村则合占一半。

明正德五年（1510），章枫山编纂第一部《正德兰溪县志》，对此曾作记叙，且有“严禁上游截拦水源”之说。故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上徐乡保图在白象截拦水源时，

府、县都出告示严禁。道光六年（1826），兰溪大旱，古塘畈村又在白象修建方公堰，厚伦胡的胡绍裘会同三村人士联名向县告状，凭《正德兰溪县志》所载得到胜诉，停建方公堰。至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队驻太平祝时，龙山堰的水源所有权有所改变。光绪十年（1384）五月，毛胡姜三村重新制定了《管水放水协议书》（注）。自此，龙山堰上游水源无阻，三村之农田，大旱之年亦能保丰收。

建国以后，水利建设统筹兼顾，龙山堰上游电灌机埠林立，使该堰水源大为减少，但在诸葛乡修建起洪洞水库，即使大旱之年，仍能确保三村粮食丰收。

回顾龙山堰建造600多年来，上游40余里范围蓄水，下游毛姜胡三村农田免受其旱，在洪洞水库未建成前，该堰对局部地区的农业生产也曾起了一定的作用。

注：光绪十年五月，毛胡姜三村制定的《龙山堰坝放水协议书》迄今104年，原件之一由厚伦胡村65岁的老支书胡作宾保存，是一件珍贵的历史资料实物。建国前，管水放水制度一直未变，从未发生过纠纷。

# 兰江水运今昔

胡汝明

兰江地处钱塘江中游，衢、婺两江汇合处。兰溪自古得“三江”水运优势。早在明清，商品经济萌芽已达到鼎盛时期，兰江东溯婺江，贯通金华、义乌、东阳；西经衢江上游龙游、衢州、开化、常山、江山清湖，可辗转至江西、福建，沿三江北去一路下建德、桐庐、富阳、杭州及京杭大运河，另一路由建德折转入新安江至淳安、歙县、屯溪。

兰溪水运素有盛名，以依附水运的造船业为例，早在宋朝，兰溪就设有官办造船场，置厢军175名，当时一坊（城东门外）并有船场巷，足见其时造船的规模。造船之始还可追溯到唐贞二十二年（684）“诏令婺州造海船以进攻高丽”，当时兰溪县还未建制，属三河戍地，婺州造船船址在三河戍。

兰溪水运四通八达，明朝《万历兰溪县志》有载“远而业商者，或广或闽或川或沛或苏杭或两京以舟载比比也”。

水运事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赵锡礼登横山顶，面俯兰江，有“千橹下海潮”词句。宣统二年（1910）《浙江言报》载金属兰溪卡，设兰溪境内沿江有上卡、中卡、下卡、平渡（即女埠）四卡，今天城北下卡地名即设卡局而得名。卡者旧时在交通要道稽征课税之地也。据《肖山财政

志》自皖赣顺江而下者谓下水，由江西入境者兰溪征验，上水自肖山（义桥）起兰溪征验，这就包括了钱塘江中上游，兰溪成为当时皇朝统治阶级卡税中心。及至民国时期（1930）据《浙江航政之概况》一书仍记有：“兰溪商业繁盛为钱塘江各商埠之冠篷船停泊常有数千”。民国二十四年（1935）据《浙江粮食之调查》“……故虽以金衢为府治之地，而其商业繁盛，实远逊兰溪”。“大大兰溪县，小小金华府”源实出于此，其因果关系也无不出自兰江这一条黄金水道之故。

随着陆路交通的发展，特别是铁路的兴起，以机械化代替了以前人力水运木帆船。加之森林的过伐，水土流失，山洪暴发，河道淤塞，河床抬高，给木帆船带来生存危机，水运衰退，船只过剩，及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四月只剩有24家公司交通船394只船，航行于兰杭、兰屯、兰建、兰桐、兰永、兰义、兰衢、兰龙、兰常等条航线之间，船工生活困难。解放及至1952年才由浙江省航务局动员安置一批船舶计40余艘500多吨位，去浙西嘉兴市参加内河货物运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日益发展，铁路运输饱和，交通运输日益紧张，阻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把缓解交通运输紧张的目光投向水运。“重陆轻水、重电轻航”旧观念开始转变，水运确具有运能大、潜力大、耗能低、费用低的优点，比新开发（改造）陆路交通有省钱和不占土地的好处。“七五”期间浙江省已将京杭大运河与钱塘江三堡工程沟通和改造杭兰航道列入计划，金华市也把婺江通航以40吨船舶能力列入城市建设规划项目。

航运公司新建了八艘35吨级钢质驳船并于一九八六年二

月试辟兰溪至上海港水运航线通航成功，尔后直到年底止通航达七十七航次。从上海港运来兰溪货物有建筑材料、纸浆、玉米、化肥、煤炭，然后由汽车再转运到衢州、金华、丽水、龙游、永康、义乌、缙云、青田等地。在运价上，水运运价按二级货物平均每吨公里为三分，而公路运价则需一角七分。油料节约，初步测算为公路的四分之一（以汽车实载为准，放空不计），由此而言，兰溪至上海港的通航无疑是有生命力的。

1987年3月8日写于兰溪

# 我对兰溪盐业的回忆

八十岁老人陈孝三

我原籍浙江义乌，今年八十岁。民国十三年（十七岁），到绍兴大潭村（今马山区）盐厂当学徒，以后升为伙计。民国二十五年，到杭州的兰溪盐商联运处当会计，兼管盐运，从此同兰溪结下了不解之缘。民国二十八年，到兰溪洽和永盐栈当会计，后任副经理，抗日胜利后，在德润盐号任经理，不久辞去经理，开设洽和盐店。解放后先后担任兰溪民益食盐运销处副经理，国营兰溪盐管站副主任等职。一九七五年退休。先后从事盐业四十二年，所见所闻颇多，回顾往事，记忆犹新。

食盐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春秋时，管子相齐，对盐实行专卖，煎海为盐，开征盐税以富国，说明煎制盐起源很早。一九二四年，我在绍兴大潭村盐厂当学徒时，出产的就是煎制盐。海潮退落，海涂经阳光蒸晒，结成盐霜，盐民括泥淋卤，煎制成盐。这种盐的煎制用箴盘。箴盘涂上蚌壳灰，周围筑灶墙，中间以梁悬挂，边泼卤边烧火，漏处自然结成盐块以堵漏。箴盘煎盐产量高，每天停人不停火，昼夜出盐六次，日产盐一百五十担。每周换箴盘一次，在当时这可称为一门科学。采用这种办法煎制的盐。俗称“季盐”。绍兴有这样的煎灶一百余家，由于成本高，逐渐被淘汰。到

了一九三六年，煎盐灶仅存一家，旋即停业。代之以晒盐，习惯称“余盐”，主要产地庵东，原系余姚辖区，故名。早在清宣统二年（1910），绍兴企业家俞襄周提出废煎改晒，利用阳光晒盐。这种制盐方法，初用木板制成长方形的晒盐板，称“晒板”，以后改筑为浅水泥池，称谓“盐田”，水泥池由露天而加盖薄膜以挡住风雨，进一步提高产量，成本低，见效快，这是盐业史上的一大改革。

俞襄周，绍兴人，创办浙东引盐公廩。由盐商认购股票，食盐统一收购，统一调拨。总机构设慈溪庵东，下设六区收购点。产盐区均设盐务管理机构，以地名命名“盐场知事”，例如“庵东盐场知事”，管理庵东的行政和盐税，以后改为局。未税盐海运至绍兴镇塘殿，盐商缴清盐税和盐本再转运各地销售。后来，又改道运至余姚、马诸二处，然后运销各地，甚至运销日本。兰溪水路运输交通发达，是食盐重要转运点，转运点设在女埠。

用煎制盐腌制“金华火腿”，其质量要比用晒盐好，“煎制盐”容易被腿肉吸收能使火腿鲜艳红润，色、香、味俱佳。现在户腌火腿、咸肉，有人仍把食盐炒熟使用，以保质量。

兰溪地处三江之汇，是浙中重要商埠，是食盐的重要转运点，上通江西，下达皖南。民国二十六年设立兰溪盐务分局，第一任局长周守愚，江西人；第二任局长陈文蔚，杭州人，1939年接任。第三任局长左惠，1941年接任，直到兰溪沦陷。盐务局的职责范围，主要是办理监发税票和准单，征收盐税，发给放盐单据，审批食盐销售价格等盐政事务。当时规定：每引食盐3担，38引为一票。按一票缴税，每票食

盐114担，每担缴税八元五角。民国初年，食盐使用司马秤，十六两八钱为一斤，百斤为担，十六担为一吨。民国二十三年（1934）始改为市担，一司马担折市担1.27担。盐税分正税、中间附加税、外债附加、盐场整理费、增收整理费、建设事业捐税、省府加价、公卖费、公益费等项。抗日军兴，物价飞涨，食盐也逐年加捐加税，盐税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

兰溪盐公堂，是盐商聚会议事的场所，专门同盐务机关打交道、拉关系，同地方商界不搭界，是盐商的特权组织。内设主任、文书、工友三人。我到兰溪时，盐公堂主任是宋莼轩，绍兴陶家埭人，世代经营盐业。

兰溪盐务分局和各地盐商有两个查缉私盐组织，各有一个班，每班十人。归属盐务局的称“盐务税警”；由盐商组织的称“商巡”，俗称官办商办“缉私营”。私盐一般从台州运入，查获送盐务局处理，一律没收。

食盐自古专卖，官收商运，盐商凭税票运销，世代相传，故称“官盐”。民国二十五年，兰溪有九个盐销店。洽和永盐栈是兰溪最大的一家官盐店，在游埠、永昌均设有分店。食盐销售价由盐务机关核定，一般二斤米价等于一斤盐价。为了防止盐商相互倾轧，盐公堂通过协商达成运销协议。

经营食盐不能脱销，在正常情况下，资金周转比较慢，销售一票食盐114担，需要三票的成本，即销售一票，仓储一票，途运一票。这是过去经营食盐必须掌握的做法。

# 回忆兰溪泰亨钱庄

姜树勋口述 姜韬整理

我今年七十二岁。十五岁进兰溪泰亨钱庄当学徒，经严以诚介绍，拜阿大唐炳增为师。三年学徒，深得器重，第四年升洋钱房出纳。除了兰溪沦陷而间断三年外，其余一直当出纳。到一九四九年十月参加粮食部门工作止，一晃二十多年。泰亨虽然四次变动，人事变更频繁，我仍稳当出纳，见闻颇多，同业笑我为“泰亨元老”。

泰亨创建于民国十五年（1926）。由姚老坤（瑞亨钱庄阿大）、严以诚（严仁和油腊粮食行老板）以及赵一大木行和祝裕隆布店的老板，加上唐炳增，计五家合资经营。每年出资一千，合计白洋五千元，为泰亨钱庄铺底。开设在城南闹市区（今工农路，兰溪味精分厂门市部址）。

房屋有三间二搭厢两座、厨房二间。前一座三间二搭厢，左间营业用房，右间会客室；后一座三间二搭厢，左间洋钱房，其中半间为库房，右间为阿大用房，二搭厢都是信房。库房做得很牢靠，超过当时的中国银行兰溪分行。从板壁进门后，又有木门，铁门，然后才是库房。打开加锁的地面厚铁板，即为一米半深的地下室，放着保险箱。我进入这家钱庄的前二年，曾发生一次抢劫，夜里四个强盗手握短枪短刀，把全部人员关到一个房间内，可是无论如何找不到金

库。最后只得威胁一个店员强迫打开保险箱，盗去钞票四百元（白洋未劫）。

一九四二年以前，兰溪商业繁荣，金融事业发达。当时，在兰溪有国家办的中国银行、农民银行；省办的浙江地方银行；县办的县银行和合作金库；私人办的泰亨、瑞亨、聚亨、同亨、穗茂、泰源、长源、义和、义源、裕通源、万亨、宝泰、鸿裕、豫泰等十四家钱庄。钱庄以泰亨为最大。每天兑汇、放款、存款进出白洋少则七、八千，多则一万余元。可谓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阿大（即经理）唐炳增，当时四十多岁，祖籍绍兴，精明能干。他在瑞亨钱庄时，拜姚老坤为师。而姚老坤，系兰溪姚村人，有名的土财主，瑞亨的阿大，又是泰亨、瑞亨、金华裕亨、瑞裕隆的股东。唐炳增有这样的后台，并且还有好几家富商亲戚，例如严仁和、西福茂、赵一大等，或是姐妹夫，或是侄女婿，如果现金一时转不过来，他们都能扶持一把。所以泰亨资金运用自如。

阿二丁承贤，不大理事，挂名领工钱。

跑场头林鹤寿，当时五十多岁，绍兴人，相当于阿三。每天上午，到章府里钱业公所，同行议息，各家同业或其他店家在沪、杭的存款、欠款，都在上午买进卖出，贴息七至八分或高至一角。当场办好“汇划”手续，收付汇率。在现款紧张的时候，也有倒贴息的。都在上午结算清楚。到了下午，则专在钱庄里写好发往下江各店家的信件。

内帐房即会计唐保勋，三十多岁，系唐炳增阿大的侄子。外帐桌唐碧臣，四十多岁，兰溪人，负责接待顾客。

信房二人，一为跑场林鹤寿兼，专管发往下江的信件，

另一人为严以诚的儿，也就是阿大的外甥，专管发往上江的信件。当时的下江即指杭州、上海、宁波、绍兴等地；上江即为金华、衢州、龙游、寿昌、常山、开化华埠、松阳、古市等地。信件主要内容是邮寄汇兑款存根。抄信稿的工作则全由学徒担任。并留有信簿（底稿）保存。同一地区，甲户昨天有业务，乙户今天有业务，除了向乙户发信外，还要向甲户再写一封信，将昨天业务内容重述，夹在乙户的信内托代转交。总之，每笔业务，都要寄两次信，以防遗失。寄信有两种方式，一种通过邮局，一种称“民信”，即私营邮商转寄。

洋钱房即出纳，先由程洪涛担任，金华人，20岁。后由我接任，时年十九岁，是唐炳增的第九个学生。每天进出银洋万余元。向杭州、上海运送银洋，一般五千元一箱；向衢州、龙游运送，也有一千元一小箱的。木箱上钉好铁皮加铁锁，派专人用船押运。我当学徒时，收过一块假银洋，受到阿大的批评，赔了钱，得到了有益教训。所谓假银洋？实际上是铜洋，声音尖，边上呈黄色。以后我在洋钱房担任出纳，从未发生差错。

跑街二人，一是唐保谦，三十多岁，钱庄出身，是唐炳增的侄子；一是严鼎，亦三十多岁，是唐炳增的外甥。这二人主要是跑洋（煤）油公司、香烟公司、布店三个大头，把现洋收进来，向杭州、上海汇兑进货；同时，跑油腊行、米行、南货庄，把现洋付出去。然后将杭州、上海等地的销货款划入本钱庄。

其他学徒邵芳、陈卓如、周瑞麟等五人。主要是站柜台、上街收现洋、抄写、发出信件，扫地、抹桌、荡洗等日

常杂务。还要做白洋的敲验，点数工作，把白洋放在钱板上擦亮盖上“兰溪泰亨钱庄”的橡皮蓝色“明印”，作为验讫。

炊事员二人，除做饭菜外，有时还要跟随跑街到各店家把白洋、银元挑运回来。所谓钱庄，就是吃利息的饭，都在利息上打算盘。存息三分，放息最低八分，最高一角。现金当天计息，兑汇要算五天的利息，还要收手续费二厘半。老板投资的股金，按盈利的百分之十，年终分红。泰亨钱庄自有资金不多，但外来周转的资金却很多。上海的中南钱庄、恒隆钱庄；杭州的开泰钱庄、同泰钱庄、建设银行；绍兴的开源钱庄、益源钱庄；宁波的甬杭钱庄，都可以垫支现洋二、三千元，也就是说可以开空头支票借支。而泰亨钱庄也支持衢州的巨源钱庄和龙游的穗丰钱庄，给予垫支二、三千元的定额。此外，还和金华的裕亨钱庄，益源钱庄，常山、江山、开化华埠、松阳古市等地均有业务往来。同时，在兰溪城里，有一批较大的店商与泰亨钱庄挂勾，业务往来频繁。如米行宏昌、裕成美、万通源；油行正隆、壬源、顺昌、严仁和；布店祝裕隆、益源、大源、大来；盈丰香烟公司、协和洋油公司。还有一批坐地收购的“坐庄”，也就是做批发生意的行商，如粮食叶兰田，绍兴猪客商叶茂松、谢福英，不管开出的“本票”和付出的现洋均通过泰亨钱庄兑汇。凡盖有“兰溪泰亨钱庄”橡皮蓝印的银洋均可兑换，信誉很高。由于这样上上下下，四面八方的关系网，泰亨钱庄在同行业竞争中独占优势，名列前茅。

泰亨钱庄职工的生活待遇：供膳，四菜一汤，阿大每月工资五担米（相当十五元）、阿二四担米、跑场头三担半、

帐房（会计）三担、洋钱房（出纳）二担半。学徒每月一元，第三年四元，第四年五元。小病店里开支，大病自负一部分。没有休息日，有事要禀告阿大，可以回家去一趟。亲戚朋友来店吃饭免费。年终，从兼营金鼠牌、美丽牌香烟利润所得中，每人分红利十七元。全钱庄十七人，在过年过节，都有两桌酒席聚餐。正月初六讲生意，阿大坐在那里，对继续留用的职工批评、指出缺点，所谓“师傅骂徒弟”；对辞退的职工、客气地说：生意不好，“另请高就”。春节期间，分六、七批请各关系户来店吃酒，学徒站在客人背后，泡茶、盛饭、递水烟筒，有时还要送客人回家。

民国二十七年（1938）一月，杭州沦陷，绍兴籍的职工纷纷返回原籍，沪杭业务往来间断，生意一落千丈，只得改做香烟生意，人员减少到八人，直到兰溪沦陷。

民国三十一年（1942）五月，兰溪沦陷，三益堂老板徐立刚接管了泰亨钱庄，改名集成钱庄，人员全部变动。日本投降，自动解散。

民国三十四年（1945）八月三十日，兰溪光复。同年10月，泰亨钱庄恢复旧业，扩大股东，有杭州的同泰钱庄和绍兴的开源钱庄，投资法币四亿元，单单添置家具和修理房屋就化掉三亿多元。人员扩大到22人，面貌焕然一新。由于当时兰溪只有泰亨、义和、穗茂三家钱庄，业务蒸蒸日上，生意越做越旺，大有超过抗日前之势。不料民国政府滥发货币，物价飞涨，钞票贬值。1948年由周沛生通过老风祥老板叶永茂，暗地改做黄金生意，收购大米，一直维持到1949年5月，兰溪解放。这段期间，泰亨钱庄人员具体分工是：经理潘宝善，绍兴人，原绍兴开源钱庄经理兼任。付经理：赵

福湘，兰溪人，实际主持业务，过去万亨钱庄经理。监理唐炳增，原第一任阿大。会计鲍康忱、沈伯和二人，祖籍绍兴。出纳姜树勋、唐越、余庆猷三人。写信周沛生。营业赵福祺、施信、朱柏清等八人。学徒二人。炊事员二人。

职工生活待遇，最高每人四、五担米，最低一百五十斤，出纳二百五十斤米，学徒四十至五十斤米，供膳，四菜一汤，亲朋好友来店庄吃饭免费。

兰溪解放后，泰亨钱庄股东老板抽走黄金，外地人员多数返回原籍，剩下六、七个人无法营业，只能坐吃伙食，不发工资。同年10月，鲍康忱、沈伯和、赵福祺三人集资，重新恢复营业，主要对象是老关系户，直到1952年中国人民银行接管，泰亨钱庄结束。

一九八七年二月整理于兰溪

# 我与洋行、洋顾问交往的回忆

八十八岁老人唐廷瑞

一九三二年八月我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军政部交通器材总库任上尉器材登记组主任。一九三三年一月军政部委我为购料委员。按照规定，购料委员须校官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现破格委我购料，颇受感动。窃思上级看重，当知自爱，要尽心力，采购质优价廉的器材，方可交代。

购料委员共十一人，组成购料委员会。委员长是一位少将技正。第一次出去购料的，是由交通司长王录指派少将程技正、上校刘科长和我三人。

到了上海，程技正派我翻电报，我拒绝。他异常气愤地对我说：“我们三人的任务是有轻重的，须分工合作，才能把工作做好”。我说：“我是管理器材的，职别虽低，责任却重，不应该叫我翻电报”。

我们在旅馆，一律选上等房间，以便和各洋行来人接洽。这时，各洋行已有人来，都在他们房间会谈，没有人来理我。就到街上各处走走，问这问那，打听各种行情。将近中午，回到自己的房间。他们要去吃饭了，邀我同去，我说：“谢谢！你们请先走吧，我稍迟一点去”。

他们走了，我随即坐人力车到英国慎昌洋行。因慎昌的镀锌线（一般叫铅丝，每卷重一百十二磅），质量比西门子

（德国洋行）的好多了。这次购料单上列有镀锌线五千卷，是一笔大交易。我会见慎昌的经理，和气地对他说：“我军部现要向贵行购五千卷镀锌线，不知有货否”？他答：“有，有，有”！我接着说：“可是价格要实在，不应有虚头。我连茶烟都不吃你们的。如果真比别家公道，以后要和贵行多做交易”。他踌躇半晌，说：“敝行的镀锌线质量好，最低价格不能少于每卷八元”。我听了觉得价格还算公道，看过货色，就请开出估价单。这笔交易不到半小时就做成了。回到旅馆，正准备报请军部审核，程技正等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见我已在那里工作了，程技正带着讽刺的语气对我说：“你忙忙碌碌在那里干啥？”我说：“刚才我搞到一份估价单，请你看看！”他问：“什么估价单？”我说：“是五千卷镀锌线。”他又问：“是西门子的吧？”我说：“西门子的线，质量这样差，而价格高达每卷十一元，瞎了眼也不会去买它！”他们听了大惊失色，一齐走了过来。我将估价单交给程技正，他接去一看，呆住了。我说：“慎昌洋行的线不会生锈，每卷只有八元，因此，我请开估价单。”程技正严厉地对我说：“我们来上海购料，行动要一致，不能各自为政。”我说：“当然。但要掌握价廉物美这个原则。慎昌的线质量比西门子的，而且每卷便宜三元，五千卷共便宜一万五千元。谁能合到这条原则，就向谁采购，这是毋庸置疑的。镀锌线应该照这样办，其他器材也应该照这样办。”大家听了，无话可说，决定这次镀锌线五千卷向慎昌洋行采购。

所购器材，运到南京，一经检验，比以前各次所购的器材都好，众说纷纭，莫名其妙。可我在沪不受招待，不受

贿，南京已有所闻。司长王景录接连派我赴沪购料，各同事都很羡慕。原来，购料是件美差，别人求之不得，我却暗中叫苦，因我是尉官，所报旅费，还不够付旅馆的房钱。这情况后为司长知道，补发我一笔钱，不使我吃亏，我很感激，更加小心翼翼，一丝不苟。经购的器材，都能得到上级称心满意。

一九三四年三月，军部委我为器材检验员。器材购到，须经检验合格，才可付款，接收使用。当时，有一批德国顾问，派在中央各机关，可直接向最高领导陈述意见。因此权威很大，各机关的人员都怕他们，唯他们之命是从。

有一次，西门子洋行有批通讯器材运到南京，派我检验。德国顾问带了翻译，亲自到场，趾高气扬，神气十足。他从皮包里拿出检验清册，交给我一份。我看了一遍，内有连接杆一项，每副单价二关金。我问翻译，关金价值几何？他答：“二元多”。等到检验此项材料时，我拿出笔来，随手把单价二关金划掉。德国顾问看了，认为我有意当面侮辱他，顿时大发雷霆。窜到我身边，伸出拳头，似乎要动手打我。我以藐视的目光笑对翻译说：“德顾问这种行为太不雅观了！凡事要讲理，怎可用横蛮手段来恫吓？！你看，这样一副连接杆，两节六尺长的细竹，每节价五分，共一角。一个薄铁皮套，不到四寸长，最多值二角，总共不过三角。此项器材又不是德国制造，是上海一般普通工人就地做的。三角一副，在南京、上海两地，随你要多少，都能保证办到。现检验清册上每副列二关金，合国币四元多，未免太荒唐了。目下各部队需要是项材料为数甚巨，每副虚报四元，这笔损失，大得惊人，如不从严查究，随便徇情放过，要我这个检

验员何用？请转告顾问，下午停止检验。须先将今天发生的事情，报请军部派员前来会同评议，如认为我划得不对，当面向顾问道歉”。翻译听了，示意顾问一同走出。我锁了门，回去吃饭。

饭后，翻译来找我，轻声说：“顾问请你下午继续检验。检验完毕以后，再讨论连接杆问题。他很愿意和你二人商议解决，不要上级派员评议。请你就去开门吧。”

我到点验室，德顾问也就来了。握了手，重新开始点验。我对各项点验手续办得很严格，他一一依从，不敢讲一句话。检验将要完毕，顾问托故先走。翻译问我：“连接杆的问题，依你怎样解决？”我说：“单价关金二元，改为国币三角。”他说：“三角未免太低。”我说：“三角一副，京沪两地，随时都能买到。”他无话可说，只得依我每副三角了事。

隔了两天，我送点验清册到交通司。经办人对我说：“德国顾问与西门子洋行串通一气，狼狈为奸，由来已久，知其情节者颇不乏人，但都畏其权势，不敢揭发。今让你挥戈一击，暴露他们舞弊实情，亦可抑止他们妄自尊大任所欲为了。”

1987年2月23日写于兰溪上唐

# 兰溪电汽公司梗概

刘起良

民国四年，兰溪富商柳赓南、杨宗财以及绍帮钱庄的孙绵云、盛某、赵某等为首集资数千银元，由杨阿根（柳赓南的朋友，上海人）赴沪购进功率较小的一架发电机，雇请以木根师傅为领班的技工十余人来兰安装发电。此系我市最早的产业工人。厂建城北余店（即市供电局现址），定名潋明电灯公司。供电时间限制在每天的晚上七时至十时，供电线路为北门街（即现在的和平路南段）。用户多为较大的商店及机关，包灯论盏按月收费。公司由柳赓南主持。后来由于管理不善，机器设备逐渐陈旧，加上窃电严重，供电超负荷，以致灯光暗淡如豆。用户不满，营业额下降，影响经济收入。兼以上海工人帮派习气严重，难于管理，又经常外出闹事、打架，影响不好。柳及各股东已感难支。延至民国十六年，柳及各股东虽感无力维持，但又不敢贸然停办，于是聘请兰城知名人士徐仁（兰溪马鞍徐人，其子徐治成，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目前尚在台湾），进厂整顿。徐首先增募股本，扩大资金；然后设法辞退了全部上海工人。另聘以宁波宋时哉为领班的一批技工，更换机器设备，增加发电能量。取消包灯，安装电表，计度收费。收取电表押金，增加流动资金。供电时间、地域，都有了扩大。公司改名为兰溪长明

电灯公司。成立董事会，推选我父刘同律为董事长，徐仁、孙绵云、柳赓南、唐舜庭、杨清铎、姚貽谷、盛某、赵某为董事，徐仁任经理。公司营业有了发展。民国二十四年刘同律病逝，改选我继任董事，由徐仁任董事长兼经理。公司管理制度日趋健全，分设会计、技术、收款、查表等人员。技工则由宋时哉、胡辅成分别负责两个机电班，生产秩序正常。公司营业进一步有了发展。

1942年，日寇侵占兰城。徐仁避居白露山、都心等地。职工星散，兰城停电。日伪设法找回部分技工和职员，强迫续继供电，并有数名武装驻厂监管。事实上，通过微妙复杂的社会关系，仍由徐仁在乡区遥控指挥。1945年，兰溪光复，徐仁回公司续继主持工作，并将公司改名为兰溪商办电汽股份有限公司。

1949年，兰溪解放前夕，徐仁惶恐不安，指定由总务杨一鸣暂代经理，于四月间出走。解放初，用户减少，营业额下降，流动资金短乏，经营困难。杨自感无力承担，于十月间向董事唐舜庭、杨清铎求援。经商议，召集在兰董事开会。研究如何克服困难，设法维持残局。决定设立整理委员会主持公司业务，推我任主委，杨一鸣、赵石屏（原公司秘书）为委员。十一月，整委会全力改善供电设备、催收欠费。当时兰溪市长彭志明、工商科长刘启贵两同志找我谈话，重申党和政府的工商政策，要求解除顾虑，办好公司。在询问有何困难时，我答以个人能力有限，要求增强整委会人员给予支持与监督。经数次商谈，表示同意。遂于1950年1月调整组织，整理委员会由周沛生任主任委员，姚貽庆任委员兼财务组长，我任委员兼业务组长，增聘技工李道海等。继

续催收欠费，严格取缔窃电，每天延长供电时间，一般情况下，保证供电。公司营业又逐步好转。为了搞好劳资关系，成立了兰溪第一个劳资协商会议。劳方代表：丁忠武、宋宏源、胡辅成；资方代表：周沛生、姚貽庆、刘起良；工商联代表陈孝三和总工会代表胡芬出席指导。协商劳资争议，改善工人福利，商讨公司的有关重大事宜。通过清产核资，换发了股票，把公司更名为兰溪县私营电汽公司。同年冬，县府派童友耕来公司为公方代表。1951年1月董事会改组，由沈季良任董事长，我任董事会秘书，补选赵清元为董事，接任业务组长。同年四月我辞职离开公司。其时职工共四十余名，由整理委员会行使经理职权。

1987年4月于兰溪住宅巷

# 兰溪瓷业生产简史

陈念慈

兰溪陶瓷生产历史悠久。据出土文物考查，秦汉前即有印纹陶罐釉碗的制作。1979年水阁乡高嵩水库内古窑址中出土之北宋青瓷，经鉴定先于龙泉瓷。据考：明弘治十五年（1502）该处尚有陶瓷窑炉17座。后经战乱，兰溪之瓷业生产逐渐湮没。

解放初，兰城有陶瓷商号11家，但瓷器均非地产。1952年，聚兴源、陈茂隆、晋兴协、永达4家商号和徐晋泰陶厂（厂址在游埠区伍家圩附近）组成兰溪建华陶瓷合营处，吴忠俊任经理，我与周仲兴、胡守祺任副经理。下设3个商业门市部和1家陶厂，共有职工89人。经理处设在城区中山路蔡姓祠内。合营处经营宗旨是：“保持零售商业，极积创造条件，筹办工业，恢复和发展兰溪的陶瓷生产。”

要生产瓷器先要解决原料。职工吴本桃提供了一条线索：抗战前，上海客商汪绵棠曾将兰溪石渠乡大板桥郑东坞口山上的矿石运沪作工业原料。经理处遂派职工吴忠仪带上大板桥矿石前往龙泉上阳碗窑请教。经鉴定为瓷石。上阳碗窑还将此瓷石作原料制成碗坯试烧成功。

有了地产瓷石，建华陶瓷合营处经理处于1954年春决定筹建兰溪建华陶瓷厂生产瓷器之分厂，推吴忠俊与我负责。

厂址选择在东郊。当时合营处所属有22名青壮年职工自愿报名组成建厂工程队。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基建任务。初建成的制瓷分厂，占地3亩，设备仅有24间阶级式龙窑1座，1台12匹马力柴油机牵引10只机碓粉碎原料，8台轱辘车盘制坯。生产和生活用房计8间平屋，十几间箬篷和草房。

投产初期，由于经验缺乏，技术不精，产品质差量少，加上资金短绌，困难重重。政府派出干部来厂协助工作，并向民益食盐运销处和陈隆顺瓷行两家借拨资金1万元济急，还将贸新公司停办后的数百吨瓷石无偿赠给，从而增强了职工的信心，生产逐步趋向正常。1955年下半年生产出瓷碗5个品种14万件。

1956年1月，私营建华陶瓷合营处转为公私合营，所属工业和商业分别归口。归口工业的为公私合营兰溪县陶厂，下有2个分厂，一厂在东郊为瓷厂，二厂在伍家圩为陶厂；归口商业的为三个门市部。同年10月，县拨款18800元又在女埠方家山新建陶厂（即三厂）。1957年2月竣工投产后，二厂由三厂领导，统一经营管理。

1957年，兰溪县陶瓷厂的一厂——瓷厂列入省轻工业厅辖属，国家拨款14万元进行扩建和技术改造，征用土地33亩，新建109m<sup>3</sup>倒焰圆窑和厂房，购制原料，成型两道工序的成套机械设备，生产方式由手工操作进入机械化生产。

同年6月，为发展细瓷生产，厂领导派我与蓝献传去湖南等地学习技术改造经验，并把带去的原料请湖南醴陵陶瓷研究所帮助研究原料配方，解决器型设计和工艺技术等问题。在该所指导下，用新配方将地产原料试制细瓷获得成功。经鉴定：瓷质洁白透明，釉面柔和似玉，器型美观，烧

绪良好，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出口细瓷标准。

1958年4月，县主管部门决定将公私合营兰溪县陶瓷厂两个分厂按专业进行划分。一为公私合营兰溪县陶厂（同年下半年伍家圩部分拨归游埠区中洲公社经营），生产陶器；一为公私合营兰溪县瓷厂，生产瓷器。划分后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同年12月，公私合营兰溪瓷厂转为国营，改名为地方国营兰溪县瓷厂。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根据党中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贯彻以钢为纲全面跃进方针。为了支援我县大办钢铁需要，转产耐火砖，停止了日用瓷生产。

与此同时，县里调来大批农民工计三百七十余人进厂，筑小高炉，砸矿石，烧木炭，大办钢铁。后来，由于全民办钢铁结束，一九五九年瓷厂停止了耐火砖生产，为实现工农业电气化需要，转产各种高低压电瓷和工业瓷。日用瓷生产由马涧瓷厂承担。一九六零年二月八日兰溪县人民委员会（60）59号文件批准兰溪县瓷厂改为兰溪县电瓷厂。四月，瓷厂党委建制，归属省机械工业厅主管。自一九五八年以来，三年实现利润九十万元。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生产经营指导思想受“五风”影响，生产方向改变频繁，片面追求产值、利润，忽视产品质量，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在大跃进年代，全国各地瓷厂不同程度地片面追求产值、利润，停止了日用瓷生产，市场日用瓷严重脱销，有些地方用粗碗、陶钵盛菜饭，山区用毛竹筒子代瓷碗，给群众生活带来一定困难。

一九六零年下半年，省委书记江华来兰溪，望见高烟囱，问起瓷厂生产情况，得知兰溪瓷厂原生产日用瓷，后改产电瓷。他即向县委提出瓷厂应恢复日用瓷生产的建议。一九六一年一月县委决定兰溪电瓷厂仍改为兰溪县瓷厂，恢复日用瓷生产，归属省工业厅主管。

一九六一年党中央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四月，省轻工业厅在龙泉召开全省陶瓷会议，中心议题是迅速恢复日用瓷生产，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于是兰溪瓷厂恢复了日用瓷生产。

县委对瓷厂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和充实。二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三月开始紧缩编制，分批下放农民工回家务农。十月上旬，县委派工作组来厂帮助贯彻工业七十条（草案）。推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试点工作。

省、地、县领导机关为了帮助解决瓷厂恢复日用瓷生产在设备上的一些困难，一九六二年上级拨款和企业自筹资金共十七万元，用于生产布局的调整和设备的增补。调整布局本着长远规划和当前生产相结合，以及生产和生活区划分的原则，作了全面规划。设备的填补，考虑到工艺流程的合理安排和生产能力的平衡。确定了十个技改项目。其中如改扩建原料车间厂房1225m<sup>2</sup>以及柴窑改煤窑试点项目等。经过一年调整和改造，车间内外的设备生产能力基本得到平衡，工艺流程渐趋合理，企业面貌有了改观。

窑炉是主要生产设备，原有三座柴烧台阶式龙窑，全年消耗木柴三万余担，一九六一年以后柴源紧缺，柴价昂贵，成本高，质量差，因此窑炉改造乃当时之急。在一九六二年

柴窑改煤窑成功。一九六三年得到省、地领导机关的支持，先后拨款十五万元，决定以窑炉改造为重点技改方案，续继新建64M<sup>3</sup>煤烧倒焰园窑式座和烟囱，使厂房和设备更加配套。一九六四年三月竣工投产，产品质量显著提高，成本大幅度下降，仅燃料成本就降低48%左右，它是瓷厂烧成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从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到一九六六年期间，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党委非常重视人的因素第一，组织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为人民服务》等文章。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端正了生产经营方向，树立质量第一思想，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加强主人翁责任感，积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生产技术方面，不断开展技术革新，修订生产定额、消耗定额、质量标准，严格工艺操作规程，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工人素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根据经济工作愈做愈细的要求，财务管理制订《财务工作规程》《改革会计制度核算办法》《成本核算系数》，经常开展经济活动分析。几年来认真做好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企业素质有所提高，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为今后企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该厂已成为有职工680人，年产日用瓷1600万件，美术瓷、瓷雕饮誉中外，年总产值达289万元的中型企业。

写于1987年3月

# 修 桥 铺 路

鲍文达

兰浦古道，蜿蜒百余里。是兰溪到浦江的主要通道，由于多年失修，路基残破不堪。尤其雨天，路滑打滚，更为不便。

石渠村秀才鲍至善（1879——1950年）鉴于此，献银一千元，倡修古道。该村热心公益之士纷纷解囊资助，有一百、二百元者，有三、四百元者，亦有高至五百元者，十元以下者尤众。鲍至善邀集若干办事干练者，以襄其事。民国三年开始鸠工兴建。从淳安茶园采购青石板，直铺于路心，两边嵌以卵石路面，自兰城北门邑厉坛铺砌至浦江交界地（现之横木）而止，长六十余华里，历时十年竣工。耗银一万二千元。其间，鲍至善四处劝募、组工建造，不辞劳苦，未取分毫酬金，且自负川资。事成，在石渠桥庵亭内（现已拆建成供销社用房）勒碑以记其事并公布献助帐单。

此外，鲍至善曾修造石碧殿、小桥头、堰头、丁埠头等处石桥四座。其中，飞跨梅溪的六拱丁埠头石桥，多次被洪水冲垮，鲍两次出资修理，由于水流湍急，桥身不坚固而冲坍，最后，鲍发起重建，于民国二十年告成。

写于一九八七年三月石渠

# 浙赣铁路的前身——杭兰铁路

施兰舫

民国十八年（1929）三月一日，通商银行、兴业银行、实业银行、垦业银行等四家银行（当时称四小行）募集商股私资筹建杭（州）兰（溪）铁路。原定路线通过富阳，建德。后因山洞隧道工程艰巨，改由萧山、诸暨、义乌、金华，然后到兰溪。民国十九年三月九日正式动工。民国二十年六月一日通车至尖山，同年七月一日通车至诸暨，十月通至牌头，十一月通安华，十二月通义乌。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通车至金华，三月六日通车至兰溪。杭兰铁路建成。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开建金华至江山段。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通车至江山，更名为杭江铁路。后由国家投资往江西续建，正名为浙赣铁路。

一九八七年三月于兰溪

# 米市架

施兰舫

兰溪素有浙东米市之称。据民国12年（1923年）《浙江粮食之调查》云，兰溪米市由米行、米店、客庄、袋行、米市架组成，年经营量达一百万石。米市架在米市中是一支最活跃的力量。所谓米市架者，仅有一个秤架，别无长物也。但有别于牙行、肩客之类，且别埠均无，唯兰溪独有。

在半个世纪前（约1935年间），兰溪之中国银行仓库主任易篮田曾作过调查，据查在清咸丰、同治年间洪杨役后，有一帮武义、永康人流落兰溪，在南门外搭棚设秤，恢复米市。以后商业繁盛，逐步被挤下滩，成为米业职工之后路。每年都有一些米业职工被解雇辞退，参加到米市架行列之中。由于这些人既乏资金，又无店屋生财，也不参加商会和缴纳税金，赤手空拳，全凭三熟（人熟、地熟、业务熟）吃饭，白天活动，晚上散场，所以被人贬称为“白日鬼”。当时米业职工有一句口头禅：“大不了做白日鬼”，意思是万一失业，最末一条路，无非去做“白日鬼”。

“白日鬼”的挤身于米市之中，服务于产销之间，直到解放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才休止。其活动时间长达一个多世纪。在这个历史长河中，他们从南门外（今自由路一带）退到南门溪滩；从十多家发展到30多家；又从30多家减少到

# 兰溪医院始末

杨绍清

兰溪医院创于1922年，由杨遇春（茂荣）、姜伯英（辅周）、胡亚琴（宁）三人合办，翌年徐督中（秉铎）、郑顺之（宝升）加入。上述五人都毕业于高等医学院校。这是兰溪邑人最早创建的西医院。院址在兰溪北门塘湾新建的唐氏支祠，内分挂号室、候诊室、诊察室、药剂室、手术室，设病床十五张。凡手术器械、显微镜、蒸馏水器、消毒器等设备齐全。工作人员计医师五人，护士二人，学徒二人，会计一人，工友二人，共十二人，后院辟一花园，有林竹，环境幽静。当时社会上对西医认识尚模糊，初就诊者多为花柳病患者，由于治好一些当时认为无法治疗的危急重病，如外科截肢，难产处理，眼球摘除以及肺结核大咯血，重症痢疾等使信誉因之日著。



十多家。有时候“鬼”变了人，个别人被米行吸收，小部份白手起家开了小米店；有时候人变了“鬼”，米店蚀本，职工失业，又做了“白日鬼”。

如今米市架里的“白日鬼”已成了历史上的名字，一去不复返了。借古喻今，特记之以飨读者。

1924年分设龙游医院于龙游县，翌年改由郑顺之独营，姜伯英亦自设伯英医院于官桥，1925年胡亚琴因故去黄岩，医院由杨遇春、徐督中主持。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光复兰城，医院同人与姜伯英和兰溪县商会组成中国红十字会兰溪县分会，积极从事抢救伤病员，营团级伤员住院治疗，又在城内分建医疗站。为伤病军士服务，为北伐事业作出贡献。事后为了表彰兰溪医院的功绩，国民革命军先后赠予三块红色大匾额，文曰：“洞见症结”、“华陀再世”和“名重杏林”作为纪念。

1927年冬徐督中去山西，1929年回院。1934年杨遇春自设云山医院，抗战期间徐督中迁居柏社石塔头，兰溪医院就此停业。

（1987年3月9日写于金华）

# 兰溪最早的师范学校

## ——兰溪县师范讲习所

郑德森

为了发展国民小学教育，培养师资人才，兰溪县知事熊宪章于民国十一年（1922）在兰溪城东孔庙（现在兰溪市第二中学校址）创办兰溪县师范讲习所，这是兰溪最早的一所师范学校。

知事熊宪章聘请潘稻荪为所长，童壁卿为国文教师，徐思陶为教育学、教授法教师，章平为数学教师，徐玉丰为儿童心理学、动植物学教师，商子仙为体育教师。

我遵家父嘱，考入该所求学。

第一期招收六十人。学制两年。

教师徐思陶是兰溪南乡马鞍徐横山村人，清末秀才，学识渊博，才思敏捷，讲解清楚，议论精辟，同学深受教益。后来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教师童壁卿是兰溪西乡甘溪童家源村人，清末秀才，博古通今，才华卓著，仪态潇洒，讲课风趣，同学们爱听他的教学。他选用《古文观止》和唐诗为国文教材，传授诗词格律，同学们影响较深。

毕业后，有的同学续继升学，如童士奎，马润后童村人，考入浙江军官学校，毕业后曾任浙江省保安部队团长，

# 兰溪历史上第一所完全中学

## ——辅成中学

徐品生 凌成澜

1941年冬，日寇进犯上海。上海法学院决定内迁。院长褚辅成、教务长沈钧儒经过慎重考虑，认为金华、兰溪交通便利，可守可退，较为理想；同时考虑到这一带尚无大学，许多有志进高校深造的青年，也可就近上学。于是褚院长找到家在兰溪杨塘的校友俞瑞鹤讲师商量。俞表示义不容辞，愿为母校的安全内迁而竭尽全力。

迁校方案呈国民党中央教育部批准并拨款后，即逐步付诸实施。1942年9月间，会计主任，教授霍铭阶与讲师俞瑞鹤首先来到兰溪杨塘村。经过短时间的努力，成立了“上海法学院驻兰办事处”，积极筹备迁校和招生事宜。接着，总务主任，数学教授杨次廉等来兰，把俞家借用的部分房子加



解放前病故。其他多数同学由县公署分派各国民小学任教。

同学们对该所办理伙食不满，闹过一场风潮。师范讲习所仅办一期，不再招生，宣告结束。

一九八七年二月于兰城

以修理，作为教室和宿舍的准备工作。最后到达的是大部分教授、讲师、员工和一部分大中各部系学生，加上在当地招收的学生，人数达200余人。这样，上海法学院及其附中，便在兰溪杨塘这个偏僻的乡村、艰苦的敌后环境中开学复课了。

日寇侵犯金华、兰溪，上海法学院及其附中，不得不再度迁到安徽屯溪去。但附中一部分浙江籍同学，家长不放心自己的子弟离家远去，也供给不起学费、盘缠和生活费，因此就没有去屯溪。为了不使这些在校学生中途辍学，俞瑞鹤秉承褚院长的意愿，决心放弃屯溪的讲师工作，毅然回到故乡，为附中的再次复课而奔走呼吁。由于地方开明人士、学生家长和广大师生的支持，1943年8月，建成私立上海法学院附属中学浙江分校（以下简称附中浙校）。

附中浙校由褚辅成兼任校长，俞瑞鹤任主任，负责全面校务、教务的领导工作。校址设在寿昌县（今建德寿昌镇）更楼镇附近的干溪方村，1944年2月迁至兰（溪）寿（昌）边界的摩达岭。由于地处偏僻，物质条件极差，生活十分艰苦。在干溪方村，13个班级（普通高中班的商业专科各2班，初中6个班）只有8个教室，不得不采取大学的排课方式，上课无固定教室，自修课程和作业则要到光线暗淡的宿舍里去完成。

建校之初，人手很少，主任以下，只有朱金云、徐品生、凌成澜、赵宗瑞等工作人员，既要办理招考新生工作，又要办理旧生注册工作，几乎忙得寝食俱废。

建校不久，社会上那种团结抗日，抵御外侮，反对内战的抗日民主思想在校内很有影响。当时有一批在皖南事变中

幸免于难的革命同志（其中包括沈钧儒的女儿沈谱）由屯溪转移出来，路过干溪方，来到附中浙校，在俞瑞鹤的掩护下安全出境。不少来浙开展抗日工作的志士，也往往以此为中转站，前来暂作居留。学校迁到摩达岭后，曾一度组织师生深入农村，表演抗日救亡的街头剧、歌曲、舞蹈等，向农民群众宣传抗日。上述种种事实，终于触犯了国民党政府。他们对私人办学不仅不予支持，反而对学校有“赤化”嫌疑，不承认学生的学籍，并借口私立学校不得越省设分校，勒令学校停办。俞瑞鹤多方交涉，据理力争，褚院长及沈教务长获悉后，致电浙江省政府，阐明该院附中随学院内迁是部令批准，要求对附中浙校给予保护和支持。省教育厅不得不承认学校的合法性，并正式接受学校呈报学生学籍。

1945年8月，抗战胜利，附中浙校由摩达岭迁至兰溪诸葛镇，假“丞相祠堂”为校舍，学生增加到300余人。这时上海法学院从屯溪迁回上海。褚院长及沈教务长对附中浙校仍表示关注。褚院长在返回上海路过罗桐埠时，特电邀俞瑞鹤到旅次面谈，共商附中浙校的善后大计。经过反复磋商，决定将附中浙校改为独立的完全中学，定名为“辅成中学”，作为对上海法学院一度迁校兰溪的纪念。当时上海法学院校友、国民党衢州专员公署专员姜卿云在横山办有一家酒精厂，他慨然把全部厂房捐赠给学校作为校舍，于是1946年2月，学校从诸葛迁到横山。并且积极扩筹基金，准备向国民党政府立案，以争取学校的合法地位。

当时政府规定，凡创办私立完全中学，必须备足校田500亩，作为基金来源，方可同意备案。这是一个颇为可观的数目，一时难以筹措。俞瑞鹤想到了家中的祖遗产业，回

家同祖母商量，几经劝说，终于说服了祖母，同意捐田400亩，俞瑞鹤自己则倾尽其历年积蓄，向王姓人家购进良田100亩，共500亩，然后由院长褚辅成、教务长沈钧儒出面，上报浙江省教育厅立了案。于是，兰溪历史上第一所完全中学——私立辅成中学在横山之麓、瀟水之滨正式诞生了。艰苦经营创业的俞瑞鹤担任了校长。

之后，校舍不断扩充，又新建二层楼寝室10间，还向学校附近唐、应两姓租赁了一片土地为操场：开辟了一条400米跑道，一个排球场，一个足球场和四个篮球场，还有田赛场地。1947年8月，学生人数激增，横山校舍已无法容纳，于是便到城区租借严氏宗祠，专门设立了高中部。

教师的阵容，辅成中学是堪称上乘的。教育界老前辈原省立金华中学（即现在金一中前身）事务主任徐汉源担任事务主任，兰溪教育界颇负盛名的原附中浙校训育主任郑清之担任初中部主任兼历史教员，原金华中学数学教员罗松涛担任高中部主任、训育主任兼数学教师，原金华中学英语教师叶鹤龄任教务主任兼英语教师，英士大学教授曹百川亦不辞辛苦每周二次来校兼任语文课，原金华中学图画教员陈松平担任图画课。还有音乐教员吴志桢，体育教员方正，英语兼数学教员马权涛，年轻教师祝修恒、曹思启等，也都是当时的知名之士，所以私立辅成中学从创办到建国后与私立担三初级中学合并为私立新民中学（后改新兰中学）止，历时虽不太长，但她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祖国多条战线上，已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现在俞瑞鹤先生还健在，客居上海，已是一位七十高龄的老人了。几十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所遭的冤

屈，已得到平反昭雪。“满目青山夕照明”，他以其有生之年，亲身领受到党的阳光雨露。他前半生在教育事业上所作的耕耘，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心血并没有白化。当他在晚年回首一生，是可以自慰的了。我们作为老人的下属、同事和朋友，谨以此文，向他深致问候和敬意。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写于兰溪

# 建国前兰溪城区的三所私立小学

蔡启生

建国前，兰溪城区有三所著名的私立小学，与云山中心小学齐名。省视学多次来兰视察，均分别予以好评，教学质量高亦为社会所公认，并各自办出了特色。兹分别简介如下：

## 私立湘岳小学

光绪三十二年（1906），祝苇以科举既停，亟宜兴学，召集先祖湘岳公派下各房长筹办小学一所，定名为祝氏私立湘岳两等小学堂，推祝修圃为堂长，校址设在北门元宝巷。开办时入学者仅20人且多数为本姓子弟，聘教员2人，其经费由湘岳公祀款内拨给。翌年，祝苇生继任堂长，增广学额，添聘教员，校址迁入祝氏宗祠。宣统元年（1908），第一届高小生毕业，入学新生增多，乃添僦毗连之民房一座为校舍。民国元年，改称祝氏私立湘岳两等小学校。民国4年，祝苇生去世，由祝家源接任校长。民国10年12月，教育部以其捐资兴学在1万元以上，给予一等褒状并转呈大总统题给“敬教劝学”匾额一方。笔者于民国23年在该校就读时，犹见此匾悬挂于纪念厅上方。民国13年，省视学汪润来

兰视察该校后，给予“设备尚可，管教有方，校风静穆，各教员教授均甚勤勉。……查该校由祝氏湘岩祠出资兴办历10余年之久，已捐入洋1万余元，捐巨资以兴学，历久不懈，诚为该邑各族中不易数见之事”的评语。民国17年，改称祝氏私立湘岳小学。是年4月间组织校董会。民国20年，省视学又到该校视察，称赞办理成绩优良。同年，县教育局对全县各小学办理情况进行概评，谓该校“校舍整洁，布置有序，训育认真。教学颇能采取自动方法”。民国21年1月登记合格，3月，祝家源去世，校董会选举祝达（亦平）继任校长。从开办至民国21年暑假，该校初级毕业21届，累计毕业生241人；高级毕业20届累计176人。当年全校教职员13人，办有7个学级，学生258人。民国27年2月，改为城北镇私立湘岳代用中心小学。28年，因避日机空袭，迁移岩山蒋乡宅村授课。民国31年5月县城沦陷被迫停办。民国35年2月复校，由祝家麟继任校长，至民国37年（1948）年秋，仍为7个学级，学生317人，教职员11人。1949年8月与相邻之唐氏序伦小学（开办于民国35年）合并，改称私立城北联合小学，由郭以庄任主委。1951年8月，改称私立和平路小学，至1956年7月由国家接办，即现今之兰江小学。

## 私立著存小学

宣统三年（1910），赵大能、赵佩壬、赵典、赵延献等发起，为培植本姓子弟兼及异姓儿童得以就学，发起提拔祖产、募捐私款创办学堂，定名为赵氏私立著存高等小学堂，校址设在后官塘赵氏宗祠。民国10年，学生成绩参加全省展

览会获乙等奖。民国13年，省视学来兰视察该校后，给予“学生富有自治精神，各科成绩均有可取，各教员教学有独到之处。学生阅书室书籍符合学生程度，课外活动多有组织。……查该校学生发达，经费不甚裕如，每年不敷之数，均由校长赵贡淮捐垫维持，热忱办事，殊堪嘉奖”等评语。民国15年，因军事发生，过境军队屡驻校中，使教学不能正常进行。并使图书仪器校具等损失殆尽，故民国16年上半年，被迫停顿。下半年，校长赵贡淮邀集族中长事共同商议，着手恢复，于是复由祠中垫款，重新添置校具教具续继办学。续办以后，由于经费短绌，办学殊感困难（查当时私款仅占岁入总数的22%，其主要来源全仗学费收入），但该校教员热心任事，克尽厥职，其中最有名的为张镜清先生。学生各科成绩为当时各界所推许。民国18年，学生成绩参加西湖博览会展出获特等奖。民国20年，省视学视察该校，称赞办学成绩优良。同年，县教育局对全县各小学办理情况概评，称该校“校舍宽阔，布置整洁，秩序井然，教员忍苦耐劳，经费不多而办理尚属发达，颇堪嘉许”。民国21年，全校学生数已达401人，累计初级毕业10届，高级毕业14届。民国31年，因日军占据兰城，学校再度停办。抗战胜利后，于民国35年2月恢复，由赵光宇任校长。同年8月改由赵贡球任校长，至民国37年2月，又由赵承祺接任。民国37年（1948）年下半年，计有7个学级，教职员12人，学生292人。1949年5月兰城解放，人民政府文教科仍委赵承祺为校委会主委，1951年8月改由赵生龙为副校长。1956年2月，与附近之私立新安小学（民国35年4月由徽州旅兰同乡会举办）合并，改称私立罗盛教小学，同年7月由国家接办，即

现今解放路小学之前身。

## 私立绳武小学

民国7年2月开办，校址在世德路（今市总工会所在地），称严氏私立绳武国民学校，公推严以廉为校长，其办学经费除学费外，不敷之数均由校董会各董事（均为严姓）平均负担。至民国11年2月，增设高级，改称严氏绳武高等小学校。同年10月准予立案。民国13年6月，省视学来校视察该校后，给以“校舍整活，设置完备，秩序井然，成绩可观，各教员教法均无不合。校长严以廉办事勤恳，故能卓著成效，应请嘉奖，以资鼓励”之评语。是年秋，学生数达220余人，旧有校舍不敷应用，乃于原校址添造西式楼房一座，作为校舍。民国16年春，受军事影响，校舍迭被部队占驻，校具、图书、仪器扫荡无遗。至下半年，本拟恢复，装修甫毕，又被浙西警备司令据为行营。民国17年春，多方筹划，始得恢复初级部。民国18年秋续办高级乃复旧观，始改名为严氏私立绳武小学。民国20年，县教育局对全县各小学办理情况进行概评时，称该校“设备充足，布置整洁，秩序井然，教学切实，学生成绩颇佳，实本县小学中之优良者。”据民国21年统计，全校有教职员14人，学生272人，分设为7个学级，其校具设备均超越当时教育局规定之标准。民国27年8月因避日机轰炸，校董会决定停办。

1987年4月19日于兰城

# 兰 溪 滩 簧

沈瑞兰

滩簧流行于金华、衢州两府所属各县，尤以兰溪为盛。地方戏曲徽班也兼唱滩簧小戏，均为群众所欢迎。

各地滩簧只有男工、女工之分，而兰溪滩簧却比各地细致，男工有净、丑、生、外；女工则有花旦、正旦、老旦。要求上也有金、木、水、火、土五音之别，旦角唱金音，用尖嗓如金属之音；老生唱木音，吐字要喷；小生唱水音，唱子母喉；净唱火音，要求宏亮，喷口要粗；丑唱土音，脆而硬断。另外尚有六律。也讲究一白、二唱、三家伙。白，咬字要清，字音要准，不准有错别字。唱，要求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唱词文雅。家伙即乐器的演奏，列于第三。兰溪滩簧在唱法上能独树一帜，故能历久不衰。

演唱场面也与众不同，厅堂中设一长桌，桌前围桌围，交椅披椅披，桌上摆琉璃灯，红烛高烧，庄重，严肃。左右各设一把交椅，为主唱坐位。

滩簧班会一般由十人左右组成，演唱者奏乐器，奏乐者也能演唱，只有个别艺人唱乐不兼。伴奏之乐器，只有“丝弦家伙”，没有响器，三把二胡（用中弦、子弦，各调上六，合尺、四工三工）。琵琶，三弦，笙各一，一个鼓板，一对撞钟。唱的剧目有《断桥·覆钵》、《酒楼·醉归》、《梳

妆·跪池》、《借茶·活捉》、《芦林相会》、《思凡·下山》、《出猎·回猎》、《昭君和番》、《劝酒》、《渔家乐》、《黄金梦》、《逼休·覆水》等。昆曲《缀白裘》上所载的剧目，滩簧大多也有。当时兰溪有个业余作者唐春槐将昆曲剧本改编成滩簧剧本又能配曲。《牡丹亭》、和《红楼梦》的《葬花·焚稿》都曾由其改编和配曲。剧目尚有“五独”（和番、尼会、痴梦、芦林、覆钵），“五劝”（劝酒、劝友、劝妆、劝秦即扫秦、劝农），“五别”（秋江分别、描容分别、五里桥别、坝桥分别等）“四喜”（酒楼、醉归、月、活捉）之称谓。曲调除男女工外还有紧板也有专用曲如迷魂调；小曲，有“四季乐景”、“十把扇子”、“满江红”、“独对孤灯”“四喜八仙”、“月照梅梢”、“放风筝”等一百余首。曲牌有“金绞丝”、“满江红”、“红绣鞋”、“跌断桥”、“道情调”、“傍妆台”、“鲜花调”、“湘江浪”、“乱弹”、“滴滴金”、“挡月”、“鸳鸯枕”、“回簧”、“水调”等。也有不少借用昆曲曲牌，如“点绛唇”，“西厢记”中多有，故有昆曲别支之称。演奏之乐曲《四合如意》、《普安咒》、《回簧》、《春来曲》也有很影响。

现尚健在的七十七岁能唱多种角色的老艺人朱允升介绍，老辈艺人说兰溪滩簧是清代乾隆年间一位知县的苏州师爷所传教。其技艺极精。公务之余，集“太子”（士绅及富家子弟）于一处，传教演唱，此后才逐渐流传于社会。而且参加滩簧班会的多属社会上的斯文人物。

早年之班会，1900年前后有馀庆会。其成员有蔡兰兰、方方（旦）、蔡孔修、周老维（说书艺人）、汪樟林、林岐

山（教戏师傅）、罗吉人（教戏师傅）等人。1910年前后组成之群乐会，成员有徐绍宗、蔡寿昌、严龙田、唐星垣、郑绍康等人。

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业余爱好者徐绍宗、郑绍康均染烟毒，蔡寿昌深恐滩簧失传，又于1930年广邀同好组成“咏春会”，参加者有吴晓峰（修煤气灯为业）、陈镇品（西门寿山堂药店夥计）、诸葛蒲洲（南门三益药行夥计）、冯周杰（西门于大兴烟店夥计）、樊炽昌（住雀门巷）、郑德禄（西门陈太和纸店夥计），由蔡寿昌教唱。对外演出时也邀请老一辈艺人唐星垣、汪翰臣、郑绍康（讼师）、汪志云（镶牙医师）等人一起演唱。与此同时，北门祝宝琪家也曾邀集祝氏族人及亲戚学唱滩簧，有祝修水、祝修文、祝修仁、祝修兰、徐寿慈、徐涛涛、吴志桢等参加，由樟雨先生教唱，俗称北门滩簧班。

1935年柳耕南置办乐器，组成同乐会，邀请咏春会成员朱允升等人到他家聚会演唱。

抗战期间，兰溪沦陷，城区滩簧爱好者，纷纷避难，散居乡间，将滩簧传播至永昌、诸葛、游埠等地。

抗战胜利后，季乐可、徐绍宗、蔡寿昌等人为首重组咏春会，直到解放前夕。

解放后，工人文化宫吸收朱允升、郑德禄等人加入业余演出队，曾编演滩簧戏《红色女儿》和移植《朝外货》，传统剧目《拜月》，上演后很受群众欢迎。

# 兰溪戏曲之今昔

沈瑞兰

戏曲唱班之在兰溪，历史悠久，如金家昆腔坐唱班始于乾隆，伍家圩昆腔班创于清同治初年。在距今二百五十年前，兰溪各地就有星星点点的戏曲唱班。并且普及于晚清，盛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剧种有三合、昆腔、徽戏、罗罗（乱弹）等数种。其中以昆腔为高尚，当时，算是“阳春白雪”了，罗罗则为文人所轻视，算是“下里巴人”。据统计，蜀山镇所属各自然村，几乎村村有坐唱班，有的村竟有昆、徽两班。女埠区各乡也有类似情况，其中，樟坞村、黄湓村在二、三十年代就曾同时出现昆、徽两个坐唱班。由此可见当年农村戏曲唱班之盛况。所以，戏曲之在兰溪，具有悠久历史，在明末清初，兰溪出现李渔（1610—1680）这样伟大的戏剧家，不是偶然的。

包品玉班是二、三十年代在金、衢一带首屈一指的三合班。创办人系兰溪永昌董塘的包均仿。解放后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浙江分会副主席的高腔老艺人江和义，是该班台柱。一九五四年先后在浙江省和华东地区戏曲会演中获奖的《槐荫分别》系当年该班上演的传统剧目，后来由江和义传授给浙江婺剧团的。与包品玉班同时创办的包庆福徽班，集徽戏之群英，名丑筱兰英、花旦姜如奶、名小生小牛等，风靡一

时，成为金华八县之冠。

解放以后，由于经济发展，戏曲演唱更趋繁荣。五十年代末，兰溪市农村剧团达到三十余班，可谓盛哉。可惜，只演唱徽戏、乱弹，而高腔、昆曲则很少教学。可喜的是樟坞三合班却保留了我国目前绝无仅有之西吴高腔和西安高腔。所谓“三合”，即集高腔、昆曲、乱弹等三声腔于一班之谓也。包品玉之“品”字用于三合，可谓绝妙之词。我国属高腔声腔的剧种甚多，如四川高腔、湖南高腔，均有专业剧团演唱，唯浙江之西吴、西安高腔已频绝迹。地处小山村之樟坞，在人、财两缺的情况下，为保留古老之曲调及其剧目而极尽全力，其精神实属可嘉。樟坞三合剧团，目前尚能演出西吴高腔《平贵征东》、《古城会》、《青梅会》、《鲤鱼记》、《十五贯》、《白兔记》；西安高腔《太平春》、《葵花记》、《合珠记》、《芦花絮》、《槐荫记》等。然传教之艺人，仅存二、三，且已年过花甲，力不从心，又无经济支柱，如不及时给予扶持，绝唱之期不远矣。

近年来，除市办专业剧团外，经常活动于农村的业余剧团有马涧婺剧团、岩山婺剧团、游埠群乐婺剧团、樟坞三合剧团、上唐万松剧团、永昌新星越剧团等，其中以马涧婺剧团为最佳。

# 郁达夫写兰溪山水

郑秋兔

一九三三年四月，郁达夫迁住杭州。

在秋高气爽的十一月九日，郁达夫应杭江铁路局车务主任曾荫千之邀，离杭作该路全程之旅行。同时被邀的尚有著名摄影家兰溪人郎静山和陈万里等。由于郎、陈两君需于是月十七日始能到金华会合，因此起程时仅郁、曾两人。

十一月十三日晨，郁达夫由曾荫千陪同由金华站坐轨道车到兰溪，饭后就出西门，雇了一只小舟，划向隔江的横山。

横山为当时兰溪八景之一，山上有石刻“兰荫深处”四个大字，相传是正德皇帝御笔。凭空矗立、雄伟多姿的自然景色，给这位我国近代文坛上负有盛名的重要作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美好的印象。他在所写的《杭江小历纪程》中，对横山的描绘，真是情景交融。他说：“横山并不高，也不长，状似棱形，从东面兰溪市上看来，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可取，但身到了此山，到兰荫寺前的小峰上去一望，就觉得风景的清幽潇洒”。又说：“三面的远山，脚下的清溪，东南面隔江的红叶与正东稍北兰溪市上的人家，无不一一收在眼底，象是挂在四面用玻璃造成的屋外的水彩画幅，更有水彩画所画不出来的妙处哩”。还说：“你且看看那些青天碧水

之中，时时在移动上下的一面一面的同白鹅似的帆影，彩色电影里的外景影片，究竟有那一张能够比得上这里，还有……到此地来游，就可以把兰溪市的全市及附近的胜景，霎时游望尽了”。

郁达夫对横山独具深情。例如他在翌年三月所写的《临平登山记》（原载一九三四年四月《人间世》第一期）一文中，又写了“从前我曾经到兰溪，从兰溪市上隔江西眺横山，每感到这座小小的兰荫山真太平淡，真是造物的浪费；但身入了此山，到山顶去向南向东向北的一看，反觉得游兰溪者这横山决不可不到了”。他在一九三五年所写的《出奔》这篇小说里，甚至还衍化和扩充了一幅无比美妙的横山雪后风景，他写道：“大雪后的横山一角，比平日更添了许多的妩媚。船靠岸这面沿江的那条小径，雪已经溶化了大半了，但在道旁的隙地上，泥壁茅檐的草舍上，枯树枝上，都还铺盖着一阵残雪的晶皮。太阳打了斜，东首变成了山阴，半江江水，压印得紫里带黑，活象是水墨画成的中国画幅……”，“照得人头脑一清的，却是那一张蓝得靛草花似的苍穹；更还有高戴着白帽的远近诸山，与突立在山岭水畔的那两枝高塔，和回流在兰溪城东西南三面的江水凑合在一道，很明晰地点出了这幅再丰华也没有的江南的雪景”。

郁达夫游横山后，当晚有人请客，晚上他写下了两首诗。其一为：“红叶清溪水急流，兰江风物最宜秋，月明洲畔琵琶响，绝似浔阳夜泊舟”。其二为：“阿奴生小爱梳妆，屋住兰舟梦亦香，望煞江郎三片石，九姑东去不还乡”。这第二首咏的是当时兰溪江上的花舫。

郁达夫到兰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去

六洞山游。先到栖真寺，看了赵太史读书处，天池，飞来峰；经过呵呵洞、无底洞进了白云洞，在《杭江小历纪程》中，他说：“因洞身之窄，所以仰起头来看看洞顶，觉得特别高，毛约约，大约可有二三十丈，洞顶洞壁，都是白色的钟乳层，中间每嵌有一块一块的化石；钟乳层纹，一套一套象云也象烟，所以有白云洞的名称……。在兰溪多住了一天，看了这一个洞，算来也还值得”。

郁达夫看了栖真寺藏经楼所藏的明代《大藏经》半部，并拓下了佛座下的题诗石碣数方。饭后，并把昨夜所吟的第一首诗，挥毫题在寺壁。

第三日，即十一月十五日，郁达夫晨起出旅馆，即上大云山揽胜亭去，并观赏了仓圣庙前的能仁塔和同仁寺里的下塔。午前十点钟，过江在马公滩上汽车去龙游。

郁达夫，远渡过重洋，多少名山大川，留下过他的足迹。但他对兰溪的山山水水，似乎有着格外的依恋和无穷的回味。他在《出奔》这篇小说里对兰溪的风貌是这样回忆的：“金华江曲折西来，巨江游龙似地北下，两条江水会合的洲边，数千年来，就是一个闾阎扑地，商贾云屯的交通要市。居民约近万家，桅樯终年林立，有水有山，并且还富于财源；虽只弹丸似的一区小市，但从军事上、政治上说来，……这兰溪倒也是钱塘江上游不得不先夺取的第一要港”。

1987年7月27日

# 兰溪画家童之风

八十八岁老人夏家丞撰 郭瑞升整理

童之风，原名志峰，字晓岩，别号白露山樵，晚号定禅居士。兰溪甘溪乡童家源村人，年弱冠即专业丹青，学成赖此以营生。后与擅长山水之黄晓汀 跻进画擅。并与黄共赴严陵、桐庐、分水一带游览鬻画。童之风善画小像，黄晓汀为之补景，颇受地方青睐。嗣后二人分手，童单独回兰弃写真而改作人物画。斯时得地方名士杨文芷鼎力推重，声誉日高。童更潜心攻研绘奥，求现实以取胜。对人物衣褶线条，保持传统运笔，不失古雅；人物面容取各家之长，重视轮廓，设色渲染，以求雅丽。所成作品，独具一格。适逢南洋劝业会征画，乃投稿二张，均获奖金。此后上海中华书局征画，之风再投画稿，相继选用，从此画名大噪。上海画家钱云鹤创办神州吉光集书画会，发行画册六期，童之风作品每期均有列入。钱云鹤又通知画友，如有应征画稿上百幅者，可以代出专集，童即全力以赴，成百幅以应，不久童之风画谱即出版问世。其后铜版再版童之风画稿一集。江苏丹阳青云书画社亦来函征画，童之风即邀其门人及汪邨仙等画家群起参加，共出画册二期。并与杭州湖山金石书画会，江苏常熟书画流通社、南洋杏隆坡书画会均有交流。综观兰溪画坛，自民国初期至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下转第133页）

# 兰江花舫勾勒

郑秋兔

兰溪地处二江之汇合口，商业繁荣，抗日战争以前，沿江一带，帆樯林立。其中除交通船、货船之外，尚有一种结构颇为精雅之花舫。花舫始自何时，无从考据，由于舫尾置炉灶处突然耸起，故又称高拔船。舫之前后舱设小房间，作客座，左右两窗，可以凭眺江干风景。每一花舫有花舫女二、三人至八、九人，她们出身于穷苦之家，或被骗、或被卖，各人都有一本自己的辛酸史。花舫以驾长娘为主持人，舫女受其盘剥，甚至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舫中雇有水手若干人，以备迎送顾客、买办酒肴。当时有许多商家皆以花舫为宴客场所，酒阑奏曲，有时竟通宵达旦。每届元宵溪西灯节，或在农历四、五月间周王庙、关帝庙庙会演剧之期，花舫营业特别热闹。1926年军阀孙传芳部过兰溪，花舫中人逃避一空，孙军强行以舫衔接，架作浮桥，船只多遭损坏，花舫以兹减少。一九三三年兰溪实行实验县以后，当局加以限制，除改业外，仅有者亦逐渐迁住民房，旧有之舫遂搁置中洲听其残毁，至抗日时期，即已销声匿迹矣。

本文系根据笔者之堂祖父郑深夫之记叙改写

# 操守清廉的童元亮将军

王开甲

童元亮字志军，号莲溪，生于1894年，兰溪市女埠区金家村人。父为塾师，严于家教。少时由兰溪云山小学而入陆军小学，直升保定军校深造。毕业后服务军界多年。“八·一三”事变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直接参与筹划。上海失守，随军后撤，改任通讯兵三团团长，又任陆军通讯兵学校教育长（校长为蒋介石），授陆军中将衔；后又任军事高级参议、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通讯教官等职。

先生律己甚严。把“在家勿谈公务”定为家规之一；平时不因公不乘坐小汽车；常告诫部下勿私占一分公款。亲友往投谋职者虽多，但须有特长，方肯安排工作；否则供膳、出资遣送回家，曰：“败坏我的名声！”对自己的亲侄崇基也不例外。当年崇基年轻，先生使之学汽车修理。因聪颖好学，精于业务，后来逐步升任联勤总部第一汽车修造厂厂长；解放前夕，该厂撤往台湾，崇基现居海外。

先生自奉俭约，俸金除维持全家衣食，还得培养子侄读书；加以内迁，生活自然艰苦。平时抽低档烟，穿旧服；家中不逢年过节，不设酒宴。每次回乡省亲，亦便服微行，留警卫员于兰城不使跟随。住宅陈设简陋，即在上海时的客堂

亦不过藤椅数张。张治中、白崇禧等来访，每笑其寒酸，先生淡然置之。因此身后两袖清风，并无存储，家族中人常谐之为“穷将”云。解放初期，幼儿幼女教育费全靠大女儿自力支持；夫人病盲，亦全由长女警英侍奉。

1943年，抗战形势处于极度困难阶段，先生任通讯兵学校教育长于贵州麻江。时日军迫近独山，窥伺黔境，一时风声鹤泪，机关纷纷后撤。同驻还有炮兵、辎重兵等三校因仓皇撤退损失甚大。先生适奔母丧回乡，返任不久，鉴于交通工具奇缺，急中生智，乃购黄牛百头，组成黄牛运输队，由当地农民协助押运，言明至贵阳后将牛分赠给农民以为酬劳。农民积极性高，两地虽距三百多华里，而都将比较难运之器材及信鸽、军犬等安全而迅速地运到了贵阳。其他高级器材则用小汽车轮番抢运，眷属、职工分批搭乘运输卡车，自己最后撤退。这样，就为国家保全了大批军用物资。然而先生并没有因功而受赏，正为长女童警英所说，反而飞来了一场“横祸”。原来当农民分得黄牛，于贵阳招摇过市时遭到外界误会。有人密报蒋介石谓先生劫持农民耕牛抵贵阳拍卖渔利，蒋即大怒。故先生甫至贵阳，惊魂未定即被蒋电召去渝待审。及先生面陈实情，始免于查办而示意辞职。其他三校教育长则均因未遇敌而先乱损失惨重并遭撤办。

自此，先生仕途即一蹶不振。被留在重庆任高级参议一段时间。抗日胜利后回上海闲居，生活清苦。连两只鸡蛋、八片饼干之“传统”早点，有时也难以为继。其时警英任教江湾空军子弟学校，以自己配给来的鸡蛋按时供养，以尽孝心。后来又不得已去南京汤山中央军校任通讯教官。解放前夕定居杭州。浙江省主席周岳两度用小汽车接其同赴机场

飞往台湾，先生均以“我无金条”，婉言谢绝。

本材料由童元亮长女童警英口述提供

王开甲1987年3月写于兰三中



（上接第129页）止，兰溪书画蔚然兴盛者，实由童之风为创始。童之风先生直至一九六零年逝世，享年六十八岁。

# 倪 谦 吉 事 略

吴子受

倪谦吉字益斋，金湖乡倪家村人。是兰溪籍在上海丝织业中的巨擘，有“浙东第二富翁”之称。曾对兰溪教育文化事业，作过不少贡献。

谦吉于光绪29年（1903）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寒。十六岁于鸣歧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立第七中学；读了一学期，因经济困难而中辍。之后，在白鹤桥小学当了两年教员。民国13年他的妻叔吴峻在杭州天章丝织厂任技师，带他到该厂当一名杂工，在工场里做整理打扫工作，每月工资银币二元。

他对周围事物善于观察研究，在工场里对摇杼、经丝、踏花、机织……各道工序，都留心观察，得其诀窍。对当时先进工具如电力织机的构造、性能，更能周知洞达。两年后，技师难以修理的机器故障，经他一番察看，举手之间得以修复，运转自如。因此，全厂上下都器重他，把他调入力织部，当织工。

民国16年随吴峻到上海云霞丝织厂，因常年不出次品，升为技工。又时常向厂方提出改进趋时织品花样和制止浪费的建议，一经采纳，都奏实效。于是在同业中有干才之誉。南亚绸厂、锦新绸厂相继聘为厂长。在较长的工作实践中，

他初步探索出丝织原料的来源，质量和产品出厂后价格变化的规律，颇有心得。

时小沙渡路有一规模颇大的“大鹏丝织厂”，以上海中国银行出纳胡梓林为主要股东，因经营不善，连年亏蚀，闻倪谦吉之名，以高薪聘为厂长，授以全权，冀挽危局。就任后，出其心得，竭智尽忠，进行重大改革，两年之间，转亏为盈。接着在胡的尽力扶植下，贷购电力织机六台于同乐坊，自己开始营业。以后逐年扩展，至抗日战争前夕，在沪东独资开设“锄经”、“大经”、“大伟”三个绸厂，天津路开设一个发行所。合资开设“大华绸厂”（在东有恒路）“大元绸庄”（在南京路丽华公司内一楼）以及苏州的“隆泰绸厂”，名声大振。

他的治厂方针，在生产上以提高质量为中心。他厂里生产的“天香绢”、“采芝绫”两个品种，在当时市场上最获好评，为厂帮所乐购，远销印度，香港。

在业务上，竭力注视市场动态，掌握产品的畅滞，在出厂价格升降调节，不使积压而影响资金周转。某项产品如在市场上供过于求，或在厂内积压已多，或者成本太高时，立即采取措施，改织其他品种，先行少量试产，由发行所向上海著名绸布店三大祥（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联系试销，试销对路后再扩大生产。

在行政管理上，不摆大老板架子，能团结工人、职员，上下一心，提高产品质量。由于终年生产正常，绝少停工待料，职工生活，较有保障。工资待遇较优于同业。劳资纠纷很少，罢工情况基本没有。

在对外关系上，奉行“诚”、“信”二字。他常说：

“待人接物，没有诚意，终归失败”。“做生意不守信用，等于自掘坟墓。”他曾聘过一位蔡经理（东阳人）精明练达，生意手段很高明，但对人缺少诚意，工作上还是受到损失。而他自己呢？每当银行或私人贷款清偿期近，即使抵押原料、产品，也从他处贷来，按期清偿。由于平日待人诚恳，信用卓著，所以每次扩展事业，或遇于资金难以周转时刻，随时都能得到金融界的大力支援。

抗日战争初期，事业继续扩展，在杭州忠清巷独资开设“大龙绸厂”，仓河下“大伟绸厂”。合资开设“阜丰”（在清泰路）、“鼎丰”（在水师前）、“万丰”（在下城区）三个火腿庄。

因为切身感受民间金融对振兴工商业的巨大作用，在杭州发起组织“腿业银行”（在盐桥）促使家乡特产在流通中发挥更大的优势。以后又任过杭州建华银行董事长。上海绸业银行发起组织人之一。

倪谦吉胸襟开阔，思想进步。常说：“财富是全社会的’所谓‘私人财产’说穿了只是社会财富在一段时间，一定范围内，归某个人支配罢了。”对家乡的公益事业，一贯热心赞助。如民国23年兰溪设实验县时，他捐资兴建游埠乡中心小学校舍；民国35年资助祝谏扩建担三中学；民国36年购买印刷机具，捐赠“兰溪导报”社。其他如兴修上海丽园路的“金华会馆”；在昆明路赁屋一幢，供兰溪同乡往来住宿，无论认识与不认识，一宿两餐，普遍接待；缺盘费的，代购车票。故外号又叫“大菩萨”。

在他厂、庄任过厂长、经理的兰溪人，受他培养扶植后来在上海独立设厂的有：章寿田的“友恭绸厂”、（在榆林

路)、倪颐吉的“集成绸厂”(在杨洲路)、章鼎怡的“鼎兴绸厂”(在榆林路)、章诗潮的“义兴绸厂”(在通北路)。

1952年患脑溢血卒于上海。长子倪星勤继承绸业；次子倪星棠，是内蒙古大学数学系副教授；幼子倪星彰，任上海江湾机械厂医务处医师。

本文部份资料承七十老人章寿田同志提供，并对全文核实，附此致谢。

1987年2月6日写完

# 西 藏 回 忆

所那陀吉

1942年9月我率领的军统直属拉萨通讯组入藏，成员有：组长由我担任，当时以藏名所那陀吉，出面组织。会计蒋肇邦，汉族，杭州人，浙江商业学校毕业。报务员汪藻，（原名常希武），汉族，甘肃兰州人，军统兰州训练班毕业。机务员李梦明，汉族，青海西宁人，军统兰州训练班毕业。贾麻，藏族，西宁塔尔寺喇嘛，担任饲养员。香曲，藏族，西宁塔尔寺喇嘛，担任炊事员。我们经过青海草地，冲破黑河阻挠，终于到达拉萨。拉萨城，藏人称“佛地”，又称“太阳城”，在三千公尺高原上，居高临下，气势磅礴。我组以经商作掩护，赴藏工作，军统局给我们的任务是：收集西藏政治、军事情报；注意英国活动；宣传抗战，搞好汉藏团结。戴笠亲口对我说：“你们去西藏工作，是经最高当局批准的。一定要不辱使命，完成任务。”他针对路途的艰难，强调说：“只要你们安全到达拉萨，就算你们完成任务。”我们一行骑在马背上，遥望高耸云表的布达拉宫。回忆几个月的艰难旅程，今天终于到达目的地，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们首先拜见了蒙藏委员会驻西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经过他的疏通，西藏方面不再过问我们在拉萨的行动。我们

一个组分两处居住。报务员汪藻和机务员李梦明租借一家回族商人的几间平房，架设美制无线电台，每日与康定、重庆联系通报，一同居住的还有贾麻喇嘛，任勤杂。我与蒋肇邦两人，租借在拉萨市内一家藏民的房屋居住，香曲担任我们的炊事工作。贾麻与香曲，在几个月甘苦与共的旅程中，互相有了了解，到达拉萨后，他俩人办完了朝圣拜佛后自愿留下为我们做勤杂工作，而我們也很需要他们，后来通过他们的青海同乡的关系，介绍我们认识了西藏三大寺的许多青海籍高僧喇嘛，对我们开展工作有不少帮助。

当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五个年头。可是在西藏好似世外桃源，没有丝毫的战争气氛。外界信息隔绝，拉萨确是一个封闭的城市。

拉萨市上商店稀少，除了川、滇茶商外，最多的是北京旅藏商人，经营的丝绸制品和宗教用的手工艺品，深得西藏人的喜爱，所以贸易额不少。四川、云南产的砖茶，是西藏人民日常不可缺少的饮料，从陆地驮运或经印度加尔各答海运进入。云南在印度噶伦堡设有茶叶分号的有：铸记茶号，店主马得材，原籍云南中甸县，早年从陆路往来于滇、藏之间，贩买砖茶起家。马的弟弟马义材专驻拉萨经理，马得材则在噶伦堡坐镇。所得西藏银子，兑换成印币后，汇回云总南店。铸记茶号在印度噶伦堡用十万卢比修建了一座住房。另一家叫张小舟茶号，店主张小舟。这是一家资本雄厚的茶商。张的哥哥张相诚在噶伦堡设有分号。捐资兴办华侨小学，颇有名声。

北京商人在拉萨设店的有德茂永、裕盛永、兴记某号等。他们分别在印度噶伦堡设有分号，盈利甚丰。

还有一家滇商，店主马青山，父辈就在西藏经营从印度进口的百货，生意兴隆，由于马青山的妻子是藏籍妇女，所以家庭纯属西藏生活习惯，有一位入赘女婿，名刘双喜，汉族，年轻力壮，经常去印度办货，汉、藏、印三种语言都很流利，是该店的得力助手。

西藏与尼泊尔毗连，拉萨有不少尼民百货商店，还有制作金银首饰的工艺作坊，西藏妇女喜戴金银首饰，特别是贵族夫人小姐，头顶上的“巴珠”，镶嵌的真珠玛瑙及钻石，价值动辄以千万元卢比计。寺院建筑、经堂、佛祖塑像多有各种饰物，均由尼籍工人经营制作。

西藏人少地广，人民从事畜牧业为主，过着草地游牧生活，每年生产的牛羊，供食用外，包括皮毛，均出口印度，又从印度进口布足、粮食及其他日用品，连火柴之类都依赖进口。其贵族则依靠剥削农奴血汗过着阔绰的生活。麝香、虫草等名贵药材以及羊毛、皮张等出口印度的商品，大部分由与西藏政府有关系的康藏籍巨商承办。最著名的有“帮达昌”和“桑都仓”两家。

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四川长寿县人，比利时留学生，原任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翻译李国霖，西康人，原任蒙藏委员会藏文翻译。科长刘桂楠，山东人，蒙藏委员会训练班毕业，1944年处长调动后，回重庆任蒙藏委员会专员。调查员吴三立，广东人，蒙藏委员会训练班毕业，通英语。

孔庆宗是在1940年随重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主持坐床典礼后，留下任处长的。任职四年，与西藏“噶厦”政府关系不甚和洽，处理

问题往往不从汉藏民族大处着想，藏方上层人士颇感失望。而另一个交通部所属拉萨无线电台台长张威白（湖南长沙人，中央军校毕业），方法灵活，性格开朗，深得藏方好感，后因与孔发生矛盾，遂先于孔离职回川。

设在驻藏办事处大厦的机构还有气象测候所和拉萨小学。气象测候所主任曹巽，青海人，兼任军统萧崇清组组员。测候员邓明渊，四川人，兼任拉萨小学教师，并为萧崇清军统组工作。西藏拉萨小学，校长王信隆，西康人，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兼任中统驻藏工作人员。碧松喇嘛，汉族，江苏镇江人，原为拉萨三大市喇嘛。曾回南京与CC派陈立夫接上关系，1946年受中统局任命接替王信隆任拉萨小学校长。拉萨小学属重庆教育部，另有湖南人罗坚任教师（罗原在军统萧崇清组任报务员）。

拉萨，弹丸之地，可是在抗战时期，从重庆方面派遣入藏的组织 and 特工人员却是不不少的。其中以军统萧崇清组为较大。组长萧崇清，中央军校毕业，回族，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萧必达（出生在拉萨回族家庭，曾任清朝政府的藏文翻译）。副组长张知重，回族，徐州人，萧崇清的军校同学。报务员罗坚，湖南人，兼任拉萨小学教师。与颜俊为连襟。萧组与交通部在拉萨的无线电台关系密切，谭兴沛接替张威白任台长后，谭兼任萧组工作，成为该组的轴心人物，供给西藏地方的情报，后萧崇清调回重庆，由谭兴沛接替组长。萧组利用若干回族青年搜集情报。另有青海人麻延龄，系重庆的军统外事训练班毕业，派入后藏扎什伦布为军统进行特务工作。

重庆对派驻西藏的各种组织之经费均各自独立汇发。我

组经费由军统局通知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馆的李能庚转发。转发给的是印币，必须向北京、云南茶商折换成西藏发行的“藏银”，才可使用。

我组与萧组都属军统，但互相不发生关系。只是搜集情报方面，萧组偏重于军事，我组偏重于政治、宗教。

从满清朝廷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西藏一贯采用羁縻政策，只要不受外来势力控制，名义上归顺中央就好。

贾乐丹珠，他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胞兄。1933年，我们同在拉萨电报局长吐田桑培办的学校学习藏文。学习中，他经常向我学习汉文，我则经常向他请教藏文。学习三年，我们结成好友。1946年，由当时的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陪同飞赴南京，成为蒋介石的干儿子，被安排在中央政治学校学习。1948年，贾乐丹珠与苏州小姐朱丹女士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婚礼，结成伉俪。后来贾乐丹珠在西藏地方府政中，起了很大作用。

吐田桑培，是我在西藏学习藏文的老师，他是藏族僧官，受西藏政府的派遣，曾在印度学习电报专业。毕业后，回西藏担任拉萨电报局局长，专门与印度境内通报。吐田又在电报局内办了藏文学校，招收拉萨贵族世家子女入学。笔者藏名所那陀吉，就是吐田所赐。他曾留学印度，通英语，喜欢接近亲汉人士，抗战结束，他代表西藏政府前往南京祝贺胜利。

光绪年间，英国曾派遣印军入侵西藏，战死藏军一万余名，因此九世达赖仇恨英国，强邻沙俄乘虚而入，派一名间谍名叫吉道夫入藏活动，担任达赖的老师。不料，日俄战争爆发，沙俄无暇远顾。英国卷土重来，光绪三十年七月，

借故再次入侵。

西藏“扎萨”，是西藏政府的官阶，为德高望重的高层封号。拉萨当时有“索康”和“擦龙”两扎萨。索康扎萨兼任西藏外交局局长，擦龙扎萨兼任西藏造币、军械局局长。他们两家又是掌握大量财富的庄园主。两位扎萨手法灵活，周旋于汉、英政治势力之间，左右逢源，有权有势。甚至，索康的第二代“索康汪钦”在政治舞台上也有显赫的地位。当年，西藏当局，成立外交局，孔庆宗处长奉命给予阻止，这也是孔庆宗与藏方发生矛盾的原因之一。

1944年春，重庆政府发表沈宗濂为驻藏办事处处长。这是蒋介石从侍从室遴选后交给蒙藏委员会加以任命的。沈系浙江湖州人，美国留学生，曾任外交部总务司长和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官员。随考试院长戴傅贤访问过缅甸、印度等国，对南亚诸国国情较为熟悉。他的祖先在清末民初，担任外交界重要职务，所以可称外交世家。沈又是中国著名铁路专家詹天佑的女婿。

沈率领新班底六人、随从一人、家属六人（十三人的护照由英驻重庆使馆签发），乘飞机至印度加尔各答，于1944年4月中旬到达拉萨。其人员除处长外，有：主任秘书陈锡璋，天津人，原任外交部会计，随带妻、女各一人。英文秘书柳升祺，浙江兰溪人，上海光华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与陈锡璋的女儿结婚。科长李有义，河北人，与随行爱人均毕业于燕京大学。后爱人难产死于拉萨。医师葛成之夫妇，葛系留法医学博士，苏州人。此外，还有专员四名：李茂郁（蒙藏委员会职员）、李唐晏（中央信托局职员）、刘毓洪、廖鲁芑，因未得西藏政府同意，英驻华使馆拒在护照上签证，

因而未能进入西藏。

沈入藏后，均向地方政府大小官员赠送了礼物，向三大寺喇嘛作了优厚布施。又在拉萨宴请各阶层人士，驻藏办事处贵客盈门，宴无虚席。一时间藏方对我汉族十分亲热，一扫过去在孔庆宗任内的阴霾气氛。

可是，沈年已五十多岁，不能适应高原气候，兼以过惯西洋生活，在拉萨一年多，经常患病，请求回内地治疗，于1945年冬奉命返渝，由主任秘书陈锡璋代理处长职。沈将达赖喇嘛的胞兄贾乐丹珠秘密带离西藏，并亲自陪同前往重庆、南京。这件事，算是立了一功。陈锡璋代理处长职至1949年大陆解放时解体。一部分人员回内地，一部分则留在西藏及印度。

拉萨没有城池，布达拉宫既是达赖喇嘛的宫殿，又是西藏“噶厦”地方政府的所在地。但实际上是一座大碉堡，保卫着拉萨。西藏的县（藏名叫做“宗”），县政府建筑在小丘顶的一座碉堡里，有县无城，这是我国其他地方所罕见的。假如敌人要来侵袭，从碉堡中，居高临下，一目了然，便可指挥武装出击。当时，西藏只有少数军队，全部是英国武器，学习西洋操典，连“立正”、“稍息”口令都学习英国的。藏军编制以营为单位，营长叫“代本”，总司令称为“马寄”。整个藏军力量十分脆弱。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通过地方政府及三大寺堪布会议选举色拉寺（西藏第二大寺，有喇嘛三千三百人）的热振活佛摄政。当时热振竟二十多岁，在其摄政期间，选定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化了十万银元向青海马步芳疏通，顺利迎接至拉萨，这是热振摄政期间办的一件大事。热

振活佛亲近南京中央，为西藏的亲英派所嫉恨。后来热振因病假休养于色拉寺，被代摄政者达扎喇嘛所暗害。从此，西藏政局被亲英派所掌握，直至1947年，西藏发起了清除汉人的谣风。

拉萨的汉人，一部分是清末留拉萨川籍清军的后裔。辛亥革命时，藏方遣散在拉萨的全部汉人，因此部分汉人从陆路或经印度回内地。但仍有少数汉人留在拉萨，大都是已有妻室成了家的（其中也有一些是回族人）。为此，藏方设立衙门，进行管理。只准其做一些小买卖、小手艺以维持生计。后来，其子女有的完全同化于藏族。连汉语都不会了。此外，还有几种汉人，一是京、滇、川的汉商，不少在西藏经商发了财，他们的商号都有三、五个汉族伙计，这些伙计每隔几年要回内地老家探亲。汉商及其伙计完全保留汉族的生活习惯，商店装饰、衣帽穿戴，与内地汉人相同，西藏贵族官家都喜欢与汉商交往，互相宴请。二是从内地派遣入藏的汉族官员，因为有较强的经济条件，生活优裕，能在藏族中立足。

我在西藏工作三年，1945年日本投降，我组任务完成，无留藏之必要。我于1946年调回南京，这时，戴笠已命归黄泉，我则返回浙江老家。

以上是四十多年前之事，近来，记忆力又有衰退，如有错误，敬请知情者订正。

写于一九八七年四月兰溪

# 回忆我父亲的几位同僚

胡武林

## 蒋介石召见

一九四二年春天，我父亲胡国宾任国民党空军第三路司令部参谋长。那时三路司令官是国民党空军元老王叔铭，他是我父在航校一期学习时的教官。他器重我父亲的才干，经他竭力推荐，由航空委员会报请蒋介石批准，准备提升我父为三路副司令官。命令下达前，蒋要亲自召见。于是父亲在王叔铭陪同下，星夜由成都飞抵重庆（当时，三路司令部驻成都郊区红牌柚附近）。

在重庆，航空委员会周至柔主任，交待了注意事项。要求军容整肃，答问清楚简练。甚至连衣扣、军衔标志是否结实，都作了仔细检查。次日上午，父亲在王叔铭带领下，驱车前往军事委员会。在侍卫室签到并经该室禀报蒋同意后，留下随身携带的武器。然后由值班侍卫引导，王叔铭在前，我父亲随后，直向蒋的办公室走去。从侍卫室到办公室，是一条长达二、三十米的走廊。值班室侍卫在办公室门口喊了一声报告，蒋点了点头，示意来人进去。蒋介石目光炯炯，指着我父亲问王叔铭：“他就是胡国宾吗？”王叔铭回答：“是的。”蒋招了招手，说：“坐下，坐下。”接着问我父

亲：“是哪里人？黄埔几期学生？”父亲马上立正回答：

“浙江建德人，军校六期毕业。”这时，蒋介石很高兴地连声说：“好，好！我们是同乡，又是师生。”接着，很关切地问了一些家常，父亲恭敬地作了简单明瞭的回答。最后蒋作了强调：“空军很重要，你们都很年轻，前途无量，今后要努力效忠党国，……。”鼓励一番，又把话锋一转，说：

“今天因为忙，没时间请你们吃饭了。晚上由你们的秘书长美龄代表我，大家聚聚餐。”

这次召见，前后仅十来分钟。由于父亲是第一次，所以精神比较紧张，召见结束后，竟发现自己出了一身汗。他对母亲说：“气氛实在有点紧张，看来浙江人还是沾光的……”

以后，父亲随着地位的升迁，单独见蒋介石的机会也多了。记得一九四六、一九四七这两年间，任空军参谋学校校长，每年学员毕业，蒋都要亲自来校训示一番。毕业典礼结束后，还和我父亲单独合影一张，以示关怀。蒋对手下的将领，确是有一套手腕的，使之服服贴贴，为蒋卖命。

## 一 张 照 片

解放前，我家珍藏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抗战后期，在成都红牌柚原国民党空军三路司令部司令官办公室门前照的。照片上一共四个人：司令官王叔铭居中，紧紧依偎在他身边的是他的独生爱子王自强，他们的右边是我父亲（副司令官），左边是参谋长赖名汤。拍这张照片，距今已有四十多年了。每当想起它，许多往事顿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王叔铭，山东人，表情严肃，不抽烟，不喝酒。我有点

怕他，他却很喜欢我，我称呼他为王伯伯。他的孩子比我大一、二岁，我们一同在空军子弟小学读书。王妈妈是杭州人，因为和我母亲是同乡，又是同僚的夫人，所以往来甚密。王妈妈和蔼可亲，我们兄妹都很喜欢亲近他。

抗战胜利后，王叔铭举荐我父亲担任空军参谋学校校长。参校是培养中级以上空军指挥人员的基地，被誉为空军最高学府。父亲上任后，励精图治，成绩显著，深受王叔铭的赞赏（王当时已任空军总司令）。他对我父亲的国文程度和书法十分欣赏，我父亲亲笔为参校大礼堂书写的“经纬堂”三个大字，他看了赞不绝口。据母亲回忆，父亲调参校后，空军总部对上行文，均由周至柔、王叔铭口授，我父亲执笔书写。有重大事情，王总要先和我父亲面议。当时他住在南京玄武湖附近的模范路，一有事，就直拨电话，通知去他官邸商议。因此，我父亲出入王家是很随便的，王叔铭身材粗矮，长得墩墩实实，我们就取了一个绰号：“铁匠”，当然只能在家里讲讲，对外不敢张扬，因为我父亲很尊重他，感激他对自己的栽培。

赖名汤，航校二期毕业，身材魁梧，颇有军人风度。父亲说：“他是航校两期学员的佼佼者。头脑冷静，擅长处理棘手的问题。”他和我父亲关系很好，有一次我患了虫牙，赖叔叔亲自驾车送我去医院治疗。那时，经常到我家玩，他一来，我们兄妹几个老是围着他，亲热地称呼赖叔叔，抗战后期，被周至柔看中，到美国考察深造，从此我们没有再见面。

想起这张照片，王伯伯、赖叔叔两位老人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能消失。大陆解放后，他们

去台，官至上将，先后任台北参谋长。屈指算来，现在他们已都是八十左右的老人了。如今先父已经作古，而他们两位尚健在。想起这张照片，我是浮想联翩，思绪万千啊！我想王伯伯、赖叔叔在工作之余，翻开像册，看见这张照片，大概也会深有感受，也许会记得我这个调皮的“小”武林吧。

## 一块镀金手表

蒋经国的表哥毛邦初，是我父亲在航校学习时的飞行教官。他很喜欢我父亲勤学、忠厚的品质。父亲曾对我们讲，在航校上学时，有一次毛邦初带我父亲作空中翻滚的飞行训练。三十年代初期的教练机，大都是双翼的。教官、学生一前一后同机操作。由于我父亲是第一次进行这高难度的飞行训练，精神上有点紧张，完成规定的翻滚次数后，竟忘记拉住操纵杆，以致飞机一个劲地继续往下翻滚。这可把毛邦初急坏了。驾驶仓里，再喊也听不见。他只得狠蹬操纵舵，努力把飞机从翻滚状态恢复过来，才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飞行事故。训练结束，飞机安全降落，毛邦初浑身是汗。下了飞机，狠狠地训了我父一顿。事后，毛邦初心有余悸地对我父亲说：“今天差一点向阎王爷报到。当时，飞机离地面只有三百公尺，太险了。飞行员的头脑，必须冷静，胆大心细。否则，是要倒霉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抗战胜利前后，毛邦初升任空军副总司令，并常驻美国，负责联系美国援助国民党空军的军用物资，选送人员赴美考察实习，每隔一、二年回国述职。1947毛回国时，还专门邀我父亲去他官邸述旧，并赠给一只镀金手

表。当时我父亲向他表示想出国考察的愿望，毛答复：“目前参谋学校，百废俱兴，待有点头绪后，再让你出国。”那只镀金表，父亲一直珍藏在身边。

## 八 条 波 纹

先父生前经常戴着一只具有特殊意义的金戒指。这只戒指，正面是一个正方形的小方块，方块内刻有八条波纹。半个多世纪前，我父亲在航校毕业时，有八位同学，感情深厚，为了纪念永恒的同窗之情，八位同学共同商议决定制八只金戒指，戒指上图案的含义：“小方块象征着大海，八条波纹代表八位同窗好友，表示大家的情谊将如大海的波涛，永世不分离，共同前进”。戒指每人一只，以示纪念。这八位同学是王百育、刘求峰、赵仲一、赵国标、胡伟克、谭以德、胡国宾，还有一位，名字记不起了。

王百育，是航校最早当上飞行大队长的第一期出类拔萃的学生。抗日战争中殉国。我父亲十分怀念他。他是江西九江人，一九四七年他的胞弟王季育专程从老家到南京空军烈士陵园扫墓，就在我家落脚。当他和我父亲谈起百育时，声泪俱下，我父亲也动了感情。后来季育要回九江，父亲买好船票，送足路费，派专车亲自送至下关轮船码头，我已经十岁了，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刘求峰，湖南人，飞行技术精湛。但长期不得志，一直当飞行员。抗战中期，离开空军，到中央航空公司当机长，往返重庆和加尔各答之间。他只要到成都来，都在我们家住。每次来总带一些印度糖果逗我们兄妹玩。有一次还专门

从印度孟买给我们卖了一条围巾，亲手围在我的脖子上，刘叔叔的音容笑貌，至今缭绕在我的脑海之中。抗战后期，飞机失事，刘叔叔不幸遇难，噩耗传来，我父亲失声痛哭，好几天精神不振，他十分难受地对我母亲说：“继百育之后，求峰又去了，真是令人伤感啊！”

赵仲一，很有文才，特别是对中国历史颇有研究。就是官运不亨通。在我父亲当参谋学校校长时，他还在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坐冷板凳（当后派员）。当时他家就在西湖边一座小山上。一九四六年我们全家回乡探亲时，还专程去他家小憩。我们在南京期间，他曾数次来我们家玩。找家父帮忙调动，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仲夏我父亲才设法把他调往参校任督察官，后来随校迁往台湾，就不知音讯了。

赵国标又名赵业，他在官场中，混得不错。解放前夕，已经当上空军总部第二署副署长。前几年据美籍华人蒋邦梁先生来信，（蒋系家父中学时代的同学，建德三河乡贺宅村人）提及赵叔现还健在，侨居美国洛杉矶市，随子女生活，近况甚好。

谭以德，湖南人，抗战胜利后，他是空总后派员，常为我们家的坐上客。幽默风趣的语言，玩世不恭的态度，考究的衣着，风度萧洒。当时尽管他地位比父亲低，但是彼此都是老同学，都有一只刻有八条波纹的金戒指，所以他来我家是很随便的。后来随空军总部迁往台湾，现在也不知去向。

胡伟克是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校长。因为是混血儿，身材高大，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当时参校和官校，是空军培养人才的基地，由两胡分任两校校长，在空军内部是颇有名气的。记得一九四七年空军开全军运动会，其中有一个项

目就是两位胡校长百米短跑赛，结果胡伟克仗着身高腿长的优势，摘了桂冠。我父亲也以十四秒的好成绩屈居第二。当时我父亲还很不服气，提出要和胡伟克再比赛1500米中距离赛跑。胡伟克自知体力毅力都比不上我父亲，说啥不干。这些往事在全军运动会上被传为佳话。他俩百米冲刺的镜头还被刊登在当时的空军报上。

如今时过境迁，父亲当年的好友，有的已经作古，有的健在，然而，却天各一方，只留有这只闪烁着诚挚友谊的金戒指，永远使人怀念。

## 和美国佬比高低

空军参谋学校，是国民党空军培养中级以上指挥人员的学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和美国顾问团都十分重视空军参谋学校的建设，由美国空军部专门派遣一个顾问组，长驻参校并直接参与学校的训练。美军顾问组拾来个人，组长是美空军上校，这帮人平时盛气凌人，独断专行，成了参谋学校的太上皇。对此我父亲窝了一肚子气，可是表面上还要应付。

一九四七年秋天，顾问组长奉调回国，临走之前，参校处以上军官，部分学员代表，以及美军顾问组全体成员，在参校舞厅举行欢送会。那天晚上，母亲和我也都去凑热闹。欢送会一开始，我父亲和即将离任的顾问组组长，互致简短的客套词。紧接着，已经接任组长职务的原顾问组付组长，就用挑衅的口气，提议要我父亲和卸任的顾问组组长比赛扳平腕，当这个美国佬话音未落，不等翻译开口，懂英语的我父亲就甩掉军装，交给母亲，卷起衬衣袖子，

主动去到顾问组长面前扬起右手，表示接受挑战。这个美国佬一点八米的个子，膀大腰圆，和我父亲站在一起要高出半个头。他流露出满不在乎的神气，似乎觉得扳手腕，我父亲绝不是他的对手。于是他也伸出右手，俩人手拉着手一起走到舞厅中间，双方都摆出格斗的架势，由接任的顾问组长当裁判。当时我在一旁，看见美国佬那么大的个子，气势汹汹，爸爸能扳过他吗？比赛一开始，美国佬居高临下，一下就把父亲压下去了。这时美国佬洋洋得意，发出骄矜的笑声，以为这场比赛，他是稳操胜券了。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毫不气馁，只见他咬紧牙关，脖子上青筋突起，不断地发动反击，使劲地往上翻，在场的中国军官和学员代表，也是一个劲的喊：“胡校长加油”！就这样双方持续了一分多钟，美国佬头上冒汗了，脸也青了，并且不断地喘着粗气，最后我父亲终于翻过了。当美国佬的手压在下面时，他还拼命挣扎了一阵，始终无济于事，再也翻不过来了。这时舞厅里爆发出长时期的掌声。美国佬象斗败的公鸡，连句客气话都没说，耸拉着脑袋，回到自己坐位上去了。仲裁这次扳手腕的美军新任顾问组长，自讨了个没趣，也灰溜溜的下去了。回家之后，父亲笑着对我说：“美国佬个子虽大，但没有长劲，多坚持一会，他就顶不住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往事都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但是至今回忆起来，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如今海峡两岸的亲人无法团聚，值此丁卯年新春来临之际，令人每逢佳节倍思亲，仅作此文，奉献给在台湾的亲人，奉献给先父在台湾的亲朋好友。

87年3月17日

# 勘 误 表

| 辑数 | 页数  | 行数  | 误                          | 正      |
|----|-----|-----|----------------------------|--------|
| 一  | 15  | 倒 7 | 遂昌火柴厂                      | 龙游火柴厂  |
| 二  | 19  | 4   | 距上戴六华里                     | 距上戴三华里 |
| 三  | 25  | 9   | 西岩寺                        | 仙翁殿    |
|    | 25  | 10  | 郭崽寺                        | 郭偲寺    |
|    | 110 | 4   | 榜眼余志韶                      | 榜眼俞志韶  |
|    |     |     | 探花吴绸斋                      | 探花吴绸斋  |
|    | 111 | 9   | 战争相继吃紧                     | 战事相继吃紧 |
|    | 112 | 9   | 滇越公路                       | 滇黔公路   |
|    | 113 | 倒 4 | 工艺重彩                       | 工笔重彩   |
| 四  | 82  | 4   | “以开民智”之后应加上“聘请叶大鹏为国文教师”一句。 |        |

封面设计：凌成澜

兰溪文史资料  
第五辑  
(内部发行)

政协兰溪市委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